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223

2022/ 1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二年第一期（总第三十一期第六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征稿重点

一、参考主题

- (一) 统一战线基本理论、范畴与话语研究
- (二) 统一战线百年发展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研究
- (三) 统一战线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 (四) 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 (五)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 (六)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 (七)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
- (八)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
- (九) 国际社会热点事件的统战视角研究
- (十) 统一战线(含各领域)学术史梳理与述评

二、相关说明

我刊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研究统一战线，鼓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交叉学科研究，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的说理文风。

我刊选稿的基本原则是：正确导向、质量标准、问题意识、视野宽广、学理阐释、结构完整、论述规范。对参考主题范围内稿件，我刊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来稿敬请关注以下基本要求：

- (一) 内容要求。导向正确，主题突出，逻辑清晰，结构规范，论证深入，文字通畅。
- (二) 规范要求。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重合率不高于15%。每篇论文参考文献一般不低于2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一般不少于10条。
- (三) 结构要求。论文须有问题提出、文献评价部分，开展精到的文献述评。
- (四) 体例要求。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2 000字。对照《〈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体例要求，完整准确著录参考文献信息。
- (五) 征稿时间。2021年11月—2022年11月。
- (六) 投稿方式。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联系电话：（023）62874725。
- (七) 我刊开放获取地址：<https://www.cqsy.org/?Tongyi/Zhanxian/>。
- (八) 我刊微信公众号：tyzxyj。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年第1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英津 冯玉军 朱陆民 华正学
齐鹏飞 许建英 严安林 李春玲
李 捷 李路路 杨 恕 肖存良
吴志成 邹平学 沈桂萍 宋 俭
张献生 张 建 张 峰 陈先才
陈奕平 范柏乃 罗振建 罗来军
周 勇 周淑真 袁廷华 莫岳云
钱再见 殷啸虎 郭春生 郭朝先
袁 征 黄天柱 蒋 锐 蒋德海
韩云波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年第1期（总第31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6卷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01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薛庆超 薛静 刘伊纯

1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三重逻辑

/ 孙磊

28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及其历史经验 / 陈杰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39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意涵 / 程同顺 王雪珂

51 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 李应瑞

68 统一战线的民主功能分析：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

/ 王平 张佳敏 周旭霞

78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

/ 樊士博 徐敏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86 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前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 汪曙申

95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涉藏政策的动向、影响及应对

/ 郭永虎 朱 博

106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性质、解构及应对 / 靳晓哲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119 “灯塔”崩塌：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与运作逻辑 / 王怀强

129 制造断裂：美国自由民主制的三重迷思 / 于 镭 于飞洋

137 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特征、原因与应对 / 黄 忠 张芯瑜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征稿重点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2 No.1(Sum No.31) Vol.6

- 01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Spirit: Xi Jinping '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XUE Qingchao&XUE Jing&LIU Yichun
- 16 The Triple Logic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National Work SUN Lei
- 28 The Diplomat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on the Time of Macao's Return and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CHEN Jie
- 39 The Implication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CHENG Tongshun&WANG Xueke
- 51 The Centennial Course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Yingrui
- 68 An 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Func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ANG Ping&ZHANG Jiamin&ZHOU Xuxia
- 78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Dialectical Practice of Unity and Democracy FAN Shibo&XU Min
- 86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Taiwan and Its Impact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WANG Shushen
- 95 From Trump to Biden: The Trends, Influences and Responses of U.S. Policy Concerning Tibet GUO Yonghu&ZHU Bo
- 106 The American Discourse on Xinjiang Human Rights: Nature, Deconstruction and Response JIN Xiaozhe
- 119 Through the Fog of the Western Democratic Discourse: an Analyze on the Deep Structure of American Democracy WANG Huaiqiang
- 129 Creating Fracture: the Triple Myth of American Liberal Democracy YU Lei&YU Feiyang
- 137 The West's Strengthening of the Human Rights Offensive Against China: Features, Causes and Responses HUANG Zhong&ZHANG Xinyu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薛庆超¹ 薛静² 刘伊纯³

(1.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17; 2.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3. 沈阳城市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12)

摘要: 新时代,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全新阐发, 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渊源与历史逻辑, 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内涵与历史底蕴, 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现为: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美好生活期盼,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协和万邦养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升华凝结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谱写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明相得益彰、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壮美乐章。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 中国精神; 习近平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1-0001-15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1.001

作者简介: 薛庆超,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 薛静,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刘伊纯, 沈阳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课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 清华大学2020年本科教育教学教改项目(ZY01_01); 清华大学写作中心教改项目(xzjg06)

引用格式: 薛庆超, 薛静, 刘伊纯.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1): 1-1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进行发掘、继承、弘扬以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觉地将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相关文献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2-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4]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笔者此前也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崭新阶段，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5]。本文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内在契合，再次进行系统的梳理。

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具有 5 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 56 个民族、13 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6]习近平注重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点石成金，从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高度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延续、发展，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脉和魂魄。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孔子及其学说开始受到重新评价。1996 年国务院批准在山东曲阜设立集文献收藏、信息交流、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博物展览功能于一体的儒学专门研究机构——孔子研究院。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对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随后，习近平同从事孔子研究的专家、学者座谈，仔细听取他们的发言。习近平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在纪念孔子诞辰 2 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7]

习近平的论述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方面的彻底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习近平明确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习近平经常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孔子的《论语》来阐发问题。比如，2013年6月，习近平在墨西哥参议院作《促进共同发展 共创美好未来》演讲，用《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和平共处、互相尊重。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用《论语·季氏》“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来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德服人”的思维习惯。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中用《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来说明脱贫攻坚首先要立志，意志坚定，坚韧不拔，则无坚不摧。孔子历来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孔子强调凡事要“正名”。习近平的上述论述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性“正名”。

（二）追寻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源头

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第一，一贯注重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改造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8]。习近平善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文化基因。2020年9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期间，到岳麓书院调研并提出“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的论断，为汲取实事求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作出了生动的阐释。

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湖南长沙岳麓山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宗教底蕴的一座名山。该山因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载“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故名岳麓。地质学认为岳麓山在古生代开始崛起，中生代基本形成，新生代继续发展，距今已有三亿余年历史。唐代杜牧诗曰：“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闻名遐迩，古今传诵。古代许多著名大儒曾经在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研修讲学，著书立说，传经布道。1916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制作巨幅匾额，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上方，期望学生实事求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岳麓书院成立后，一贯秉持务实学风，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反对埋头钻研故纸堆，反对清议空谈，倡导“经世致用”“经邦济世”，把“实事求是”作为校训，一以贯之、代代相传，极大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青年。关于这一点，从岳麓书院种植的树木也可以看出来。凡是岳麓书院种树，不仅要会开花，还要能结果。古代先贤教书育人，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岳麓山也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经常与志同道合的蔡和森、罗学瓚、张昆弟等到岳麓书院体验古代历

史文化，相聚岳麓山爱晚亭纵论天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52 年长沙在岳麓山重修爱晚亭时，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致书毛泽东题写亭名，毛泽东饱蘸浓墨，一挥而就。“爱晚亭”三个大字，跃然纸上。“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16 年起，青年毛泽东多次在湖南大学筹备处所属的岳麓书院半学斋寓居，累计一年多时间，每天与岳麓书院讲堂“实事求是”的匾额朝夕相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从此“实事求是”深深铭刻在青年毛泽东心中。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动全党整风运动，古为今用、点石成金，赋予“实事求是”崭新的政治内涵。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9]。1943 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校训“实事求是”。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将“实事求是”载入党章，确立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此期间，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发给每一位党的七大代表。从此，“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0]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0]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0] 279}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0] 382}邓小平针对外国舆论界多次无端猜测中国领导层这个人是“改革派”那个人是“保守派”的论调，明确指出“我是实事求是派”。

2020 年 9 月，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期间登上岳麓山，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指出“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9 月 17 日下午，岳麓山细雨蒙蒙，荷花带露。习近平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震撼五岳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八个大字。在岳麓书院中心讲堂前，习近平久久凝望“实事求是”的巨幅匾额，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习近

平的话，是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本土化的深刻总结。“实事求是”也体现在习近平湖南调研整个过程中。为了谋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蓝图，他在湖南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与村级党支部书记、乡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种粮大户、快递小哥、餐馆店主等齐聚一堂，听取来自基层各行各业代表的发言，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深入交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伟大成就。

（三）探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民本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之存在历史渊源。

西周时期的统治阶层一方面把皇帝奉为至高无上的“天子”，另一方面从殷商灭亡中认识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促使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些观点提示统治者要“爱民”“利民”，轻徭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基本形成。到了宋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编撰了《四书章句集注》。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私塾曾熟读《四书章句集注》，对其中的《孟子》印象尤其深刻。孟子主张“尚志”即树立雄心壮志，主张立志要有“恒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孟子主张立志需要磨砺。《四书章句集注》给后人以深刻影响。毛泽东多次引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到：“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朱熹集孔孟以来儒学之大成，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作了深入阐发，提出“国以民为本”“平易近民，为政之本”等民本思想和“取信于民”“富民为本”等具体主张。

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古语“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即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习近平还指出：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做工作必须考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这一届党中央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一以贯之的。习近平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1]。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本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正式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人民至上”，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四）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无数传世之作，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元代画家黄公望 1350 年创作的纸本水墨画，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该画本是黄公望为师弟郑樵（无用师）所绘，前半卷“剩山图”现存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寄托着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无限深沉的挚爱，名义上是将富春江两岸的山山水水尽收画卷，实际上蕴含着作者对中华大地壮丽河山的无限眷恋。“富春山居图”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宝，2011 年 6 月前后两段曾在中国台北首度合璧展出。

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精品“富春山居图”与中国共产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尽显美丽意象。2018 年 9 月 21 日，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习近平关注的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树立了“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样板。余村位于天目山下，属于江南地貌，由于受到三面环山地形限制，交通不便，不利于引进大型工业企业，也不利于发展规模化农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余村“靠山吃山”办起了三个采石场和一个水泥厂，许多村民在矿上务工。余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一度达到 300 多万元，成为安吉县首富村。2003 年到 2005 年间，浙江建设“生态省”，安吉建设“生态县”。根据全省大局，余村陆续关停了原有的矿山、水泥厂，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由 300 多万元降到 20 多万元。2003 年 4 月 9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第一次到安吉县开展调查研究。他实地调研了竹子博览园、抽水蓄能电站、白茶生产基地等，深入了解安吉县“生态立县”的做法与经验。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第二次到安吉县调查研究，在余村听取各级干部的工作汇报。最后，习近平十分肯定地说：“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安吉调研结束后，习近平回到杭州，8 月 24 日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详细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这是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源头。从此，浙江省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首倡省，安吉县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源地，余村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源地。

习近平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余村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浙江省“七山一水两分田”，突出特点是山地多平原少，具有十分明显的生态优势。习近平提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余村扬长避短，发掘优势，充分利用长三角腹地的有利区位，充分发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独特魅力，着力发展旅游经济，走上绿色发展之路。余村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明星村”和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最具代表性村庄，提前进入小康行列。2020 年 3 月 30 日，习近平冒着蒙蒙细雨再次来到余村。沿着村里道路，看到青山叠翠、流水潺潺、道路整洁，家家户户住进美丽楼房，习近平十分高兴。习近平说，时间如梭，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这次来看完全不一样了、美丽乡村建设在余村变成了现实。余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

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现在，浙江省已率先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省，安吉县已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标杆县，余村已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示范村。实践证明，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安吉余村首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个改变中国农村发展理念的科学论断，指引中国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升级版、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正在中国大地成为现实。

从考察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并科学评价中华文化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追寻实事求是根脉，从福建朱熹园倡导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到打造各具特色的展现乡村振兴美好生活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习近平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工作、教育干部、启迪思维，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

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美好生活期盼，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懈追求的梦想。从西周开始，“小康”便成为中华民族世代代的期盼。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描绘了实现“小康”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铸就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恢宏史诗。

（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

《诗经》是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西周时期从民间采风汇集而成。《诗经·大雅·民劳》记载的“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中华民族对“小康”最早的历史记忆。《礼记》具体阐发了中华民族对“小康”的殷切期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身体，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共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中华民族先辈们认为，小康意味着安定、富足的生活状态。《礼记》描绘的就是远古时期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治理下的盛世形态。宋朝洪迈《夷坚志》曾有“久困于穷，冀以小康”的记载。《明太宗实录》记载：“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古人认为，小康就是经济宽裕、生活富足。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局面，如何设定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目标？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造诣，善于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智慧。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得到启发，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奔小康”“小康之家”“建设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话语，其文化渊源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以“小康”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小康”即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

的现代化”新概念。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 20 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 70 年代的水平。1979 年 12 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此时，中国已经实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实事求是深入人心，解放思想如火如荼，改革开放成为民族共识。12 月 6 日，邓小平会见大平正芳。在会谈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小康”目标。大平正芳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邓小平胸有成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10] 237-238}邓小平向大平正芳强调：“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10] 238}后来，邓小平将“小康”概括为“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即从解决温饱阶段到实现现代化的中间发展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多次阐述“小康”愿景。1987 年 4 月，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 1981 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800 到 1 000 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 4 000 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2]为此，邓小平完整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500 美元，20 世纪末达到 1 000 美元，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时，邓小平赋予“小康”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内容“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作‘中国式的现代化’”。从此，“小康”社会作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奋斗目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社会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小康社会一以贯之。党的十二大确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正式把实现“小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三大阐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党的十五大要求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党的十六大系统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共中央纵观全局，认为 21 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 2010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的发展目标，要在 20 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人民愿望，意义十分重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国家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将更加幸福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进一步显示巨大的优越性。党的十七大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任务。

（三）系统阐述和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从这时起，习近平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 年习近平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未来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宣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从党的十九大起，习近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实现“小康”目标一抓到底。从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在西雅图中美友好组织欢迎会上的演讲，可以看出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心所在。习近平在美国讲述决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梁家河故事”。2015 年 9 月 22 日傍晚，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出席华盛顿州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满怀深情地向美国听众讲述中国发展历程。习近平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上世纪 60 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 7 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13]习近平继续说：“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 30 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 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13] 29-30}

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与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并不矛盾。习近平讲述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小康”生活产生极大反响。美国星巴克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作为听众之一，在自己的脑海里深深印上了“梁家河”这个地名，对习近平阐述的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共通之处有了更深的理解。2020 年 11 月 9 日，舒尔茨致函习近平：“时至今日，我仍记得您那天分享的关于梁家河的故事。您提到，重访梁家河，其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于 2020 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充满敬意。中国梦所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联想到美国梦。”

2021 年 1 月 6 日，舒尔茨收到了习近平的回信。习近平写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 亿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长期艰苦努力。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为包括星巴克等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希望星巴克公司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积极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对小康生活的向往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成为现实。

习近平深入贫困地区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建成“小康村”。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来到湖南省地处山区、贫困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调研。当时，十八洞村是极度贫困村。习近平在十八洞村走访“低保户”“特困户”，实地调研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然后，他和村干部、村民代表等一起座谈推动十八洞村奔向“小康”的举措。在这次调研中，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他说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按照“精准扶贫”新思路，中国共产党确定“精准扶贫”战略，成效显著。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把“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指标，使贫困群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从中华民族古代憧憬“小康”到邓小平提出“小康之家”，从“建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既继承前人又不断创新，引领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习近平经常到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和山区调研，分类指导，务求实效。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人心、促发展，提升党的民望、凝聚全民共识，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习近平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1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到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守正创新，指引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协和万邦养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古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引领着中华民族对价值理想世界的憧憬和永恒价值的追求^[15]。习近平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对国际问题，阐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巨大成果。

（一）立基中华文明底蕴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1987 年 4 月 26 日，邓小平指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12]为此，

中国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气魄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确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5 000 多年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尚书》提出：“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意是，古代传说，帝尧放勋，深思严谨，谦恭礼让，泽被四方，普照大地，明察俊才，亲密同族；同族和睦，民众团结，协调各国，友善和睦。这深刻表达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光明磊落、道德高尚、家族和睦、社会和谐、“协和万邦”理念。2014 年，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 5 000 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16]2015 年，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17]2017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全面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习近平将“协和万邦”理念点石成金，赋予中国外交时代内涵，作为中华民族与各国和平共处的历史基因予以广泛传播，收到了巨大成效。

（二）激活历史文化记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倡导与世界各国共商“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成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造福世界。“全球化”概念首倡者之一马丁·阿尔布劳表示，“一带一路”显然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息息相关，通过扩大共同利益密切彼此联系，是中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途径。

汉朝，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开辟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进行经济贸易活动。这条道路最初的主要功能是运输中国丝绸，1877 年一位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把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即“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是最古老的海上航线，由于其以南海为中心又被称为“南海丝绸之路”。习近平提出与有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主要目的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双边、多边机制，借助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激活“丝绸之路”的历史基因，运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3 年秋天，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性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国与有关国家的互惠合作中不断拓展，已成为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随着中外合作的不断深入，“一带

一路”建设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彰显中国的担当和世界情怀。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系，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一带一路”建设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已与 145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联通不断深化，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世界银行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到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世界上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帮助 3 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一带一路”贯通古今，联结中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惠及发展中国家，也惠及全世界。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7]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世界，同时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又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对此，贯通古今、畅联内外的“一带一路”树立了典范。

四、升华凝结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谱写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明相得益彰、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壮美乐章

中国共产党源自中华民族，植根中华大地，服务中国人民，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和创新者。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区分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两个部分，倡导“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邓小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康”思想得到启迪，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独创性地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江泽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以德治国的历史基因，推动中华民族跨世纪发展。胡锦涛认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习近平全面系统全新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升华凝结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一）推进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提升到新高度。2021 年 3 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8]。习近平的这一全新阐发，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将诞生在欧洲西部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东方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真谛所在。中华民族之所以有 5 000 多年长盛不衰的强大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影响力和坚韧发展的内在动力，根本原因在于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血脉”。有中华民族这一“血脉”相连，能够凝聚人心，汇聚抵御一切外侮、战胜自然灾害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赢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立足中国历史沃土，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具有中华文明基因，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论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4]。“两个结合”旨在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指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毛泽东没有单纯着眼于从理论上构建思想体系，而是着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毛泽东在著作中大量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成语、典故、寓言、诗词、神话、小说、传说、人物、战例等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提供了指南。邓小平理论形象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用“小康”来阐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汲取古代“为政以德”理念，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科学发展观汲取古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来阐发“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也彰显理论武器的团结功能。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长盛不衰，遭到危难时为什么能够“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各民族为什么能够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前进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民族文化血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内涵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实现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实现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历经曲折走向辉煌，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国情、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特点。为此，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

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邓小平引领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改革开放宣言书”，继而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汲取 5 000 多年中华文明底蕴，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根据 21 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因，倡议“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渊源，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魅力和广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对全世界中国人和华人华侨华裔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重要意义。

（四）为应对人类社会各种挑战提供中国智慧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风险挑战叠加。美国两大政党争斗不已，两党内部亦各自呈现着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日本和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出现了纷争不已、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局势动荡不已，经济发展出现瓶颈，各种社会思潮铺天盖地。日益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气候变化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网络犯罪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对于破解这些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供相应的答案。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21 世纪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

（五）为彰显中国形象提供强大软实力

《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1]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可靠、最根本、最能令人信服的软实力。我们要立足中华文明，胸怀“国之大者”，眼观五洲风云，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把握天下大势、区分不同对象、精准选择题材，讲好中国故事。特别要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也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惠及中国又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1-11-17（1，5-8）.
- [2] 杨瑞森.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几点体会[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12）：47-53+136.
- [3] 李国泉，周向军.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J]. 思想理论教育，2014（10）：39-43.
- [4] 肖贵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12.
- [5] 薛庆超，薛静. 习近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行政管理改革，2017（12）：20-25.
- [6] 习近平.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N]. 人民日报，2013-03-18（1）.
- [7]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N]. 人民日报，2014-09-25（2）.
- [8] 姜义华.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红旗文稿，2021（12）：11-15+1.
-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 [1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N]. 人民日报，2013-06-27（1）.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
- [1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N]. 人民日报，2021-07-02（2）.
- [15] 张立文. 中华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N]. 光明日报，2017-11-06（15）.
- [16] 习近平.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柏林）[N]. 人民日报，2014-03-30（2）.
- [17] 习近平. 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2015年11月7日）[N]. 人民日报，2015-11-08（2）.
- [18] 习近平考察朱熹园谈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EB/OL]. （2021-03-23）[2021-12-26].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23/content_5595049.htm.

责任编辑：林华山 刘伊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重要思想的三重逻辑

孙磊

(中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工作取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理论逻辑、时代逻辑、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时代逻辑看,它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关系中回答民族工作时代命题。从价值逻辑看,它是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在今后的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中,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认知和把握。

关键词: 民族工作; 民族理论; 民族政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1-0016-12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1.002

作者简介: 孙磊,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医药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对未来世界政治走向的影响研究”(19ZDA13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之乱’中的种族、民族主义回溯及其应对之策研究”(20AMZ013)

引用格式: 孙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三重逻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1): 16-2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先后召开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如何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作出系列重要部署。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1]。他同时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1]。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最大的政治成果，就是总结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逻辑缜密，是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实现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党的治国方略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入了新境界，是新时代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聚焦背景、内涵、意义等方面^[2-9]。但是前期相关研究主要是对具体观点进行总结，相对缺乏大跨度的逻辑梳理。为此，从理论维度、时代维度、价值维度上深化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研究，对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党的百年民族工作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理论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10] 4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赓续与发展，是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吸纳与升华。

（一）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赓续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捍卫和发展者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集中体现在对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等方面。其一，民族是一定的历史范畴，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紧密相连，私有制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产生的根源，解决民族问题要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其二，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其三，各民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民族之所以

能成为一个民族而长期生息繁衍，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优点和特点。其四，民族差别、民族问题将存在很长时间。民族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五，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应局限于民族现象本身，它既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也只有在社会总问题解决的进程中获得解决^[1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我国民族理论的源头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赓续与发展。其一，依据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一般规律，坚持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将民族问题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进行审视，寻求破解民族问题之道。其二，坚持将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总钥匙，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三，坚持将民族平等团结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旗帜，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理论。其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共同繁荣发展的视角，深化对新时代民族工作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二）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在近代，中国面临着反帝反封建反分裂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不懈探索。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侵略、反分裂的行动纲领，也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长征途中，党在藏族地区建立“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在回民地区建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各民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举^[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不断推动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先后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包括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等方面^[1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时期民族工作实际，推进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不断发展，提出了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14]，要从“两个大局”看待民族工作，“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15]等论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冷战后我国民族问题的新形势新变化，提出了深刻认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重要性”^[16]¹²⁵，“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的思想^[16]⁵⁰。进入 21 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提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两个共同”的主题，提出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三个不容”重要论断，即“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优势不容削弱”^[17]³⁴⁸。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从“大国”到“强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总结党的民族工作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推向了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其一，继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工作重要性、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等方面内容。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八个坚持”）、201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的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九个坚持”）。其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三，把“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总目标，阐释了“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将民族团结理论发展到新阶段。其四，提出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丰富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内容。从“多元一体”辩证关系中去认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之间关系，提出了“四个共同”和“五个认同”的重要论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其五，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方面，指出“要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开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1]。其六，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提出了“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实际、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对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文化与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也作出了重大创新性阐释。这些阐释在 2021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被概括为“十二个必须”。

（三）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吸纳与升华

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由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中华民族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8]。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不仅是共同的地缘和生活环境把各族人民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光明前途把各族人民亲密无间地凝聚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四个共同”等论述，都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进一步升华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统一多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深刻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两者辩证统一。”^[19]²⁹“我国 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20]在 201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21]“四个共同”即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论述，进一步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深刻内涵，提升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理论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用“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对“多元”和“一体”关系作了形象比喻。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对我们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等具有重要启示，也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一”和“多”的关系、各民族间“同”和“异”的关系、民族政策“恒”和“变”的关系提供了理论遵循，体现了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吸纳与升华。

三、时代逻辑：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关系中回答民族工作时代命题

恩格斯认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应时代之变、发时代之声、顺时代之势，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如何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应时代之变：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架构中把准民族工作的时代脉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架构中把准民族工作的时代脉搏。

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也有过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现象，但更多的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在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和亡国灭种的危机，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儿女团结抗争，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在近代以来抗争西方列强的百年历程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进一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已然作为一个“自为”的民族实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现实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民族识别，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政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后，党把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精准脱贫，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25]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了“强起来”的“快车道”。

（二）发时代之声：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回答民族工作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既是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实践遵循。它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做什么”“怎么做”的时代命题。

从理论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为“十二个必须”^[1]。一是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二是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三是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四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五是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六是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七是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八是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九是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十是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一是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十二是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十二个必须”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从逻辑结构上看，第一条到第四条是总体要求，从民族工作历史方位、重要任务、主线、中华民族历史观方面提出总的要求。第五条到第十一条围绕一律平等（基石）、民族大团结（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度）、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纽带）、交往交流交融（途径）、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方法）、维护国家统一（最高利益）方面具体展开。第十二条论述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政治保障）。从具体内容上看，“十二个必须”体现宏观与微

观有机结合。第一条到第三条是宏观层面，围绕“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定位与目标、任务与主题、主线与主责”，从整体认知上回答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定位与重大意义”问题。第四条到第十二条是微观层面，围绕“民族历史观教育、践行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等，从微观举措上回答新时代民族工作“怎么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要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实践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民族工作实践中产生，必将指引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推进实施精准脱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发展。2020 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 420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8 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民族八省区“十三五”时期 GDP 增长 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9 个百分点^[26]。回顾这一时期，民族地区正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国务院划定的全国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共有 680 个县，其中 371 个地处民族自治地方，占 54.6%。2020 年最后宣布脱贫的 52 个贫困县，基本上都集中在民族地区^[27]。

在肯定民族工作实践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研判新时代民族工作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脱贫攻坚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人民一起迈进了小康社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局面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增强，我国民族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要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共同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28]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也是在纠正民族问题认识上的误区、纠正民族工作实践中的偏差中产生，必将指引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的发展。

（三）顺时代之势：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互动中指明民族工作的时代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聚精会神地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10] 26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互动中指明了民族工作的时代方向。

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期。一方面，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现了精准脱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增强。另一方面，民族复兴道路上还面临着系列挑战，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仍然复杂多样，民族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仍然尖锐复杂，国际势力干扰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风险不容小觑^[28]。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发展迈上了新台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存在；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趋势不断增强，但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种因素仍然复杂；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水平仍待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仍需加强。总体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不断巩固，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

政治、法律、社会、心理基础等方面工作仍任重道远。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存，文化多元化与文明冲突论交织。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的低迷、政治的极化、社会的撕裂，引发了新一轮种族、民族主义问题的回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面对全球化和权力转移的焦虑，特别是对中国疫情防控过程中所显示的软硬实力的担忧，西方保守主义势力将中国视为种族、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和投射的对象，催生了当下西方涉疫情反华民族主义浪潮”^[29]。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利用所谓“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西方国家涉民族的反华言论，实质上是将其国内种族、民族主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转嫁到中国，企图借助种族、民族议题形成对中国的遏制，从而达到破坏我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目的。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冷静分析和深刻研判，将新时代民族工作融入国内国际互动的大视野，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时代方向与宏阔视野。

四、价值逻辑：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维的价值意蕴。具体来说，它以国家统一为最高利益，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一）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最高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有序、科学、高效地应对疫情，凸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到处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肆意抹黑中国。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等加剧运用香港、台湾、新疆和民族、宗教、人权等议题攻击中国^[30]。西方国家借民族议题打压中国，也对我国的民族工作产生诸多消极影响。一方面，有关西方国家为了维护霸权地位，不断利用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中印边界问题等煽动中国周边国家利用领土争端或其他借口向中国发难。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族”“宗教”“人权”旗号，推动我国民族议题国际化，给我国民族关系带来风险挑战。祖国统一、国家安全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要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坚持维护祖国统一，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民族分裂活动。”^{[19] 51}他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疆发展稳定，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31]他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32]。他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同时，要坚决防范民

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民族工作与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关系的阐释，是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创新成果，彰显了以国家统一为最高利益的价值指向。

（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

2015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3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总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华儿女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35] 其二，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民族工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结合、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紧密结合。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价值意蕴深远。其三，以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为民族工作重要任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不仅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导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指向，包含利益、制度和价值等要素。以社会为价值主体，价值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内容：“一是目标性价值，指人们对生活的质量、生存样态的总体期望，即人们想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二是工具性价值，指人们对达到这种期望生活应采取的行为价值准则或实践价值原则，即人们怎样才能过上自己期望的社会生活。”^[3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价值要求。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1]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56 个民族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共同发展进步。推进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要从以下方面着力。其一，民族地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要立足实际，融入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在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生态观注入民族发展新动能并提升到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的新高度。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实现差别化政策，强调生态文明重要性和优先性，将生态观和民族观紧密相连，着重强调把“青山绿水”转化成“金山银山”的能力^[37]。其二，继续对民族地区实施差别化支持政策，加强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推动民族地区尽快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其三，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必治边的重要论述，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

边工作，强化人口与经济支撑，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确保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

（三）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基于权力政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和国际政治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38]。其基本特征是经济掠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全球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种族、民族主义回潮，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的共同性挑战越来越多。面对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全球性问题带来的诸多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201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 年 1 月，他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全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9]。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0]的主张。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国际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为促进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促进包括世界民族事务在内的全球治理更加合理有效而提出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倡导合作共赢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也蕴含着对世界民族问题的关注，以及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善治”思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观，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了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同时将民族问题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世界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准确把握了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征，对世界发展趋势作出了客观判断，顺应了全球化大势，回应了各国谋求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关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结语

环顾当今世界，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的任务。西方国家先后采取的民族迫害、种族隔离、同化、多元文化主义等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或道路，都没能较好处理和解决好民族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处理 and 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探索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

合，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挑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理论逻辑、时代逻辑、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在今后的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中，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认知和把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2] 乌小花, 郝因.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解读 [J]. 民族研究, 2017 (4): 1-10+123.
- [3] 邓新星. 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产生、内涵与意义 [J]. 民族学刊, 2017 (5): 69-76+120-122.
- [4] 郝时远. 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研究述评 [N]. 中国民族报, 2017-07-07 (5).
- [5] 周大鸣. 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研究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 109-116.
- [6] 吴月刚, 肖锐, 金炳镐. 试论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体系 [J]. 民族研究, 2017 (6): 12-22+123.
- [7] 李良品, 葛天博. 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思想初探 [J]. 民族研究, 2018 (3): 1-14+123.
- [8] 胡清惠.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六个主要问题 [J]. 实践(思想理论版), 2020 (2): 28-30.
- [9] 严庆. 深刻理解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6): 41-48.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403.
- [11] 何龙群.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22-30.
- [1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232.
- [13] 洪鉴. 毛泽东的民族思想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 (11): 22-25.
- [14]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4.
- [15]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47.
- [16]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学习纲要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 [1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科学发展观的崭新篇章——十六大到十八大的民族工作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 [18]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1.
- [19]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 [20] 罗宇凡.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全国各族人民团

- 结奋斗实现历史性跨越 [N]. 人民日报, 2015-10-02 (1).
- [2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27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4.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82.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66.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8.
- [25]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年9月27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8 (2).
- [26] 王灵桂. 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B/OL]. (2021-11-03) [2021-12-20]. http://www.cssn.cn/mzx/202111/t20211103_5371353.shtml.
- [27] 郝亚明. 从五个时间节点来深刻把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 (4): 16-22.
- [28] 中共国家民委党组.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1-08 (12).
- [29] 李学保. 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背景下西方种族、民族主义现象透视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3): 123-130.
- [30] 林华山, 龚静阳. 大安全与大统战: 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74-92.
- [31]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 李克强俞正声讲话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4-05-30 (1).
- [32] 史本林, 丁瑞, 闫亚雄. 习近平新时代治藏方略的创新与发展——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中心的思考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1): 1-7+153.
- [33] 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N]. 人民日报, 2015-10-01 (1).
- [3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日)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35] 习近平谈国家文化软实力: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EB/OL]. (2015-06-25) [2021-12-20].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625/c385474-27204268.html>.
- [36] 曾荻, 郭开强.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 (1): 9-13.
- [37] 吕峰. “团结—治理—共享”: 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论述研究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6): 22-29.
- [38] 王公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62.
- [39]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2017年1月18日, 日内瓦) [N]. 人民日报, 2017-01-20 (2).
- [4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9.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刘伊菡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 及其历史经验

陈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在澳门问题被提上中葡两国外交议事日程并至最终通过谈判解决的过程中,中葡两国在巨大的认知冲突和利益分歧下,围绕澳门回归时间这一焦点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交涉和博弈。在此过程中,中方照顾到葡方所谓的“面子”,放弃了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的初衷和设想;葡方认识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内彻底洗刷殖民主义耻辱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放弃了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中葡双方通过多次谈判和磋商,最终就实现澳门回归的时间节点达成一致。这一问题的解决启示我们,解决类似问题,要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增强斗争本领。

关键词: “一国两制”; 中葡谈判; 澳门前途; 回归时间; 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2)01-0028-11

20世纪80年代,为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中国政府先后启动与英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与葡萄牙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经过多轮谈判,中国政府先后与英方、葡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由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规定,英国向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1.003

作者简介: 陈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重要思想研究”(18BDJ010)

引用格式: 陈杰.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及其历史经验[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1): 28-38.

清政府租借“新界”到1997年6月30日届满，所以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定于1997年7月1日并不难理解。但是，中葡之间有关澳门问题的“协议”——无论是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还是1979年中葡建交时达成的有关澳门问题的“谅解备忘录”，都未对葡萄牙管治澳门的时限作出明确规定，那么澳门回归的时间为什么定于1999年12月20日呢？事实上，这个时间是中葡两国政府经过旷日持久的外交博弈确定的。

对中葡就澳门回归时间问题展开的外交博弈，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少。王俊彦撰文介绍了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前途问题谈判的历史过程，其中对澳门回归时间问题有所涉及^[1]。罗燕明撰文梳理了澳门问题从16世纪产生到20世纪彻底解决的历史脉络，其中简要介绍了中葡双方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就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交锋^[2]。另外，一些澳门史研究专著在叙述1986—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这段历史时，也简略论及澳门回归时间问题。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对中葡双方就澳门回归时间问题展开外交博弈的主要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基本呈现，但缺乏对该问题来龙去脉的专门梳理和阐释，在史料、内容等方面也有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空间。为此，本文拟对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出尽可能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妥善处理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历史经验，以期为当前应对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等问题提供一些现实启迪。

一、放弃“港澳同时”：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隔空试探

中葡双方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的较量由来已久。早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启动后，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谈判也开始被中葡双方提上议事日程。在此阶段，中葡双方并未就关键且敏感的澳门回归时间问题展开直接接触和正式磋商，主要是通过向港澳报刊“披露”消息或“隔空”喊话的非正式方式，间接试探彼此态度和底线，并在此基础上谋划和准备各自的谈判方案和策略。

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并就澳门地位问题达成“谅解”后，中国政府打算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继续对澳门执行“维持现状不变”的特殊政策。在1979年3月麦理浩“投石问路”的“北京之行”致香港问题被提上中英外交谈判的议事日程后，澳门问题虽也时常在中英之间连同香港问题一起被提及^[3]，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为避免“双线作战”，中国政府强调继续维持中葡建交谈判商定的澳门地位，不急于解决澳门问题^[4]，暂未专门对澳门前途问题作出改变现状的公开表态。与此相应，葡萄牙也不再像“四·二五”革命前后那样将澳门视为包袱，而是将其重新定位为新时期发展和巩固中葡关系的门户^[5]，所以澳葡当局在中葡建交后不久便制定出涵盖澳门行政、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计划^[6]，大力改善对澳门的管治。1982年12月24日，中英双方正就香港主权和治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在此背景下，里斯本的《国民日报》在采访澳门总督高斯达时问到澳门前途问题。高斯达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和根据表明中国要寻求有别于现状的解决办法。”^[7]此后，随着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外交谈判的深入推进，高斯达在不同场合又多次表示：“澳门在未来依然会保持现状。”^[8]1984年5月5日，正在中国访问的葡萄牙副总理麦斌图对记者表示：“对澳门来说，并不存在一九九七的问题。”^[9]这说明，一方面，在澳门问题正式提上中葡两国政府外交谈判的议事日程之前，“维持澳门现状不变”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对中方而言，随着香

港前途逐渐明朗，澳门问题不可能永远被搁置下去。然而，从葡萄牙和澳葡当局的各种表态中可以看出，葡方反复强调“维持澳门现状不变”的阶段性共识，对澳门前途问题基本秉持比较保守的回避态度，这当然有顾及中葡友好合作关系的因素，也折射出其不再急于交还澳门而恋栈殖民统治的微妙心态。特别是麦斌图的表态显然是在暗示中方：葡萄牙管治澳门没有时间限制，中国不应过早、过急改变澳门现状，而应排除外部因素干扰，允许葡萄牙在香港回归后继续管治澳门。这无疑为此后中葡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的分歧和较量埋下了伏笔。

1984 年 7 月前后，中英“联合声明”即将达成，两国之间的外交谈判进入尾声，香港前途也将尘埃落定。在此背景下，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公开表态也日渐频繁而具体。无论是两国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早已十分清楚香港问题的解决进程和方式势必对澳门问题产生预示性的直接影响，而葡方对将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视同一类的各种观点一向怀有强烈抵触心理。在中方正式就澳门前途问题作出公开表态之前，葡方已开始就其归还澳门的时间这一核心问题做出各种“澄清”。1984 年 6 月 19 日，正在日本访问的葡萄牙总理苏亚雷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澳门的情况与香港完全不同，澳门与香港没有可比性，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将延续到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10] 1984 年 7 月，澳葡当局首席建筑师阿米尔卡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澳门“规划未来工程建设所界定的时间范围不在于 1997 年，也不在于本世纪末，而在于超越本世纪^[11]”。1984 年 7 月 13 日，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在总统府接见高斯达，其间谈到了澳门前途问题。回到澳门后，高斯达对记者表示：“只有香港问题确定后，中国才或会考虑澳门的问题，这点表示可能在本世纪内双方不会展开谈判。”^[12] 由此可见，在香港问题即将解决、澳门问题避无可避的形势下，葡方已不再寄希望于中方无限期延缓改变澳门现状、解决澳门问题的步伐，而开始单方面明确表态对澳门的管治至少将跨越 1997 年的立场。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双方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10 月 3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由 200 名港澳知名人士组成的国庆观礼团。其间，澳葡当局立法会议员、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格向邓小平问到澳门前途问题，邓小平思索片刻后回答：“澳门问题将会和香港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式解决，至于解决澳门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其他，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下大家的意见。”^[13] 这是中方首次就解决澳门问题的方式和时间公开表态。很显然，这是邓小平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贯秉持的“港澳一体”思想迅速作出的判断和回应。在邓小平看来，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方式解决港澳问题无疑是最有利和最稳妥的；但是，兹事体大，各方意见可能不一，最终是同时收回、早些收回、晚些收回，还无法完全敲定。1985 年 5 月 20 至 26 日，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邀回访北京。其间，中国方面主动表示，希望尽快举行谈判解决澳门问题，以使“澳门的移交可以与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同时进行”^[14]。对中方计划将解决澳门问题提上双方外交谈判议事日程，葡方已有心理准备，于是“同意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会谈”^[15]；但对中方领导人首次明确的澳门回归时间，葡方表示“政权移交进程所应具有尊严，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彼此都不丢面子”^[14]。葡方意有所指，却又没有明确表态赞同或反对。为此，1985 年 7 月 19 日，到访日本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访问团在问及葡萄牙政府何时将澳门的管治权交还中国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秘书长鲁平进一步透露：“收回澳门的日期，将与香港相同。”^[16] 这是继邓小平

等中方领导人表达收回澳门时间的倾向性意见后，具体负责处理港澳事务的中国官方部门首次对外公开表露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的想法。然而，这一试探性的公开表态令一向意在 1997 年以后乃至 21 世纪交还澳门的葡方大为不满。1985 年 8 月中上旬，高斯达在接受《远东经济评论》杂志采访时声称：“……我们可能一两年内离开。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共限定的期间，继续留在这里？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包括移交的时间。”^[17]葡方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激烈反应，在 1979 年中葡建交后以友好合作为基调的双边关系中几乎是没有任何先例的，企图通过这种单方面撤退的不合作方式阻碍“一国两制”在澳门落地、动摇香港同胞信心、消减“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统一台湾过程中的示范效应，进而迫使中方为顾全国家统一大局而让步。

客观而言，澳门确实被公认在“一国两制”和中国和平统一大局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但是葡方不至于不计后果地无限度夸大和利用这种“作用”，中方在澳门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决心也绝不会轻易被这一“作用”所钳制。《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公布这段谈话后，高斯达次日便立即对这些“冒失”的过激言论予以“否认”：“《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报道并不正确，我没有提及过葡萄牙在两年内撤离澳门的想法，在接受杂志访问时，只提及澳门及解决澳门前途的有效方法”“有许多问题需要商讨解决，包括在适当时间把澳门交还中国”^[18]。其实，葡方反对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的立场没有变化，只是换了一种更具弹性和建设性的委婉说法而已。当然，中方此前透露的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的想法，本意也只是尝试为解决澳门前途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性方案，并非单方立场和政策宣示，因此中方也乐于接受葡方这种对话与合作的态度。1985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后在会见澳门专业人士旅行团时表示：“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与香港差不多，离不开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其他问题将在明年举行的中葡会谈时解决。”^[19]1985 年 9 月初，李后在会见澳门各界妇女访问团时再次重申：“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也有不同，因此一切问题还有待明年中葡两国谈判时商量解决，到时还要听听澳门同胞的意见。”^[20]中方这种“原则问题中方决定、具体问题商量解决”的表态，可视为对葡方态度软化的积极回应，也意味着打消了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的想法。

经过这一阶段的隔空试探，中方认识到葡方的底线是不能接受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希望尽可能迟地交还澳门；葡方也认识到中方希望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但还未亮明底线。因此，中方及时调整谈判策略，不再坚持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的试探性方案，而葡方误以为其成功“迫使”中方让步，便进一步设想和谋求在 2000 年后交还澳门。

二、坚持“本世纪内”：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正面交锋

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较量，在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正式启动后进一步升级。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正式将这一焦点问题提到谈判会议上展开直接的交涉和博弈。经过反复磋商，中葡双方相继就澳门回归的年、月、日达成一致。

1986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第一轮谈判。在第一天会议上，中方首先确认了 1979 年中葡双方达成的有关澳门地位问题的“谅解”，阐明了中国政府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在明确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原则后，中葡双方理应

开始商量解决包括澳门回归时间在内的一些具体问题。在第二天会议上，中方进一步向葡方提交了提前准备好的中葡“联合声明”主体文件之中方草案文本。其中，“草案”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以下称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根据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日期待定）收回澳门并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草案”第二条规定：“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的主权，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将于……（日期待定）将之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14] 262}与此同时，为加速谈判进程，中方根据谈判开始前试探到的葡方底线，进一步向葡方提出了“中国于 1998 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14] 239}的参考方案。然而，对于这一方案，葡方强调：“澳门与香港不同，中方应给葡方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香港的 12 年过渡期，倘若香港有 12 年过渡期，而澳门少于 12 年，则葡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会对执政党和谈判代表团群起而攻之，将造成谈判的极大困难。”^[21]显然，即便中方已特意错开收回澳门与香港的时间，葡方仍不满意。双方的这一分歧，直至第三轮谈判结束时仍然悬而未决。在 1986 年 10 月 21 至 22 日举行的第三轮谈判中，沉默已久的葡方集中对中方在前两轮谈判中提交的全部文件草案作了分门别类的总评论。这些评论涉及相关条款的表述、相关概念的界定等多方面内容，唯独避开了交还澳门的时间这一最为实质性的议题，这显然是故意为之。在中方就此专门提醒葡方之后，葡方也只是再次重申了在第一轮谈判中的回应^{[14] 263}，唯恐避之不及。当然，这其实是葡方的谈判策略，意在将这一敏感问题拖延至 1985 年 11 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访问葡萄牙期间讨论，以利用其主场优势和逼近中方期望在 1987 年 3 月前后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提交全国人大批准的限期，迫使中方进一步推迟收回澳门的时间。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历时两年多，其间从未有中方官员远赴英国与英方开展磋商的问题，北京是唯一的谈判地点。原因在于，香港历来是中国领土，谈判只能在中国举行，这是原则问题。那么同样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澳门问题，为什么在谈判期间出现中方官员访葡并讨论澳门问题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在中葡谈判前协商谈判地点时，一向认为澳门问题不同于香港问题的葡方虽原则上同意在北京举行谈判，但特意提出在里斯本举行部分会谈的期望。考虑到中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方同意中方代表团团长在谈判期间可以应邀访问一次葡萄牙，但不作为一轮谈判，只为方便与葡方更高层级领导人就某些重要问题交换意见^[22]。其实类似的“宽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葡外交史上并不鲜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1952 年中葡两国之间的“关闸事件”。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萄牙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23]此事最终以葡方道歉而结束。在中方看来，葡萄牙是小国，应将其作为团结对象，而非主要敌人。1985 年 5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回访北京的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时表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24]1986 年 6 月 27 日，周南在谈判前夕迎接葡方代表团时直言：“我们之间就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将形成为伙伴之间，而不是对手之间的关系。”^[25]当然由于可从这种互动模式中渔利，葡方在两国建交后一直是高调宣传中葡友谊。面对中方提出的 1998 年澳门回归的参考方案，葡方在第三轮谈判中更是拉出了“不歧视原则”和中葡友好合作关系的“大旗”。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在周南访问葡萄牙期间，葡方期望故技重施。

1986 年 11 月 17 日，周南一行抵达里斯本，开始对葡萄牙进行为期 3 天的正式访问和 2 天的私

人访问。11月18日，周南首先与葡萄牙外交部部长米兰达分别就两国政府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包括澳门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结果显示，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26]，这是正常现象。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米兰达重申：“我们在澳门和香港之间看到了巨大的差异，因为1898年的中英条约已经规定1997年将香港部分归还”，澳门的“过渡期必须足够长，以便能够为政权移交作切实有效的准备”^{[14] 276}。11月18日中午，葡萄牙总理席尔瓦在宴请周南时也就澳门回归时间问题表达了同样观点。这些表态并不新鲜，葡方在前三轮谈判中就已经有类似表述。其实尽管双方至此在1998年澳门回归方案上仍未达成一致，但正如对待葡方坚持错开港澳回归时间的诉求一样，中方对葡方要求澳门的过渡期不少于香港的诉求也并非不理解。即便按照葡方明确要求澳门过渡期不少于12年的公开立场，澳门仍然有望在2000年以前回归。在中葡伙伴式的友好合作关系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原则性根本冲突，只需继续在1998年至2000年之间寻求共识性方案即可。基于此，11月18日下午，在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会见周南时，周南对此前的谈判和磋商作出乐观的评估：“我们很高兴双方谈得很好，基本问题都达成协议了，最后就只剩下文件了。”^[27]然而，苏亚雷斯不仅否认了周南对前期会谈的评价^{[14] 279}，甚至突然提出“本世纪内交还澳门，不合适，时间太早，应该考虑在下一个世纪，就是21世纪的适当时间，来解决澳门问题”^[27]。当然，苏亚雷斯抛出的这一方案虽令中方始料未及，却一直在葡方谋划之内。因为从谈判开始前直至周南的里斯本之行，葡萄牙政客口头和澳门葡文报刊上诸如2003年、2007年、2017年、2047年等各种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言论就从未消停过^[28]，但由于其不属于葡方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正式表态，中方未加以理会。到了这个时候，葡萄牙总统亲自与中方代表团团长交涉这一问题，可谓是葡方首次正式明确地提出其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对此，周南当即予以反驳：“贵国的谈判代表、特命全权大使都同意了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怎么你们又提出异议”，“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是必须在本世纪内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绝不能同意将澳门问题这个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去解决，中国政府不会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作任何让步”^[27]。于是，这场仅限于二人和一名翻译之间的会谈不欢而散。离开总统府时，周南“神色凝重，行色匆匆，一改过往笑脸从容态度”^[29]。原定于会谈后召开的记者会和葡萄牙的行程均被取消。此举一反中方一向竭力顾全中葡友好合作关系大局的常态，让葡方措手不及，对其造成了不小的外交压力。11月19日上午，米兰达主动致电周南要求继续会谈，意识到转机的周南接受了葡方的提议，重申了中方将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的立场。11月22日，周南一行结束对葡萄牙为期5天的访问，在机场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再次重申了中方立场：“在本世纪末，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十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30]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澄清有关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传言时郑重声明：“任何关于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31]至此，无论是对于谈判对手，还是对于中外记者，中方都已经明确并正式亮明了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不可逾越的底线。

眼见中方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的底线立场如此强硬，葡方自知已无任何回旋余地，便不得不放弃其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1987年1月6日，葡萄牙政府召开国务委员会，讨论澳门前途问题。该会议认为：“维持澳门的稳定及繁荣，维护葡国的利益，保持及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葡萄牙不应在归还日期上与中国意见相左。”^[32]“葡国决定在公元两千年前一天还澳门予中国。”^[33]1987年1月20日，葡萄牙外交与合作国务秘书阿泽维多·苏

亚雷斯奉命赴北京通报国务会议的决定。1 月 21 日上午，周南与阿泽维多进一步就澳门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阿泽维多表示：“葡萄牙总理和政府以极大的努力和勇气考虑了中方对移交澳门日期的立场，同意接受在 2000 年以前将澳门交还中国的要求，即 1999 年 12 月 31 日移交澳门。”^{[14] 294-295}对此，周南既表示高兴又觉得其“小气”，指出：“葡方提出的时间离 2000 年太近，许多事情不好处理，还是提前一点好。”^{[22] 54}1 月 21 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泽维多时提议：“将移交澳门的时间定为 12 月 20 日。”^{[21] 352}1 月 21 日晚，周南设宴款待阿泽维多一行，席间进一步指出：“澳门也好，香港也好，葡萄牙也好，你们不是 12 月 25 日要过圣诞节吗？接着就新年放长假嘛！在放长假期间搞回归庆典，合适吗？是不是稍微提前一点？”^[34]对于中方要求，阿泽维多表示此行没有肩负谈判的使命，需要请示后才能决定。1987 年 3 月 7 日，葡萄牙政府再次召开国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澳门前途问题。该会议决定：“接受中国政府的提议，同意 1999 年 12 月 20 日零时，将澳门的管治权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22] 55}1987 年 3 月 18 至 23 日，时隔 5 个月后，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第四轮谈判。在本轮谈判中，双方“就协议文本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35]，澳门的回归时间正式得到确认。至此，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谈判过程中最核心的澳门回归时间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三、认知冲突与利益分歧：中葡就澳门回归时间进行博弈的原因分析

从解决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1999 年 12 月 20 日”这一具体日期是中葡双方自澳门问题被提上两国外交谈判议事日程至最终予以解决的过程中，通过试探和谈判等形式反复较量、相互妥协的结果。那么一向被认为“没有吵架的问题”的中葡两国为何在这一议题上长期拉锯甚至不惜公开“吵架”？这个抽象的时间具体有何深层意蕴？中葡之所以就澳门回归时间进行博弈，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中葡双方对澳门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和界定。中方之所以最初设想 1997 年同时收回香港和澳门，原因之一在于对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性质的统一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认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36]在中方看来，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都属于中华民族在近代积贫积弱时期蒙受的殖民主义耻辱，1997 年同时收回香港和澳门，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一雪前耻”的共同愿望和情感偏向。对中方有关澳门问题的由来和澳门历史的理解，葡方则不以为然。在葡方看来，澳门现状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是得益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建立的有益理解”，葡萄牙人之于澳门不是英国人之于香港那样的殖民者，以后继续在澳门生活的土生葡人也不应该作为殖民者的后代而存在^[37]。正因如此，葡方一直极力反对将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澳门前途与香港前途相提并论，也不接受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这种具有暗示性的方案；更有甚者，葡萄牙人总是情不自禁地尝试在这座被其称为所谓“上帝圣名之城”重温殖民历史。在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外交谈判期间，葡方一些政客和舆论屡屡假借各种周年纪念之名，抛出 2007 年、2017 年、2057 年等诸多跨越 2000 年再交还澳门的方案。对这种挑衅举动，中方的反对态度一贯坚定、明确。早在

1955年，澳葡当局就计划在里斯本和澳门两地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以纪念所谓澳门“开埠”400周年。为此，周恩来借接见港督葛量洪和英国代办欧念儒之机明确表态：“葡萄牙准备以一个月时间大规模地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他们准备这样做，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38]紧接着，《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给予了措辞严厉的警告^[39]。最终迫于中方的强烈反对和巨大压力，澳葡当局取消庆典。另外，1984年国庆刚过，即中方首次就解决澳门问题的方式和时间公开表态后不久，知悉葡方意图的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示：“不能让葡萄牙把澳门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就是21世纪。”^{[27] 303}显而易见，中方不可能允许洗雪民族耻辱的澳门回归庆典具有任何葡方炫耀其殖民历史和其“光荣撤退”的痕迹，也不可能允许葡方以各种周年纪念为借口将澳门殖民主义尾巴带进“千禧年”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正是因为1997年和2000年这两个时间点背后的象征意义分别挑战了葡方和中方对澳门问题的不同认知和界定，所以双方在这一立场上都不肯轻易让步。

其二，澳门回归时间牵涉中方的国家利益和葡方的现实利益。在澳葡当局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占有全部高级及绝大部分中级公务员职位，这部分群体的薪金收入每年均占据葡萄牙在澳门收益的绝大部分。仅以1984年为例，葡萄牙来澳门任职的官员共701人（不含土生葡人）。其中，澳门总督月薪3.07万澳门元，其他高级公务员月薪从1万澳门元至2万澳门元不等；除正薪外，这些葡萄牙官员还享有豁免职业税、住房、教育、医疗等各种福利待遇。加上土生葡人的同类薪金，这部分群体一年有高达1亿多澳门元的收入^[40]。除此之外，1979年中葡建交谈判商定澳门地位并达成“谅解”之后，澳葡当局相继推出澳门国际机场、深水港、第二道跨海大桥等一系列试图跨越2000年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计划。这些发展规划和工程建设在进行可行性研究、设计、顾问和承建时，葡资顾问工程公司都会获得特别照顾，取得大部分承包合同，进而从澳葡当局每年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和方案支出中获取绝大部分费用。更有甚者，1974年“四·二五”革命以后，葡萄牙国内政党林立、党争不断。这些政党为增加选票和活动经费、强化自身的力量 and 影响，均十分重视在澳门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其手段或是通过澳门总督获取巨额款项作为竞选费用，或是通过博彩公司等牟取巨额“政治献金”^[41]，后面这部分收入更是不计其数。可见，葡萄牙在澳门拥有不容小觑的现实利益。在谈到葡方为何想尽量迟地交还澳门时，周南切中要害地指出：“葡萄牙能多从澳门捞钱。”^{[27] 315}

中方由于对葡方竭力维护殖民利益的想法了然于胸，所以对其不断推迟交还澳门的各种主张一直十分警惕，在葡方没有充分理据的情况下，绝不轻易让步。中方之所以不能接受葡方在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除了不能容忍澳葡当局继续盘剥澳门民脂民膏之外，还有更为宏观的战略考量。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访华团等外宾时专门谈到澳门问题：“在我们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都回去了，它是被我们赶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国现在还有一块小殖民地，我们只要用一个指头，他们就会跑掉。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头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留着呢？这是因为首先台湾还由美国人占领着；其次还有香港，由英国人管理着；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门。让他们管理几天，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一点时间。那些地方不大。我们先把最大一块弄好，那三个地方将来再说。”^[42]1975年3月24日，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及与葡萄牙建交事宜：“跟葡萄牙

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响香港，而香港又会影晌台湾。”^[43]在中方看来，“澳门问题不仅是澳门问题而且包括香港问题”^[44]。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战略考量中，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从来都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因此，在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过程中，中方所考量的绝不仅仅是澳门问题本身，还包括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特别是当时对改革开放事业与和平统一大局具有关键作用的香港问题。因此，中方之所以一开始倾向于 1997 年港澳同时回归，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为防止港澳回归的“时间差”影响香港社会经济稳定，这绝非多虑。在中葡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初期，葡方就公开宣称：“希望澳门在九七年后‘归还’中国，以便吸收香港因九七问题而外流的资金。”^[45]这无异于公然挑战中方对确保过渡时期内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视程度，中方对 1997 年后、2000 年以前收回澳门的些微时间变化都慎之又慎，遑论葡方 2000 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

四、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在中葡两国具有重大认知冲突和利益分歧的情况下，中方仍然实现了在 20 世纪内收回澳门的底线目标，有效捍卫了民族尊严，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当前，在领土与主权争端问题上，我国同有关当事国的矛盾依然复杂；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内政问题上，我国同一些外部干预势力的斗争依然尖锐。对此，我们可从处理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过程中总结一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其一，加快发展步伐，增强国力。正是基于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我国才能在“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指导下，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新时代，面对当前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进一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最坚实的后盾。

其二，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在面对当前国家统一和国土安全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时，要实现既定目标任务，既要提升综合国力，还必须发扬斗争精神，进行伟大斗争。只要某些风险挑战危害到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危害到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我们就必须丢掉幻想，坚定斗争意志，敢于出击、敢于斗争；同时要坚持斗争方向，坚定斗争立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其三，注重策略方法，善于斗争。应对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不能作盲目斗争，要非常注重策略方法，坚持有理有利有节，讲求斗争艺术。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在斗争过程中抓主要矛盾和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 [1] 王俊彦. 中葡关于澳门回归谈判的台前幕后 [J]. 传承, 2009 (23): 8-10.
- [2] 罗燕明. 澳门回归记——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外交博弈 [J]. 党史文汇, 2010 (11): 10-16.
- [3] 正确地估量和处理现阶段的阶级斗争 [N]. 人民日报, 1982-11-06 (1).
- [4] 冷溶, 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609.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及其历史经验

- [5] 澳门不是包袱 [N]. 华侨报, 1979-02-11 (8).
- [6] 总督伊芝迪将军讲话全文 引述他在葡就职时葡总统说过的一句话: 中葡建交后, 澳门将成为中葡间的基本联系 葡总统对澳门极其重视 [N]. 华侨报, 1979-03-01 (5).
- [7] 澳督对葡国报纸谈澳门前途 强调中国并未寻求解决办法 昨日刊出该项消息译文与原意有重大出入 [N]. 华侨报, 1982-12-26 (4).
- [8] Macau leaders bet on a stable future [N].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4-02-03.
- [9] 葡副总理对法新社记者谈话 澳门不存在九七问题 繁荣稳定对各方有利 中葡友好关系加强 寻求广泛合作 [N]. 华侨报, 1984-05-05 (4).
- [10] No 1997 for Macau [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4-06-20.
- [11] Macau's horizon is far beyond 1997 New projects are long-term [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84-07-03.
- [12] 葡总统接见澳督高斯达 历时两时半谈及澳门现况 澳督称中葡双方均未提及对澳谈判 [N]. 华侨报, 1984-07-15 (3).
- [13] 邓小平接见港澳国庆观礼团谈话记录 [N]. 华侨报, 1984-10-07 (3).
- [14] 廉辉南. 澳门: 她的两个过渡 [M]. 曾永秀, 译. 澳门: 澳门基金会, 2000: 230.
- [15] 中葡两国同意近期内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N]. 人民日报, 1985-05-24 (1).
- [16] 中共官方首次透露 港澳主权同时收回 鲁平告日本访客 内部观点显归一 [N]. 星岛日报, 1985-07-21.
- [17] 高斯达说统治五百年感厌倦 葡国考虑离开澳门 谴责北平说话太多 葡副总理将到访研究前途问题 [N]. 中国时报, 1985-08-15.
- [18] 澳督否认两年撤离 澳门交还中国有待会谈解决 日前接受访问只谈及解决方法 马万祺说个人意见都不可做准 [N]. 华侨日报, 1985-08-16.
- [19] 专业人士及教育界访北京 李后鲁平接见谈澳门问题 反映澳门居民普遍对回归过渡期表示关心 盼培养人才 实行公务员本地化中文合法化 [N]. 华侨报, 1985-08-23 (3).
- [20] 解决澳门几项原则 李后指明与葡商谈 [N]. 快报, 1985-09-09.
- [21] 谢后和, 邓开颂. 澳门沧桑 500 年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4: 347-348.
- [22]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澳门事务司编写组. 澳门问题读本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37.
- [23] 珠海市档案馆. 解密珠海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39.
- [24] 冷溶, 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下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1049.
- [25] 澳门前途会谈设席钓鱼台 周南北京迎葡团长 称日后谈判伙伴式 获得麦端纳附和表示“完全同意” [N]. 星岛日报, 1986-06-28.
- [26] 周南在葡外长宴会上讲话, 中葡抱有共同信念, 早日解决澳门问题, 葡总统接见周南并接受访华邀请 [N]. 大公报, 1986-11-20.
- [27] 宗道一, 等. 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314.
- [28] It's official: Macau reverts to China after 1997 [N]. Hong Kong Tiger Standard, 1986-10-24.
- [29] 周南在葡突然取消游览, 商澳门问题似呈分歧, 晤总统苏亚雷斯后失笑容拒记者会 [N]. 星岛日报, 1986-11-20.
- [30] 周南副外长结束访葡回国时说 中葡都希望迅速圆满解决澳门问题 [N]. 人民日报, 1986-11-24 (6).

- [31]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我 2000 年前坚决收回澳门 [N]. 人民日报, 1987-01-01 (1).
- [32] 国务会议历四小时 总统总理出席 葡国高层会议透露 澳门 99 年归还中国 强调维持中葡友好合作和澳门稳定繁荣 [N]. 大公报, 1987-01-08.
- [33] 葡九九年退出澳门 国务委员会会议同意 今年将与中共签《协议》 [N]. 香港时报, 1987-01-08.
- [34] 张春生, 许煜. 周南解密港澳回归——中英及中葡谈判台前幕后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178.
- [35]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 三月二十六日将在北京草签 双方第四轮会谈对协议本文内容取得一致意见 [N]. 人民日报, 1987-03-24 (1).
- [36] 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8.
- [37] 澳门文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澳门回归历程纪事: 第 2 辑 [M]. 澳门: 澳门文史资料工作计划有限公司, 2006: 42.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上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508.
- [39] 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 [N]. 北京: 人民日报, 1955-10-26 (4).
- [40] 新华社澳门分社. 澳门问题资料续编 (内部发行) [M]. 澳门: 新华社澳门分社, 1984: 124-125.
- [41] 新华社澳门分社. 澳门问题资料续编 (内部发行) [M]. 澳门: 新华社澳门分社, 1988: 233-240.
- [42] 逢先知, 冯蕙. 毛泽东年谱: 第 4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30-531.
- [43] 逢先知, 冯蕙. 毛泽东年谱: 第 6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30-531.
- [44] 黄文放.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 [M]. 香港: 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 1997: 10.
- [45] 葡代表团消息播自澳门电台 澳主权权交接期 将在一九九七后 [N]. 香港时报, 1986-10-24.

责任编辑: 孙德魁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意涵

程同顺 王雪珂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集价值信仰、理论内涵、制度架构、体制机制、政策运行、实践操作等丰富内容于一体的复合框架, 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年民主革命、民主建设、民主改革道路的理论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意涵包括: 政治要素上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首, 经济要素上以公有制为基, 价值要素上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本, 程序要素上以全阶段、全时态、多层次、多领域为体。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为基本内容, 以“人民”为根本取向, 以“全过程”为核心特征,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基于我国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与新时代政治实践发展形成的新型话语表达, 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两大显著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对“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价值导向的坚守, 以及对兼具积极性、有效性的民主绩效的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整性则融汇着时间维度上全阶段、全时态的横向民主, 以及空间维度上多层次、多领域的纵向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在理论上、实践上、宣传上聚焦“全过程”, 逐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吸引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关键词: 民主; 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 西式民主; 话语权; 民主话语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1-0039-12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1.004

作者简介: 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王雪珂,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天津实践与创新”(TJWT21-07)

引用格式: 程同顺, 王雪珂.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意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39-50.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2019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大论断^[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连，强调党在新的征程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2]。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021 年 3 月，修改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在总则部分新增规定，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在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要求中，该法增加了“充分发挥在全过程民主中的作用”的表述^[3]。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开始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良好的成效。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新型民主形态自提出起便成为学界讨论与关注的焦点。学界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与本质、环节与过程、人员与要素，到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与政策以及应该遵循的范围与限度，对这一新型民主形态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局限于较为宏观的概念厘清与界定、自上而下的政策研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关注较少。本文立足“全过程”一词的基本话语意涵，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程序环节与绩效结果结合起来分析，力图揭示中国特色民主模式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意涵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词法剖析，可拆分为“全过程”和“人民民主”两个部分。“全过程”作为“人民民主”的修饰语和限定语，是人民民主的内在外在体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和完善之后在新时代的表现形态进行的新凝练与新总结^[4]。从词性溯源，“民主”（Democracy）由古拉丁文中的“demos”（人民）与“kratia”（统治或权威）共同衍化而成，意为“由人民进行统治”，可见“人民”与“民主”本身便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然而人民概念在古代西方其实仅仅指向于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将女性、奴隶等底层弱势群体排除在外^[5]。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人民”概念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渐与国民、公民等概念混为一谈。而我国人民民主中的“人民”则指向工农联盟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这一注重阶级性和整体性的概念界定，既保证了民主范围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又可避免无限扩大民主导致的乱象。

“全过程”着力强调我国民主在链条延续性、环节完整性等方面呈现的全阶段、全时态、多层次、多领域的突出特征。如果说人民民主概念的不同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对手式、竞争式民主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全过程的概念则使之与西方国家仅仅注重定期选举的间歇性民主区隔开来。人民民主与全过程的结合在实现方式与绩效结果方面形成了协商共识型民主和回应式民主的创新。“人民民主”与“全过程”的创造性叠加，是民主理论与中国具体民主实践的结合，是实质性民主与程序性民主的结合，同时也是民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民主道路的正确性。

学者们以政治学视角审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意涵，进行了一系列全新的阐释。从民主的概念与本质着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上等同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有质的坚守，也有坚强的领导与法律的保障^[6]。从民主的环节与过程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完整的政策过程链条，是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五大环节相融相嵌、相辅相成的过程^[7]。从民主覆盖的人员与单位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范围应该包含当家作主的全体中国人民与具体执行人民公意的各党政部门。从民主价值赖以落实的制度与政策而言，各项民主制度与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共同运行，是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顺畅运行、人民意见得以有效表达的基本保障^[8]。还有一些学者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入手，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统一的完整的公共事务运行过程，或是一种参与主体的有效互动过程，包括提出诉求过程、解决诉求过程、决策过程、立法过程、沟通与协商过程、自治过程等^[4]。本文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意涵为：政治要素上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首，经济要素上以公有制为基，价值要素上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本，程序要素上以全阶段、全时态、多层次、多领域为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实的民主

古希腊时期众哲人将民主的价值界定为实现多数人的共同福利，启蒙运动时期霍布斯、卢梭、洛克等西方政治哲学家进一步提出并完善了人民主权理论。此种价值理念衍生出简单的多数人统治和古典主义的实质民主，并长期以来占据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大半江山。这种将民主价值奉为高阁的实质性民主，在20世纪遭到了韦伯与熊彼特等众多西方学者的反思与批判，与此同时开始了实质民主向程序民主、大众民主向精英民主的转变。程序民主将关注点从宏观的民主价值高度转向了更为现实的民主运行过程，从而将民主概念界定为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精英领袖（政治家）来作出决策的过程，也即“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9]。程序民主最终走向了西方现代国家普遍采用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从而将民主与选举画上了等号。民主的价值性取向逐渐走向了方法性、手段性与工具性取向，而选举之外的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却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随着现代国家的逐渐发展与演变，民主越来越被广泛地认可为一种共同价值，同时也在世界各国的具体政治实践中诞生了越来越丰富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机制。民主的多样化发展恰恰证明了“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10]。然而，当今西方部分国家仍然将民主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画上了等号，在形式上逐渐把民主简化为单一的竞争性选举，正在逐渐背离民主的“人民性”价值本质。西方政治家对民主的简单判断标准不仅忽视了民主在价值、形式与过程等方面的统一性，也对世界各国多样化的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视而不见。中国民主超越西方民主的地方，“不仅体现在其价值与制度框架的真实民主性质导向之上，还体现在其实践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的高效民主质量导向之上，全过程民主就是这种民主实践形态的集中体现”^[6]。按照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概念来理解，古典的实质性民主实际上是“纯粹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程序性民主则是“对手段、目的与附带的后果进行‘合乎理性的权衡’”的“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11]。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

值合理性层面符合“人民统治”这一核心价值^[12]，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在工具合理性层面注重和讲求民主治理绩效，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过程民主”。可见，中国民主真正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了形式与内容、价值与目标、实质与程序的统一。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导向：人民当家作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所秉持的人民价值取向，来源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朴素的民本思想。其中“全过程”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天下”政治观，“人民民主”则衍承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观^[4]。这种兼具政治性与哲学性、道德性与法理性、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传统政治理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民主建设与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历经继承、改造、创新与升华，逐渐发展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3]论断便是对此种历久弥新的民主理论的朴素概括。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与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是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在价值导向上的最大区别。脱离了把民主价值与意识形态话语相等同的窠臼，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自然而然地成为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形式的民主还是真实的民主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4]。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话语，在权力归属上体现为“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就应该处于人民的控制之下，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即对人民负责”^[15]；在政治制度上体现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一以贯之的人民本位理念；在政策运行过程上体现为保证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以人民之智理人民之事。具体到民主的实践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传统民主理论收缩于“选举周期”的认知框架，面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这个枢纽，即导向全体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共管共治^[8]。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标导向：积极有效的民主绩效

全过程人民民主除了在价值导向上表现出显著的以人民为本位的特征，在目标导向上也以其积极性、有效性与西方民主区别开来。其积极性主要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在服务人民、切实满足人民需要的同时，引领具有普遍凝聚力和号召力的责任感、信念感、认同感、道德观、法律观与价值观，引导全社会形成正向的良好风气，激发社会的正能量。这种积极的情感价值深植于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中，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正向目标内化于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相反，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对三权分立、多党制、一票制等分权制衡制度的过分注重，虽在常态社会当然有监督政府、制衡权力等积极意义，但在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突出时，极易导致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现象。同时由于选举民主本身的暂时性与间歇性特征，民众只有在选举时才能短暂地感受到民主的存在，无法在全社会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民主氛围。因此，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众开始质疑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内核已经遭到破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却远远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其制定的公共政策也越来越倾向于维护政府高官和富有阶级等社会上层的利益，从而在广大民众心里埋下了对政党以及国家不信任的种子^[16]。民众在落差中逐渐产生了对民主政体的失望情绪，从而“宁愿在选举日待在狭隘的私人领域里，而懒得出

去投票”^[17]。此种“选举民主的困境”与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出的积极性相比，更多地表现出消极性的特征^[18]。

如果说民主的积极性结果是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是“真正的民主”的标准的话，那么民主的有效性结果则更能够判断其是否是“好的民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19]党和国家取得的光辉成就恰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的积极绩效的最好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全社会形成民主之积极氛围的同时，其更重要的目标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维护人民的利益、回应人民的需求、解决人民的困难、提高人民的福利、谋求人民的幸福，从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1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始终被放置在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突出位置。从推动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就业率提升、深化教育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改善住房条件、攻克贫困难题，到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真正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人民之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得以彰显。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完整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内在蕴含着时间与空间两大分析维度。时间维度指向横向轴线上的过程性，意为我国民主政治在平行环节链条上的衔接性与民众参与在时态上的完整性；空间维度则指向纵向轴线上的过程性，意味着我国民主政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在从地方到中央、从基层到高层的各个层级显现出的深度与广度。这种横向时间维度的民主与纵向空间维度的民主有机融合起来，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空的完整性特征”^[20]。民主政治体系的建构过程一般包含价值、理论层面与操作、实践层面两个方向，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真实性的探讨更多是基于价值及理论层面，而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具体政治社会实践当中过程性与完整性的探讨，则需要转向对时间与空间层面具体制度设计与政策运行的分析。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间维度：全阶段与全时态

著名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曾着重强调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时间是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要素。事实上，所有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都具有过程的特质，是通过时间加以整合起来的。”^[21]从时间维度审视民主，实际上也是从民主程序的角度来考察具体的民主实践与民主过程，集中着眼于民主是如何通过程序性的方式方法浸润在政治生活当中，让人民可以随时随地、没有时间限制地参与民主。“程序是制度的生命，没有程序的制度，是一种虚幻的、观念上的制度。”^[22]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民主的程序主要体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五大环节。这五大环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将制度与程序紧密串联为一

体的过程，也是保障全体人民民主权利、向人民赋权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23] 全过程人民民主权利的享有保证了中国人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方式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反观西方，人民参与民主政治的渠道越来越局限于选举这一环节，除此之外很难通过更为直接的方式影响决策的制定，从而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时态的鲜明优势由此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重视民主选举，而且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决策，参与对日常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以及对于各级公务人员的民主监督。也就是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性集中体现在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性。作为民主政治程序链条首个也是最基本环节的民主选举，与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互对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了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政治逻辑，确保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享有者与行使者，从而使人民中心的民主核心价值得以贯彻。在继承和保留选举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精华的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出了一条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民主与法治相联系、民主与协商相融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民主选举程序实现了民意的集中，另一方面通过高效的民主决策与立法程序实现了民智的集中。与以选举民主和立法民主为核心工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辅相成的是以协商民主为基本原则的政治协商制度。人民通过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式，选举出最能代表自身利益、最符合民心所向的各级人大代表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决策机关，同时通过多样化协商沟通的方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民主决策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第二个环节，是一种将民主性与科学性有机结合起来“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24]。其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制定草案、征询意见、专家讨论、听证论证、监督审查等决策过程，在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等阶段都需要保证程序的透明性、方法的科学性、内容的公开性、责任的明确性以及监督的合法性。民众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等途径，通过听证会、恳谈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以及实地走访和网络征询意见等多种方法真正地参与到民主决策的过程中来。此外，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保障的民主管理环节则主要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依托，以群体性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文化事务等公共事务为内容。民主监督作为民主程序的最后一环，强调广大人民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和方式对国家各级公务人员进行监督，以保证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有序开展，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有效行使。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维度：多层次与多领域

“空间之于民主，不仅关乎形式，甚至关乎内容。”^[25] 空间可以按照自然形成的地理空间以及建构形成的政治空间进行二分。前者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地域、疆界等实体性概念，后者则包含了国家与社会在建立过程中逐渐演变出的更为复杂抽象且层级性更强的空间内涵。从民主概念诞生伊始，民主的空间规模问题便饱受争议，民主与小规模国家更为适配的观点在 20 世纪民族国家占据国家形态主流之后逐渐消解。在此基础上，体量更为庞大的大规模空间中的民主形式即代议制民主，与小空间范围内的自治型民主，将民主与空间的关系再次带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当中。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社会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型社会”，无论是在地理意义抑或政治意义上的

空间范围内，都决定了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或借鉴西方民主，而是必须依据中国复杂的具体政治实践发展更加多元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26]。一方面，中国作为大型民族国家，超大体量带来的资源分配问题、价值统一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政治发展问题等都对民主的实现路径与操作方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密集的人口规模和广阔的地域规模又为中国民主提供了丰富的发展条件与创新空间。

从空间维度理解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其主要表现为多层次与多领域两个特点。从空间的层次性来看，国家、地方各级、基层政府、社区等都是我国贯彻人民民主的场所；从领域性来看，政治、经济、社会等国家各领域的公共事务，都有人民参与民主政治实践的身影。人大立法、地方决策和执行、政务热线、基层群众自治、参与式预算、人民信访等，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不同层次和领域的多样化表现形式。

以空间边界划分国家、社会管理体系，一般可分为国家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与管理的较高政治层级，和国家权力向下拓展形成的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的基层政权。基层处于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托底位置，是国家权力控制与民间自治力量的结合点。具体到民主的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则体现为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保护型民主与自治型民主、代议制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的结合^[27]。一方面，在高层级的治理空间，人民通过间接民主的形式选举代表行使民主权利，而向下落实到地方基层，如何在小规模的人群内部实现民主的有效性，拓宽以参与、协商、沟通等为基础的基层民主渠道则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对基层立法联系点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基层民主形式的考察中首次提出了“全过程的民主”概念。这充分证明了基层民主是体现我国民主之“全过程”特征的关键政治密码。所谓基层民主，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在城乡基层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8]。我国基层民主以共识为基本目标、以协商为基本方式、以平等为基本取向、以公开为基本保障，并在具体的基层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创新形态。除了传统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外，近些年来又逐渐产生了“以重大立法、重大规划、重大决策、重大项目为主的立法联系点制度、（网络）意见征求征询会、专家座谈会、听证会、恳谈会、评议会、议事会等决策、议事、协商的直接民主机制体系”^[6]。例如，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作为全国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从国家法律的修改到关涉每位居民切身利益的电梯加装、垃圾分类的建议征集，六年来共进行了20件国家法律和64件地方性法规的征求意见工作，提交立法建议6500多条，获得采纳530多条^[29]。北京顺义区仁和镇则设立了分级协调机制，形成人大代表进“家”“站”等特色基层立法模式。除此之外，还有四川省彭州市的“社会协商对话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东镇的“圆桌议事会”等多种协商议事模式。多种多样的基层民主形式从根本上提高了基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积极性，让民主真正做到了入人心、通人情、解人难^[30]。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层级又可以由点及面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性空间。自由主义民主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分为基本理论取向，从而主张将民主限定在政治领域之内，使得经济和家庭等基础的社会领域免受民主规则的审视。社会主义民主则认为民主应该“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经济的领域中实行”^[31]。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在理论与实践将民主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领域，提出了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等新型民

主概念^[32]。我国的经济民主从宏观维度看表现为国家对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环节进行整体性配置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规划、经济管理等要件，继而在实现利益公平、协调公权与私权等方面体现人民民主的精神内核^[33]。从微观角度看，经济民主体现为全体劳动者参与经济组织（如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活动的民主形式，通过民主手段调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实现经济管理模式的民主化。宏观与微观的经济民主一同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实现最高层次的经济民主——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34]。社会民主生发于与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从西方的民主实践出发，哈贝马斯主张维护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得出“争取和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结论。在我国，社会领域的民主主要表现为基层民主，与以各类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甚至网络虚拟空间为依托的民主形式。以“公共性”和“非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的各类民间组织，可以通过“利益聚集、表达和实现功能”帮助“改善政府管理，分担政府管理事务，减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绩效”；同时在公共卫生、公共医疗、生态环保、权益维护等方面，各类基层社会组织也发挥出独特的作用^[35]。此外，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大量以互联网虚拟空间为依托，以微博、微信和短视频、APP 等新媒体为平台的网络民主形式逐渐进入民主的社会领域，并凭借其直接性、高效性、隐蔽性等特征极大地提升人们参与民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虚拟空间逐渐成为人们发表意见和诉求、行使民主权利的新空间。

四、全面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

西方国家在 21 世纪遭遇的一系列民主困境，如民主制度的僵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盛行、政治极化、身份政治的兴起等，让民主这一崇高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反民主”的潮流。然而，民主困境并不能成为民主价值消亡的理由，西方民主道路的经验也不能成为检验我国民主政治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发展和完善了”^[36]。民主是一个“践行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点滴式”渐进发展的，“民主政治永远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不是一个‘完成时’”^[17]。未来如何在汲取西式民主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继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必须具备“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在理论上、实践上、宣传上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步提升中国民主的吸引力、竞争力和话语权^[37]。

（一）理论上：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术研究

西方民主理论历经发展与演化，出现了从大众民主到精英民主、从一元民主到多元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到参与式、协商式民主的变化趋势。但无论理论上如何变迁，西方民主实践仍然表现为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环节的民主模式。西方学者通过改造民主的概念、性质与模式等内核，逐渐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政体与民主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不符合西方民主话语的便不是真正的民主。在这种民主话语霸权之下，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中国民主理论的研究无疑具有“强心剂”的作用，是从学理上创新民主发展模式、建构中国民

主话语体系的关键一环。政治学是安邦治国之学，对国家治理、政治发展、社会稳定等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意义重大^[38]。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应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立场，秉持人文关怀、回应时代命题，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突出优势，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9]的民主话语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政治学指明了民主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课题与新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需在延承以往民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与创新。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制度民主论、机制民主论、权利民主论、结构民主论和自治民主论等几大类型，从制度与机制、结构与过程、权利与利益、主体和对象等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讨论^[40]。但同时不难看到，我国的民主理论研究在方向上更多着力于对概念的解剖，缺少对实质内容的分析；在方法上更加注重规范性，实证方法的应用仍显薄弱；在取向上更倾向于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在理论上的创新观念不足，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在对象上以政治民主为主要着眼点，对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民主理论关注还有欠缺。针对这些问题，未来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应该立足民主理论的创新和深化，以我国民主政治体系架构为研究内容，以多样化的操作方法为研究工具，以理论引导实践为研究取向，以横向的全过程与纵向的全领域为研究对象，建立一套既遵循共同性的民主价值理念，又符合具体性的民主政治实践的民主话语体系和民主评价标准。

（二）实践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发展

“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作用。”^[41]民主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取得了众多突破性和实效性的成果，但在体制机制、程序规范、执行操作等方面还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除了深化理论研究之外，还应该继续推进实践的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进行的高度凝练和总结，同时也是未来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引。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横向延伸人民民主的程序链条，涵盖国家政治生活的全时段；纵向拓宽人民民主的空间范围，覆盖人民参与民主生活的全领域。

从横向环节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程序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建设。我国民主政治体系已经完成了基本框架的建构，即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遵循，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制度保障，以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基本形式。未来民主实践所要落实的就是在已经搭建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框架上添砖加瓦，重点在民主程序中的关键环节和关键要素上下功夫，让民主在实践中真正运转起来。这一关键环节和关键要素可以理解为作为最广泛民主实践的“民主治理”^[42]。民主治理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三个环节统合起来，要求将民主落实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将更加多元的主体（如社会自组织）纳入到民主政治的实践轨道中来，使民主成为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工具^[43]。从纵向环节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在民主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将民主思想融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让民主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政治理想，而是真正渗透进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宣传上：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体系

政治宣传对于构建政治合法性、形成公共舆论和推进政治民主有着独特的作用^[44]。从全球范围

看，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宣传话语中日益成为一种利益表达与争夺、污名化别国政治制度的工具和手段。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政治宣传极力推崇和褒扬资本主义民主，从而质疑和否定中国民主政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政治宣传实际上演变为一种政治营销。在政治宣传媒介与平台更为多样化、宣传受众更为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的民主话语宣传更要站稳立场、注重方法、创新内容，更好阐明中国的民主历程、讲好中国的民主故事、宣扬中国的民主理念、展示中国的民主成果。

传统的针对民主话语的政治宣传主要集中于政务媒体的报道、领导人讲话、学术界的相关政治评论，这种宣传模式虽然具备时效性、精准性和教育性等特征，但对内民主的氛围覆盖性还不足，对外民主的宣传度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断，无疑是一次对内对外牢固树立中国民主形象的契机。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本内容，未来的政治宣传工作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增加民主政治宣传的场所。政治宣传不应仅仅集中在网络这一传播平台，更应该从城市到农村，深入到高校、社区、企业、农村等基层单位，以基层党委为主要抓手，真正做到宣传入人心。其次，创新民主政治宣传的方法。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宣传不能仍停留于讲稿似的文字形式，应该以实践为立足点，通过更为生动形象的宣传方法，以讲故事的形式将抽象的民主叙事转化为具体的民主现象，让“宣”和“讲”真正结合在一起。最后，建构民主政治宣传的国家话语。对内政治宣传旨在让中国人民更加认同中国民主，对外政治宣传则力图让世界人民更加相信中国民主。因此必须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且利于国外民众理解的话语体系，逐步提升中国民主的话语权。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话语表达，是集价值信仰、理论内涵、制度架构、体制机制、政策运行、实践操作等丰富内容于一体的复合框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年民主革命、民主建设、民主改革道路的理论总结。民主发展的实践过程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真实、最广泛、最有效的民主，证明了中国的民主理论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体系。全球化、数字化、多元化逐渐成为世界发展潮流，既使民主面临挑战，也为各个国家民主发展带来了创新空间。因此，未来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上拓宽民主的概念内涵、丰富民主的表现形式、深化民主的制度改革，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性与科学性，建构扎根中国具体民主实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民主话语权，具有学理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EB/OL]. (2019-11-03) [2021-12-22]. https://www.ccps.gov.cn/xtt/201911/t20191103_135416.shtml.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3] 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EB/OL]. (2021-03-11) [2021-12-22].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3N2U3NWY4ODAxNzgyNDE4MzMwNTNjNTY%3D>.
- [4] 刘九勇.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J]. 政治学研究, 2021(4): 18-26.
- [5] 谈火生. “民主”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再生[J]. 清史研究, 2004(2): 34-45.
- [6] 唐亚林. “全过程民主”: 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J]. 江淮论坛, 2021(1): 68-75.
- [7] 祝灵君. 推进全过程民主离不开党的领导[J]. 探索与争鸣, 2020(12): 5-8.

- [8] 孔繁斌. 全过程民主: 政策参与过程优化的新情景 [J]. 探索与争鸣, 2020 (12): 20-23.
- [9]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M]. 吴良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00.
- [1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9 月 21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12.
- [11]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6.
- [12] 曾毅, 杨光斌. 西方如何建构民主话语权——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解析 [J]. 国际政治研究, 2016 (2): 64-81+4-5.
- [13]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党建, 2021 (4): 4-11.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7.
- [15] 张贤明. 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 责任政治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6): 28-34.
- [16] 程同顺. 2016 国际民粹事件为什么“扎堆”出现 [J]. 人民论坛, 2017 (1): 18-22.
- [17] 程同顺, 张国军. 民主的回归——从选举民主到过程民主 [J]. 探索, 2012 (1): 53-59.
- [18] 居伊·埃尔梅. 老牌民主国家: 对民主的冷淡 [G]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民主的再思考.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4-35.
- [1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5-8).
- [20] 张明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 (9): 31-37.
- [21]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M]. 郑作彧,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88.
- [22] 吴小英. 对“程序优先原则”合理性的几点思考——兼论程序的价值 [J]. 学术论坛, 2007 (6): 151-154.
- [2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22 (2).
- [24] 王绍光, 鄢一龙, 胡鞍钢. 中国中央政府“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出台 [J]. 中国软科学, 2014 (6): 1-16.
- [25] 高民政. 空间与民主: 西方的探索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探索与争鸣, 2011 (11): 53-57.
- [26] 王沪宁. 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 [G] // 高民政. 中国政府和政治. 济南: 黄河出版社, 1993: 序言.
- [27] 周亚权, 孔繁斌. 从保护型民主到自主治理——一个多中心治理生成的政治理论阐释 [J]. 南京社会科学, 2007 (9): 70-76.
- [2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0.
- [29] 张维炜, 孙鑫. 上海: 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 [J]. 中国人大, 2021 (16): 47-48.
- [30] 张雪松, 李凯, 王萍. 北京人大: 立法“民意征求”直通一线,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实践 [J]. 中国人大, 2021 (15): 27-28.
-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2.
- [32] 乔贵平. 经济、社会领域的民主 VS 政治民主——20 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民主范围的争论 [J]. 理论月刊, 2012 (8): 119-123.
- [33] 曹芳. 经济民主思想研究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80-98.
- [34] 蒋俊明, 陈佳楠. 我国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发展的策略调整 [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4): 43-49.

- [35] 燕继荣. 民主: 社会资本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J]. 学习与探索, 2009 (1): 60-65.
- [36]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9 月 5 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06 (2).
- [37]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8-01-06 (1).
- [38] 耿召, 上官酒瑞. 政治学“补课”有方 全过程民主发展有根——“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 40 周年暨全过程民主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J]. 党政论坛, 2021 (2): 59-61.
- [39]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5 月 17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5.
- [40] 商红日. 对中国学术界民主理论的归类分析 [J]. 政治学研究, 1996 (4): 14-20.
- [4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2016 年版)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33.
- [42] 余逊达. 民主治理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3 (1): 30-33.
- [43] 彭勃. 民主也是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工具 [J]. 探索与争鸣, 2015 (6): 57-61.
- [44] 张宁, 吴文顺. 网络政治宣传的对抗式解码及其内在逻辑解析 [J]. 新闻界, 2017 (6): 44-49.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刘伊菡



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李应瑞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百年奋斗历程。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是当代问题, 但其理论与实践探索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 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无产阶级民主主张到工农民主专政国家建构尝试、从工农民主向人民民主的话语演进与实践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倡导到国家制度体系的革命性转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民主的曲折发展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建构与创新实践这五次历史性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奋斗历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集中体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走自己的路等六个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政治领域的时代产物, 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

关键词: 民主话语;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民主; 西式民主;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1-0051-17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1.005

作者简介: 李应瑞,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引用格式: 李应瑞. 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51-67.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视角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便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对民主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系统论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重要特征、显著优势，阐明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价值，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思想指引。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话语的新表述、新概括，近期以来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内涵、理论基础、制度特征、发展机理、实现逻辑、制度优势及其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等方面进行探讨。比如，刘九勇分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1]；许耀桐探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问题^[2]；秦德君从国家制度视角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度支撑与实践体系^[3]；张伟军从新型民主政治观视角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及价值定位^[4]；张明军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5]；张君理清民主实践的基本层次，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渠道和主要着力点^[6]；樊鹏通过比较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7]；蒯正明^[8]、鲁品越^[9]、李海青^[10]等人探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详细地研究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问题。然而，现有研究成果侧重于现实理论分析，而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演进问题论述较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6]，只有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才能较为全面地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问题。当前，相关学者从不同层面触及人民民主的发展演进问题。一是研究领导人的人民民主思想。比如项启源探讨了邓小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问题^[11]。二是从思想史视角把握人民民主思想。比如，张伟军在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基础问题时，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民主探索实践作出简要探讨^[4]；王宗礼围绕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百年探索与实践^[1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民主的发展问题^[13]进行了探讨；王珂、陈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百年探索的政治逻辑及当代启示^[14]；尹世尤、屈雅雅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建设的实践探索及经验启示问题进行了梳理^[15]；杨雪冬、黄小钊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的百年探索及经验进行了简要梳理^[16]。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及发展脉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还没有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来。

虽然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是当代问题，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是人民民主，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正如《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是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史。”^[17]正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来的实践探索、深化认识和创新发展的，人民民主才在当代中国展现出全新发展形态。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奋斗史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呈现出从“无产阶级民主”到“工农民主”和“人民民主”，进而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脉络。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愈发激烈，而归根到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同时也是一项制度安排，在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些西方国家试图以所谓“自由民主制”来垄断民主话语权，以自身喜好干涉他国的民主实践。特别是美国于2021年12月召开所谓“民主峰会”，肆意歪曲、抹黑中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中国在回应谬误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至关重要。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完整地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有助于更完整地把握中国式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由来和发展逻辑。这对于更清楚地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从无产阶级民主、工农民主向人民民主的理论实践演进

面对近代中国的多重危机，民主作为一种启蒙理念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便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然而“当时国人所接受的民主话语实际上是西方的纯粹舶来品”^[10]。随着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等西式国家制度模式在中国实践的挫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将眼光投向北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救亡学说在中国得到初步传播。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呈现民主话语纷呈、谱系复杂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同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相并存、相斗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便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革命、国家政权建构和制度建设尝试的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工农民主”向“人民民主”的发展，建构起既不同于欧美式资本主义民主，又显著区别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体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中国式民主话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第一，从建党初期的“无产阶级民主”主张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专政国家建构尝试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开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依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观点来理解民主。李大钊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18]党的一大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写进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党的二大开始立足中国革命实际，提出革命两步走战略，指出低级纲领是“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实行“与贫困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第二步奋斗^{[19] 133}，首次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党的三大进一步提出国共合作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广州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权建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反思革命失败教训时调整民主话语策略，形成工农民主专政构想。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无产阶级民主”主张正式转向了工农民主专政国家建构尝试。一方面，苏维埃共和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强调“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20]，赋予了苏维埃共和国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另一方面，苏维埃共和国坚持民主与专政相统一，“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20]。这一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国家建构尝试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局部地区执政、领导人民探索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这一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国家建构尝试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忽视了中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在农村的客观实际，主张“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20]，比较强调工人阶级、贫雇农在苏维埃政权构成人员中的占比，在充分凸显苏维埃政权的工农联盟性质的同时，也造成了政权代表性的受限。

第二，从工农民主专政国家建构尝试向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发展，新民主主义民主话语开始形成和发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在 1935 年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阶级主体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加入“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21]，大大扩展了民主实施的对象。然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主要还是局限于苏区内，难以满足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需要，仍不符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此，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转而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毛泽东认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22]毛泽东在 1939 年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概念，表示共产党人革命目的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23]，在 1939 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继而在 1940 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话语，系统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民主话语正式形成。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所采取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特殊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从国体来看，它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从政体看，它是“民主集中制”，是“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23]⁶⁷⁷。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形态中，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张相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起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同时，各级政权机构人员组成“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23]⁷⁴²，切实将民主政权建设同保

障人民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第三，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张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正式确立起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的国家制度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24]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也强调要废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行人民民主制度”^[25]。在充分反映民主联合政府的广泛性和民主性的同时，先前的临时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正式转向了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目标。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等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有各革命阶级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九月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新中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并且指出“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军队，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26]。同时，毛泽东还提出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必须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求“扩大与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提醒注意“建立解放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扩大各级人民民主政府的正常的民主生活问题”^[26]⁵¹⁶。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走向成熟。

总体说来，形成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为争取民主、反抗压迫和剥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建构经历了从‘无产阶级民主’、‘工农民主专政’再到‘新民主主义宪政’，最终发展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演变历程”^[27]，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和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始端，民主建设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这一时期的探索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的民主是不同于西式民主的人民民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不断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了发展道路、提供了方法论启迪。

三、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向国家制度的革命性转变

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同时还表现为国家制度安排。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基本主张往往都是辅以相应的国家制度方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人民民主正式从价值理念倡导转变为国家制度形态。同时正如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2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所实现的人民民主实质还是新民主主义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政权巩固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实现了人民民主从新民主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性转变。

第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构起人民民主国家制度和权力体系。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人民民主的理论主张只有依托国家政权、上升为国家制度，才能得到完整实现。人民民主从理念倡导向国家制度的转变，首先是通过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文件体现出来，这些法律文件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及国家机构设置、制度安排。从国体来看，《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29]。这既突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规定了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阶级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性质。从政体来看，《共同纲领》强调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26] 760}。而在国家机构设置及其组成人员层面，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立政务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司法系统等机构，其组成人员基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主爱国人士以相应比例组成，也充分体现了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人民民主政权也伴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而相继建立起来，到 1951 年底基本建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是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按照《共同纲领》设定的国家制度建设任务，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54 年 9 月，在全国各地相继选举产生人大代表、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性质。《宪法》序言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0]。《宪法》总纲第一、二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30] 522}。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宪法》中占据很大篇幅，《宪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详细规定了人民民主权利。同时，会议还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文件，完整确立起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框架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

度支撑。

第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人民民主从新民主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性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中，人民民主本质上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表现为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同时还需要无产阶级充分利用国家政权优势来变革传统所有制关系，推动政治解放向经济解放、社会解放发展，没有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25] 1471}。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新民主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多是承担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31]，所实现的只是政治解放，还有待进一步推进到经济解放、社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32]，正式明确了通过变革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并在同年12月进一步完善这一路线，由此开始了推进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经济剥削、阶级压迫的所有制基础不复存在。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民主的政治性质也由此发生革命性转变。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31] 248}，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正式建立。而且，党的八大在明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展人民民主指明了方向。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先前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被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人民民主也从存在着异质性阶级利益诉求的新民主主义民主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阶级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33]。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为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双重保障。

总体说来，实现人民民主从一种价值理念到现实国家制度安排的转变、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民主发展进入新纪元，人民当家作主从梦想成为现实。特别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定并不断发展，中国的民主大厦巍然耸立起来”^[17]。这奠定了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制度原则、指明了发展方向。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创造性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实践探索中，围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行了开创性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诸多新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深刻阐释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实践要求，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提供了思想指引。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丰富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创造性发展。

第一，明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看似目的，实则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突破将民主看作服务经济基础的手段的认识，将民主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予以高度重视。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34]。在他看来，民主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征和发展目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没有高度的民主便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将高度的民主同高度的物质文明相并提，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和任务。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予以确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突出发展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譬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3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立足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35] 1726}；表示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将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第二，加强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人民民主的实现需要以相应的国家制度体系为支撑。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将制度问题作为一个根本性问题提出来。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4] 14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一方面，恢复“文革”期间被严重破坏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另一方面，

与时俱进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法律文件，明确了新时期国家制度建设的新要求，有力推进了人民民主的制度化。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我国的国体、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及公民权利，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走向正轨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也相继颁布，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显著提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人民民主制度的建设目标和发展要求，明确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多措并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和实现。

第三，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是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始所要实现的便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民民主。在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1979年3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强调，“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34] 176}，明确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建设的原则。在1987年6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洛舍茨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36]在他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决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保持好自身制度优势。随着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稳步推进，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国家制度，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和制度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表示“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6] 240}，党的十四大提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7]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阐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依照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在发展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由国家机构来行使专政职能。党的十六大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宝贵经验，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35] 1256}，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密切关系，正式确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基本框架。自此，中国的人民民主建设都是在这一框架内展开。

总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系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发展人民民主的经验教训，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开辟和发展了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明确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框架和战略方向。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巩固和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丰富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和社会物质基础更加坚实。

五、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下，全面总结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拓宽民主内涵，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形成了中国式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

第一，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多措并举推动民主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教化或政治口号，而是需要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践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人民对民主发展有了新要求、新期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多措并举，民主发展取得革命性进展。一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强党对发展人民民主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主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确保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发扬民主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相统一，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发展人民民主提供了典范。二是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国家制度体系，为发展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扩展民主内涵，创新民主形式，全面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协同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同发展，不断扩宽、扩大人民依法有序参与渠道，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共同发展，夯实人民民主的物质基础。相较于西方社会将民主限定在政治领域的选举民主，人民民主注重政治民主向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经济民主不仅体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下人民充分享有自主发展的经济权利，更是体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家制度建设同解决人民现实生活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团结带领人民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目标，同时也为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深化对民主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理论创新往往

是伴随着术语的革命而实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有着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防止人民在形式上有权而实质上无权的现象，“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38]。同月，他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要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38]⁶⁸。这两次重要讲话明确了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的基本问题，事实上已经初步表达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指出“人民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概念^[39]。2021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等文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正式成为规范性法律概念。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完整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40]。同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表示，民主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但“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41]。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全面地、系统地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问题^[42]，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最新发展形态得以正式确立。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层面的重要举措和显著成就，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要求：“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43]同时，《决议》强调未来需要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2021年1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在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问题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奋斗史，从“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丰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概括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内涵、显著特征、世界意义^[17]，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得到体系化建构。

第三，突破西式民主的话语垄断，建构起中国式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体系。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没有定于一尊的实现形式，但是一些西方国家试图以所谓“自由民主制”来垄断民主话语权，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最新发展形态，“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7]。从民主内涵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存在领域的广泛性。在当代中国，民主不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且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际关系等领域^[10]，包括政治民主、经济

民主、社会民主等内容。从民主制度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各项制度都是围绕着人民当家作主来建构的，国家治理体系都是围绕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来运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完整的制度程序，集中体现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方面。从民主实践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着完整的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协商民主同选举民主有机统一，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效贯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行上的协同性、主体上的广泛性等显著特征，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有效规避单一选举民主的弊端。从民主实践成效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7]中国的民主发展坚持目的性与手段性的辩证统一，既强调民主是一种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又将其视为经济基础服务、更好地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人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利，取得了人民民主参与不断扩大、国家治理高效、社会和谐稳定、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等成就，充分体现出中国制度优势。

针对一些西方国家以所谓“自由民主制”来否定他国民主实践的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强调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明确了评判民主制度的中国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9 月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 8 个“能否”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标准。在 2021 年 10 月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这 8 个“能否”，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42]。同时，他还提出 4 个“要看”、4 个“更要看”的标准：“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42]2021 年 12 月 4 日，8 个“能否”、4 个“要看”和 4 个“更要看”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评价标准的重要内容写入《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深刻阐明了中国的民主观。

总体说来，积极回应新时代人民对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推动中国民主建设实践理论化体系化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中国的民主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深刻汲取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全面总结百年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主问题的基本观点，概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成过程、制度安排、民主实践、实践成效及其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等问题，建构起中国式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体系。

六、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百年演进的经验启示

《决议》明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史，积累了宝贵经验。新时代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以统一战线为重要形式，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40]¹¹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从政党性质来看，相较于民主在资产阶级社会沦为特权精英集团谋求政治统治、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工具，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都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民主。从民主进程来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追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中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实践举措，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从价值理念转变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体系和实践举措，在当代中国展现出全新发展形态和显著优势。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难以形成有效、管用、真实的民主。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依法治理国家，推动人民民主的理念落到实处。

第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充分彰显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44]中国的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都是围绕人民当家作主来建构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及各项制度安排，为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着完整的民主参与实践。它们确保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有效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新时代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人民立场，坚持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充分保障人民依法享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确保人民的民主参与实践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相统一，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

特别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坚持依法治国，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国家法律的重要保障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基础，人民民主得到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强调国家制度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推进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国的人民民主事业得到充分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制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不断丰富民主的制度内涵，健全国家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借助于国家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党的意志、国家意志、人民意志得以有效衔接，人民意志通过国家机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举措。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既要健全国家法律体系，确保国家法律得到有效落实，同时又要将不断丰富发展的民主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进一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民主本身是一项国家制度，民主的实现须以相应的国家制度安排为依托。相较于西式民主以分权制衡原则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价值，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民主是同维护权威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也是中国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活动的基本原则。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支撑，也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来建构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避免了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45]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激发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人民意志；另一方面能够实现有效的集中，确保人民意志能够真实有效地转化为切实可行、充分体现广大人民利益的实践举措。正因为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避免了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对抗、无序竞争和治理效能低下等弊端。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始终确保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所谓“三权分立制衡”原则，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进行有效集中，推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第五，坚持统一战线，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相较于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制”是一种基于资本逻辑的博弈政治、被狭隘化的选举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选举民主同协商民主相统一，既能确保人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通过协商民主有效规避选举民主的弊端，更好地反映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决议》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43]统一战线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内生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团结和民主相辅相成。民主是广泛团结基础上的民主，能够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团结是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的团结，能够最大限度增进共识，形成最大凝

聚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以追求民主建立和巩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政治联盟中践行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等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继续嵌入人民民主国家制度体系之中，发挥民主功能得到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成了广泛的政治社会力量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渠道。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以团结营造民主发展的重要条件，进而彰显团结的民主效能。

第六，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40]¹³他在 2021 年 10 月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表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42]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始便承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基本思想，而且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中也曾深受共产国际、苏联的影响，此后还受到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的对抗，但从不完全照搬或移植他国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实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奋斗史，蕴含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也只有继续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坚持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还意味着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既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自由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同时不断调整党内存在过的关于民主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偏颇认识。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以所谓“自由民主制”来歪曲、抹黑甚至否定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及民主实践，我国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

总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百年奋斗历程，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明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保障。没有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难以真正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探索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新路径、走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贡献了中国智慧，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成功的重要原因，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始终坚持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九勇.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 [J]. 政治学研究, 2021 (4): 18-26.
- [2] 许耀桐.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1 (7): 24-28.

- [3] 秦德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度支撑与实践体系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5): 19-26.
- [4] 张伟军. 中国新民主政治观: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及价值定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6): 54-64.
- [5] 张明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 [J]. 思想理论研究, 2021 (9): 31-37.
- [6] 张君. 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 [J]. 政治学研究, 2021 (4): 11-17.
- [7] 樊鹏. 全过程人民民主: 具有显著制度优势的高质量民主 [J]. 政治学研究, 2021 (4): 3-10.
- [8] 蒯正明.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9): 71-78.
- [9] 鲁品越. 全过程民主: 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1): 80-90.
- [10] 李海青. 论中国民主话语对西方民主话语的批判与超越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6): 101-114.
- [11] 项启源. 试论邓小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9 (4): 1-8.
- [12] 王宗礼.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百年探索与实践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 5-12.
- [13] 王宗礼. 新中国 70 年来人民民主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 [J]. 理论与评论, 2019 (6): 51-61.
- [14] 王珂, 陈鹏.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百年探索的政治逻辑及当代启示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 (1): 4-10.
- [15] 尹世尤, 屈雅雅. 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始终高扬的旗帜 [J].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21 (6): 7-12.
- [16] 杨雪冬, 黄小钊. 人民民主的百年探索及启示 [J]. 理论导报, 2021 (3): 29-33.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民主 [N]. 人民日报, 2021-12-05 (5-7).
- [18] 李大钊全集: 第 4 卷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07-108.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8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50.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2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64.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3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84.
- [23]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63.
- [24]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56.
- [25]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37.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25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46.
- [27] 黄寿松.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建构及启示 [J]. 现代哲学, 2017 (6): 54-60.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9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81.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26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58.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5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520.
- [3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 第24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94.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1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604.
- [33] 周家彬. 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毛泽东对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认识 [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11-17.
- [34]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8.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1256.
- [36]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40.
-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676.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
- [39]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N]. 人民日报, 2019-11-04(1).
- [4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2.
- [41]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2021年7月6日, 北京) [N]. 人民日报, 2021-07-07(2).
- [42]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N]. 人民日报, 2021-10-15(1).
- [4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1-11-17(1, 5-8)
- [4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91.
- [45] 习近平. 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 [J]. 求是, 2019(23): 4-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刘泖菡



统一战线的民主功能分析：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

王平¹ 张佳敏¹ 周旭霞²

(1.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1;

2. 安徽大学 党委统战部,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统一战线内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进程,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以注重系统效应和闭环效应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对统一战线进行多维透视,可以找到持续激活统一战线治理效能的工作抓手。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统一战线全新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表现在:以凝聚最广泛的人心体现民主动员功能,以汇聚最真实的民意体现民主表达功能,以集中最全面的民智体现民主决策功能。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中,统一战线进一步彰显民主功能,有利于自身发展迈入新境界,体现团结与民主的辩证效能。

关键词:统一战线;全过程人民民主;团结与民主;民主动员;民主表达;民主决策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1-0068-10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做到听民声、聚民智、汇民力、解民忧、守民心,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鲜明特点和巨大优势。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恩格斯指出:民主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1]。列宁也指出:“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2]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实现民主、发展民主的百年实践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1.006

作者简介:王平,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佳敏,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周旭霞,安徽大学党委统战部高级政工师。

引用格式:王平,张佳敏,周旭霞.统一战线的民主功能分析: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1):68-77.

中，逐步丰富和发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新型载体。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一系列严谨而科学的制度设计，真正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功能贯通起来，通过打组合拳、构筑立体化民主，以实现国家管理中的全员参与、全程参与、全方位参与。

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可以说，统一战线内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无论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还是一些具体安排，对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都有裨益。鉴于此，本文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透视镜”，发掘统一战线所蕴含的民主动员、民主表达、民主决策等民主功能，为统一战线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制胜法宝。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其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统一战线”，强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制胜法宝，在于统一战线具有凝聚人心、汇聚民意以及集中民智等治理效能。凝聚人心、汇聚民意以及集中民智，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百年大党来说极为重要。其一，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决定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正是在争取人心的意义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更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的！”^[4]如果人心涣散抑或自己阵营中的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就可能出现政党垮台、分崩离析等结果。其二，一个政党及其所辐射的人民群众是一个系统，只有人民群众能随时把真实想法传递给政党，政党才能在汇聚民意的基础上作出正向反馈。反之，一旦真实民意被系统所拒斥，就会出现群众失声、信息失真、决策失实等弊病，乃至影响政权存亡。从争取人心来说，一个政党也只有认真倾听人民群众诉求并予以及时回应，才能提升人民群众的满足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其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政党只有善于集中民智，与人民共书历史、共创时代、共铸梦想，才能凝聚磅礴的群众伟力，以更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向前向美向上向善。

把潜在的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现实意义上的治理效能，需要找到并设置相应的工作抓手。正如古人所云：“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任其事必图其效；欲责其效，必尽其方”。同理，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法宝，要努力找到更多启动自身内在功能的抓手。统一战线作为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体，坚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善于用民主的方式实现团结，用团结的方式发展民主。在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团结与民主形成辩证关系与互动功能。民主具有团结功能，团结具有民主效能，共同构成统一战线发挥法宝作用的重要机理。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来说，“以民主促团结，以团结固民主”具有突出的战略价值^[5]。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

不单是结成政治联盟的过程，也是发展政治民主的载体。基于这种原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统一战线全新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6]，它的提出有一个过程。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强调：“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7]这个重要论断首次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观点。随后，1982 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在 2021 年 3 月迎来了首次修改。修改稿明确写入“坚持全过程民主”“保障人民权益”等内容。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向更广阔的制度实践层面。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8]这一论断阐述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意义。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他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9]这些重要论断阐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国有理论源泉、制度框架和实践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功能贯通起来，实现民主过程的系统化和闭环化，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超越西式民主的一种新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相较于西式民主的碎裂性、机械性和偏颇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动员力和执行力。有学者就此指出：西式民主脱离民主决策施政全过程，将“民主”限制在民主选举环节，不可能产生真正能够代表人民集体意志的政府。民主是复杂的过程：分散的人民意志要形成一致的集体意志，并且使集体意志能够得到统一执行与改进……这本身需要复杂的全过程才能实现，投票表决只是这个复杂过程中的一个环节^[10]。

以注重系统效应和闭环效应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对统一战线进行多维透视，可以找到持续激活统一战线治理效能的工作抓手。

其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透视统一战线，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就可能性而言，基于统一战线内嵌于国家制度和治理（包括民主制度和民主治理）的逻辑^[11]，民主政治与统一战线存在高同质性的价值契合。2021 年 12 月 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白皮书不仅明确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而且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都属于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6]。这一论断表明，统一战线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嵌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内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运转，是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制度载体。相应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工作方法因具有普遍性意义，可以用来指导作为特殊性事物的统一战线，以助推统一战线巩固发展。以协商民主为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统一战线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方法：“研究党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主要用的是协商民主，就是平等对话、求同存异，既讲团结，又有斗争，在民主协商中求得团结。”^[12]就必要性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需要“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

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9]。把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也内含了将其体现到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要求。

其二，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透视统一战线，具有可行性和针对性。就可行性而言，由于统一战线内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它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样，也蕴含了民主动员、民主表达、民主决策等民主功能。就针对性而言，在统一战线中积极发挥这些民主功能，不仅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能通过把上述民主功能转换为工作抓手，持续激活统一战线的治理效能。具体来说，把民主动员这个工作抓手运用好，可以彰显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治理效能；把民主表达这个工作抓手运用好，可以彰显统一战线“汇聚民意”的治理效能；把民主决策这个工作抓手运用好，可以彰显统一战线“集中民智”的治理效能。

二、民主动员功能：凝聚最广泛的人心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凝聚最广泛的人心。统一战线最关注人心向背，本身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亦如古人所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重要法宝，第一个治理效能便是凝聚人心。如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共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争不但是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也是对亿万大众民心民意的争夺。为此，毛泽东在指导解放战争的整个实践过程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壮大人民力量、孤立和削弱敌人的重大作用，要求全党必须下大力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3]。及至和平建设年代，仍然要团结和凝聚一切积极力量，才能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发表深刻论断：“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14]

要把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治理效能释放出来，需要从观念宣示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发挥统一战线的民主动员功能。

其一，观念宣示是指运用国旗国歌等国家象征以及党的领导人的观点阐述，把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等基本原则和理念传递给统一战线成员。一方面，国旗国歌等国家象征能起到形象生动的观念宣示作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金黄色五角星代表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一次协商确定国旗、国徽、国歌等事宜的座谈会。毛泽东拿着五星红旗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15]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五星红旗为国旗的方案后，周恩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16]相比之下，1866年出现的“大清黄龙旗”，则与普通人民群众没有多大关系。有学者指出：直至清廷覆灭，对于普通人民群众来说，黄龙旗与其说是“国旗”，不如说是“朝代的旗帜”^[17]。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的观念阐述也能对统一战线成员起到观念宣示作用。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而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

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8] 1949 年 10 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19] 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20]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观念宣示的方法和统一战线成员以心交心、以情换情。他强调众人之事由众人商量着办：“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1] 另一方面，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树根深叶茂，他多次阐述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是一家人的观念，让统一战线成员备受鼓舞：“民营企业 and 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22]，“我心里惦记着每一个少数民族，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3] 等。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宣示带来的民主动员，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没有“看客”，没有“局外人”，全体人民包括广大统一战线成员都是国家主人。观念宣示体现了大团结大联合的价值诉求，能够促进统一战线成员在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中共同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其二，制度安排是指为统一战线成员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政治活动提供规范渠道和制度保障。民主动员不能止步于观念宣示，还要在实践中落地有声、行之有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4] 这句话也启示，最重要的民主动员不是观念宣示，而是富有实践活力的制度安排。如果用观念宣示替代制度安排，观念宣示就会因为缺乏制度支撑而沦为空谈。钱钟书曾精彩地描述旧社会的观念宣示如何堕落成愚民之术的现象。他写到：“近来觉得……‘还政于民’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师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25]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通过严谨科学的制度安排，让统一战线成员在一系列政治参与中发挥作用，让统一战线成员不仅感受到民主之“名”，更感受到民主之“实”。比如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副主席均为党外人士。这一制度安排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高举人民民主旗帜的初心，努力追求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也极大激发了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起到了观念宣示所无法达到的民主动员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用制度安排的方式对统一战线成员进行民主动员，变得更加体系化和定型化。这集中体现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20 年 1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布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为面向统一战线成员的民主动员提供了制度依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的主要内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

行。”这一规定是对统一战线成员进行民主动员的顶层设计。它从“一参加三参与”出发，全面动员统一战线成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为了把顶层设计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作出了配套规定，确保民主动员工作在制度安排环节得到有序有效推进。

三、民主表达功能：汇聚最真实的民意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汇聚最真实的民意。全面获悉真实民意是一个政权得以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真实民意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向执政者反映诉求以及表达意见建议。一方面，执政者只有真心倾听人民群众的诉求，才能精准回应人民群众，才能按照人民群众的愿望打造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执政者只有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水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人用“纳谏如流”“闻过则喜”等成语来表达对获得真实民意的肯定，同时也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成语来批评那些拒斥民意的人。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重要法宝，第二个治理效能便是汇聚民意，包括汇聚以反映诉求为内容的民意和汇聚以表达意见建议为内容的民意。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通过统一战线来了解方方面面的合理诉求。毛泽东指出：“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26]同时，他还要求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将它们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此外，为了鼓励党员干部真诚听取统一战线成员的合理诉求，毛泽东还强调：“我们党必须把党外民主人士当成是自己的干部一样，和他们交心真诚地商讨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事情，这是我们党对党外民主人士的政策，这个思想也得在全党的工作上确定下来。”^[27]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倾听民意，他对中国国情以及人民心声都是无比了解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评价毛泽东：“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28]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通过统一战线渠道了解社情民意。201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9]。2014年12月31日，他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30]。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历来重视监督工作，重视统一战线的民主监督。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在耳旁^[31]。“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32]习近平总书记则从合力监督角度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重要性。他多次阐述要想形成合力监督，必须把党内专责监督与包括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内的其他监督形式结合起来，并强调“各级领导要有一种坚定自信和宽阔胸怀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33]，

要汇聚最真实的民意，统一战线所具备的民主表达功能是重要工作抓手。中国共产党已从统一战线制度建设的角度提供了基本安排。

首先，在平等融洽的环境中展开真诚协商，是民主表达的有效方法。“表”强调各方各界都有说话的权利，“达”强调各方各界要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我国日益完善的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安排，既保障了统一战线成员有“表”的权利和渠道，也让党委政府紧扣“达”这个目标，更加注重倾听统一战线成员的意见建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以及其他方面的协商。”

其次，联谊交友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接收民意信息的制度方式。《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八条规定：“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一战线工作第一责任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习近平十分重视建立健全联谊交友制度，早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就率先践行市委领导和民主党派领导交友联系制度^[34]。中国共产党注重倾听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基础和逻辑在于他们具有代表性。毛泽东认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35]

再次，民主监督也是中国共产党汇聚民意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历来强调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执政党接受民主监督明确基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以及勇于接受监督的坦荡胸襟。另一方面，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旨在实现更好的民主治理效能。民主监督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监督。就监督功能而言，统一战线的民主监督，是依靠真知灼见、以理服人的民主监督，是依靠社会影响力所实施的民主监督^[36]。统一战线开展民主监督同样具有制度机制保障。《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在政治协商、调研考察，参与党和国家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执行和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专项监督等工作中，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

四、民主决策功能：集中最全面的民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集中最全面的民智。智慧是人类社会最宝贵也是最稀缺的资源。人类文明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无一不浸润着智慧的引导和推动。如果说人类文明是一块华彩的锦缎，那么，这块锦缎由人类需求作为经纱以及人类智慧作为纬纱编织而成。智慧不是人脑中所固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群众为了实现人类需求、在劳动实践中创造所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人类历史上，但凡有远见的执政者都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防止犯闭目塞聪、故步自封等错误。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极为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拜人民群众为师。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8] 790}为了更为系统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还详细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8] 899}由于把自己视为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在毛泽东心中，人民群众始终处于最高地位。曾经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评价毛泽东：“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将取得胜利。……他总是说中国人民将取得胜利，共产党只有依靠人民才会取得成功。”^[37]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重要法宝，第三个治理效能便是有助于党委政府集中民智。实现这一效能，离不开民主决策这一工作抓手。按照汉字语义逻辑，“决策”应为“策决”，即先有“策”后有“决”。在决策时，人们第一步要拿出尽可能多的“策”即备选方案，第二步要按照一定标准从诸多备选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一方面，如果备选方案不充分，甚至人们只接触到极少备选方案，由于“眼界”问题，决策质量自然不高。另一方面，即便备选方案非常充分，但是决策者缺乏足够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能力，由于“境界”问题，也很难把最佳方案从诸多选项中甄别出来。统一战线通过充分发挥民主决策功能，能在求更多类型“策”以及求更高水平“决”两个方面汲取民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万里曾强调：“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8]

其一，统一战线发挥民主决策功能，有助于党委政府在决策时掌握更多备选方案。一方面，统一战线成员由于自身优势，往往能从一定角度为决策提供参考方案。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党协商会议 170 余次，先后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报告、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建议、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等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确保重大问题决策更加科学、民主。而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深入考察调研，提出书面意见建议 730 余件，许多转化为国家重大决策^[39]。另一方面，由于“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关系，党外代表人士联系着相应群众，拥有一定决策信息和决策资源。毛泽东强调党委政府要善于用“商讨”的方式从统一战线成员那里获取各种锦囊妙计，获取更丰富的备选方案。他指出：“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18] 810}

其二，统一战线发挥民主决策功能，有助于党委政府在决策时挑出最佳备选方案。面对诸多备选方案，只有经过充分讨论与平等协商，方可挑出最佳方案。好的决策不是从“众口一词”中得来，而是“应以互相冲突的意见为基础，应从不同的观点中选择，应从不同的判断中选择”^[40]。中国共产党支持统一战线成员参与到决策环节，强调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发挥民主决策功能，让包括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人民群众成为决策者的信息供给者，对每一个问题展开头脑风暴，有利于拿出最具科学性的决策。就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开展形

式多样的协商,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监督和批评,可以在开展工作和决策中达成最大共识……可以畅通各种利益相关诉求和责任人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纠错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凭感觉决策的弊端。”^[41]正是把决策模式建立在充分讨论与平等协商基础上,兼具民主性与科学性,才让当代中国决策展现出高水平、高质量、高韧性。

五、结语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统一战线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之一,内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所以内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基础既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及其初心使命,也在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本身就具有“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性质,并由此形成了稳定、有序、有效和团结的国家治理格局和治理文化。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透视镜,在统一战线中发掘民主动员、民主表达、民主决策等民主功能,不仅能在统一战线领域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命力,还有利于在完善国家治理格局和丰富国家治理文化等治理目标上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迈入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31.
- [2] 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5.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3.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96.
- [5] 林尚立.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与作用[J].中共党史研究,2011(5):5-15.
- [6] 白皮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EB/OL].(2021-12-04)[2021-12-10].<http://news.cctv.com/2021/12/04/ARTIQG8kyly016Mt7hpDHace211204.shtml>.
- [7] 习近平.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EB/OL].(2019-11-03)[2021-12-10].<https://www.yicai.com/news/100388505.html>.
-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N].人民日报,2021-07-02(2).
- [9] 徐隽.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N].人民日报,2021-10-15(1).
- [10] 鲁品越.全过程民主: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80-90+155-156.
- [11] 龚静阳.国家视野中新时代统一战线研究述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4):99-108.
- [12]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及其与统一战线、选举民主的关系[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3):3-9+55.
- [13] 于化民.多党合作与民主新政——论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在筹备建国过程中的运用与发展[J].史学月刊,2020(11):71-8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56.
- [15] 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档案[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201.
- [16] 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第一”:第一幅毛主席画像[EB/OL].(2009-09-23)[2021-12-02].<https://www.>

- 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9-23/1880676.shtml.
- [17] 小野寺史郎. 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 [M]. 周俊宇,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3.
-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809.
- [19] 毛泽东文集：第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14.
- [20]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350.
- [21]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1（2）.
- [22]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 [N]. 人民日报, 2018-11-02（2）.
- [23] “一”往情深, 习近平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故事 [EB/OL]. (2020-06-10) [2021-12-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9037741567566647&wfr=spider&for=pc>.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459.
- [25] 钱钟书. 围城 [M]. 上海：上海晨光出版社, 1947: 序.
- [26] 毛泽东文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95.
- [27] 毛泽东文选：下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665.
- [28] 萧诗美. 毛泽东智慧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114.
- [29] 张烁.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致以新春的祝福 李克强、俞正声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3-02-08（2）.
- [30]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2014年12月31日） [N]. 人民日报, 2015-01-01（2）.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94.
- [32] 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315.
- [33]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EB/OL]. (2016-12-31) [2021-12-22]. <https://news.12371.cn/2016/12/31/ARTI1483185417638284.shtml>.
- [34] “习总书记对民主党派一直非常关注和关心”——习近平在福州（十一） [N/OL]. 学习时报, (2020-01-13) [2021-11-08].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103/c64387-31533749.html>.
- [35]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 [M].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8: 6.
- [36] 张峰. 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协商式监督新定位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6）: 112-117+163.
- [37] 陈建敏.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39.
- [38] 万里. 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J]. 中国软科学, 1986（2）: 1-9.
- [39]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EB/OL]. (2021-06-25) [2021-12-10].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625/c64387-32140661.html>.
- [40] 德鲁克.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M]. 许是祥, 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57.
- [4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22（2）.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

樊士博 徐敏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存在相互贯通关系，集中表现为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统一战线具有天然的人民民主基因，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从团结到民主”的意涵表现为：统一战线增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体性、广泛性、真实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团结作用。“从民主到团结”的意涵表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统一战线扩大包容性、增强代表性、强化共识性。民主越充分，统一战线的团结效能越能实现最大化；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团结，全过程人民民主越能有序深度地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全过程人民民主；团结与民主；协商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1-0078-08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谈及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建设时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1] 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人民民主特质，

DOI：10.13946/j.cnki.jcqi.2022.01.007

作者简介：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ZD014）

引用格式：樊士博，徐敏.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J]. 统一战线学
研究，2022（1）：78-85.

是人民民主的最新表达。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忠实践行者和坚定维护者。为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接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始终同中国共产党追求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相伴随，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面、重要制度和重要力量。

学界对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逻辑关联展开了一些讨论。一是在论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运作机理等基础性议题中零星涉及统一战线的相关内容^[2-5]。焦洪昌、杜浩鹏指出，政府参事制度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别制度载体，又是巩固统一战线的制度选择^[6]。二是强调统一战线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促进作用。相关研究认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同促进人民民主是相向而行的^[7-10]。不过，既有研究多是从二者的某些外在实践形态的相关性入手，缺乏对二者之间内在逻辑理路的整体性梳理。鉴于此，本文以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为视角，梳理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逻辑关联。

二、从团结到民主：统一战线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意义

《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1] 41}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统一战线具有天然的民主基因，对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一）统一战线增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体性

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是民主政治的两个面向，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双重驱动力。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协同配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有机统一。实质民主作为一种理性诉求，是民主价值的集中彰显。而程序民主作为一种工具性诉求是民主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民主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重要的是旋转的过程。离开了这个旋转的过程，民主政治这个陀螺就会倒下。”^[11]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注重运作过程的民主形态，在民主实践的全过程、全领域、全方位始终贯彻公平、公开、公正的价值取向，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政治优势之所在。

民主的真谛在于协商，协商反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髓。统一战线作为以实现合作共赢为目标的政治联盟，非常重视在求同存异原则下开展协商。统一战线作为践行民主协商真谛的重要场域，坚持程序性与实体性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不同的民主协商形式，都要遵循一定的民主程序，只有这样协商民主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就运作机制而言，统一战线是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民团体协商有效运作的实体性支撑。《决议》强调“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1] 40}。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通过统一战线制度安排，有序规范地进入到人民政协中。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为推动实质民主发展提供支持。

（二）统一战线增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全”，即广泛性。《决议》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1] 40}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在民主运行的全过程中始终把人民放在核心位置，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不仅体现在民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还体现在民主内容的广泛性，而这与统一战线的内在价值是一致的。统一战线具有增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性的价值。

一方面，统一战线有利于增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广泛性。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家性质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广泛的参与主体。人民具有广泛性，统一战线的范围也具有相当的广泛性。统一战线的范围与人民民主的主体具有交叠部分。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围绕共同目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最广泛的政治联合。其行动取向是争取与集结最广泛的力量，目标取向是争取最广泛的人心。统一战线主体的拓展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强调，统一战线对象“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12]。越是范围广泛，统一战线范围与人民民主主体的交叠部分就越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包容性不断增强，参与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范围也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统一战线有利于增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容广泛性。在横向层面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部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在纵向层面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过程完整性，涵盖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全部环节。《决议》强调：“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 40}统一战线广泛参与国家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以当家作主的姿态为国家治理贡献智慧力量。统一战线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的广泛性，使其具备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的关键要素。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统一战线正式定位为“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所依赖的政治基础得到拓展，以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旗帜。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促进统一战线围绕圆心发挥作用，增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

（三）统一战线增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

全过程民主是具体的、真实的、有效的民主，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无力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仅是过程性民主，更是结果性民主，能够切实回应并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绝不是一种“话语”点缀，而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旨趣所在。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13]

统一战线蕴含协商基因，是激发全过程人民民主真实性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包括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以及基层协商。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增强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在统一战线中，不同类型的协商民主形式都有制度保障，增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政党协商是促进党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抓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多样化的政党协商形式成为参政党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政协协商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具有常态化、专业化的运作特征。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不仅体现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更是体现在决策之后。政协协商实现了同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有助于促进协商成果的转化落实。

三、从民主到团结：全过程人民民主对统一战线的要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要求发挥统一战线功能，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团结过程本身蕴含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团结作用。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统一战线扩大包容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与巨大优势集中体现在它是“人民”的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语境之中，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具有广泛性。统一战线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渠道，首先就在于它能把人民中的各种政治社会力量以联盟的形式包容进来。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通过大团结凝聚追求民主的广泛力量。《决议》强调：“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1]¹⁰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统一战线的历史演进同党的光辉历史相生相伴、荣光与共。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时局环境的演化，统一战线的历史形态也随之调整。但是其团结不同力量、凝聚最广泛共识的职能一直未变。大革命时期，为推动革命深入发展，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起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积极联合国民党左派等革命进步势力，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1926年，党的六大正式提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成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致力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组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被压迫阶级，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统一战线的行为准则，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以巩固。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将新时期统一战线确定为“爱国统一战线”。伴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演化以及统一战线包容性的增强，爱国统一战线的构成不断拓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增强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在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统一战线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不同群体的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搭建了参政议政的政治大舞台。在人民政协框架内，多样化参与群体能够围绕中心和全局，展开政治协商，使重大决策吸收来自社会各方的意见与建议。当然，统一战线对于社会群体的不同利益并不是无底线的承认，有悖于统一战线共同基石的“多样性”，绝“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14]。统一战线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必须有利于增进共同利益。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统一战线增强代表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前提。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现代民主主体性困境的制度回应。利益代表性越广泛、越充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效也就越明显。

基于中国的国土规模与人口规模，民主政治只有借助一定的制度依托，才能实现利益整合的目

标。统一战线是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主体代表性的重要制度安排。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统一战线辐射多种多样的群体与圈层。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文化信仰与价值观点上各有特点。然而，统战工作不可能对所有党外人士开展，主要团结其中的代表性人士。有效联系和团结党外代表人士，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影响力传递机制。早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对人民政协的代表性问题强调：“为了扩大政协的代表性，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使它能够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15]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增强统一战线的代表性。就个体而言，要求加强党外代表人士的代表性建设。要从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发力，把好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质量关，引导其“自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16]。一方面要拓展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与储备渠道，完善选拔任用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管理与教育，加强实践锻炼，夯实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监督网络，确保其职能的有效发挥。面对新技术时代统战工作领域出现的新特征，要适应信息时代人群数字化集结的现实，在动态、多重语境中发现和培养党外代表人士”^[17]。就组织而言，要求重点加强人民政协的界别代表功能。界别是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组成单元。要尊重不同界别各自的特点与需求，充分调动各界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要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对政协界别设置进行完善，进而使各阶层能够完整、有效、充分地实现利益表达。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统一战线强化共识性

在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渐趋多样的社会转型阶段，如何弥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价值认识差异，形成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的社会共识，是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重要任务。“政治共识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的协调过程，政治共识实质是利益协调的产物。”^[18]通过充分有效的民主形式实现利益整合、利益调节、利益表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民主制度若不能成功地逐渐创造出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它就会是一个难以运转的和脆弱的制度。”^[19]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不同政治社会力量置于民主实践场域之中，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增强和凝聚社会共识。

统一战线是基于一定的共同利益而结成的联盟，没有共同利益就不可能结成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的共同利益不只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简单利益重叠，而是基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共同利益萃取。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同利益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但是其背后的人民利益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人民根本利益始终是推动统一战线深入发展的根本动力。统一战线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建立在其对不同利益差异、价值差异的包容基础之上。然而，“包容”不是唯一目的，“求同”是“存异”的归宿。因此，巩固已经形成的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是统一战线能够持续发挥作用、释放积极性的必要前提。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共识功能。凝聚共识是汇聚人心、加强团结、增进力量的基本前提，也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质决定了其具有弥合差异、增强认同的政治功能。价值诉求的多样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统一战线运用交流沟通与说理的机制，既给予表达不同意见建议的机会，又不断促进多样价值诉求转化为共识，在最大程度上汇聚奋进的力量。反观西方民主政治现实，人心不齐、四分五裂、互相推诿的政治极化现象，极大地撕裂、扭曲、挤压了民主政治的空间。产生不了共识、凝聚不了人心的民主制度空转，

已然成为西方民主政治陷入困境的重要缘由。

四、走向团结与民主的统一：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同互促

坚持统一战线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具有密切逻辑关联。一方面，要将统一战线的巨大政治效能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资源，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取得更大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优势，为统一战线发挥重要法宝作用扩展实践空间。

（一）坚持党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发展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辩证统一的。坚持党的领导内在要求坚持统一战线，善于通过统一战线凝聚社会各方共识。加强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是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纳入统一战线这一特殊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统一战线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变异的根本保障。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0]。另一方面，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也是党的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21]。“统一战线是党的总政策与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它贯彻到党所领导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必须全党上下一致努力，才能做好这一工作。”^[22]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即指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上对统一战线予以领导，确保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能够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与爱国主义方向和谐发展。

（二）发展协商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23]而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本身蕴含着协商民主的辩证逻辑。在统一战线视阈下，要从全面性和真实性两个着力点有效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商真谛。一方面，健全协商民主条件，实现协商民主全覆盖。“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24]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协商民主与统一战线的深度融合，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另一方面，健全人民政协制度，促进协商民主的规范化程序化发展。人民政协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政治组织与民主形式的统一体。要通过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实践夯实制度载体。

（三）完善统战制度

统一战线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统一战线制度具有涉及面广、层次多样的特质，以统一战线自身制度为核心，涉及国家层面的众多具体制度。完善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整合发挥统一战线的民主资源，为统一战线更好发挥民主功能提供制度保障。《决议》强调：“党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1]⁴¹构建大统战格局有助于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力量与效能来源于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合力，而不是单一核心主体的单向势能。具体而言，要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等，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制度化运行。

（四）提高团结质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实现最真实最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包含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广泛存在于我国各环节各领域，集中体现于统一战线领域。处理好“一”和“多”之间的关系，要创新统战工作机制，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发挥统一战线成员积极性的统一。要加强政治引领，把统战工作过程变成发扬民主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统战工作“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25]。要增强吸纳效能。面对多样化的统一战线成员与统战环境，要采取灵活机动的工作方法，创新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避免僵化、固化地处理统战事务。对于不同的统一战线成员，要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取契合其实际需要的方式。要加强团结与斗争的统一。对危害一致性的大是大非问题进行斗争，实现以斗争求团结；对无伤大雅多样性加强教育引导，从团结目的出发开展批评，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

五、结语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在人民民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26]百年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坚持统一战线，存在高度交叉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同向同行。统一战线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有赖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实现，也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民主越充分，统一战线的效能越能实现最大化；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团结，全过程人民民主越能有序深度地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丰富与发展，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价值契合性将愈加紧密，相互促进的效能将更加显著，不断彰显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9.
- [2] 李笑宇. 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机制与显著优势 [J]. 科学社会主义，2021（5）：116-123.
- [3] 阙天舒，方彪. 国家治理场域中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基于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视角 [J]. 社会主义研究，2021（4）：80-87.
- [4] 林尚立. 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J]. 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1（3）：2-3.
- [5] 蒯正明.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9）：71-78.
- [6] 焦洪昌，杜浩鹏. 政府参事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侧面 [J]. 行政管理改革，2021（12）：26-34.
- [7] 本报评论部. 中国民主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坚定不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② [N]. 人民日报，2021-12-17（5）.

- [8] 于化民. 多党合作与民主新政——论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在筹备建国过程中的运用与发展 [J]. 史学月刊, 2020 (11): 71-81.
- [9] 李君如. 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及其与统一战线、选举民主的关系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5 (3): 3-9+55.
- [10] 刘佳义.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N]. 人民日报, 2021-12-15 (9).
- [11]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M]. 童世骏,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56.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549.
- [13] 徐隽.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0-15 (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31.
- [15]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30.
- [16]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汪洋韩正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1-02-02 (1).
- [17] 林华山. 整体性统战: 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战略研究 [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2): 39-46.
- [18] 马九福. 略论和谐社会政治秩序建设 [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 156-161.
- [19] 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 上卷 [M]. 冯克利,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47.
- [20]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59.
- [21]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57.
- [22] 李维汉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227.
- [2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0.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0.
- [2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42.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民主 [N]. 人民日报, 2021-12-05 (5).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刘伊菡



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前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汪曙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 北京 100083)

摘要: 21 世纪以来, 历经“9·11”恐怖袭击、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美国欲维持全球霸权的野心与其国家战略资源之间的矛盾加剧。拜登政府上台后, 在对华政策上提出“对抗、竞争、合作”三分法架构, 为中美冲突设置“护栏”的同时, 推行全方位“激烈竞争”政策。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框架下, 拜登政府力图在修复失衡和维系现状中, 推进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实质关系”, 增进美国战略利益。新时代, 中美两国在台海地区的战略博弈将对岛内国民党、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产生复杂影响。

关键词: 美国对台政策; 拜登政府; 两岸关系; 台湾问题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1-0086-09

进入 21 世纪, 美国历经“9·11”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的冲击, 加上国内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抬头,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失败, 整体国力持续消耗, 其全球霸权野心与国家战略资源的矛盾凸显。从奥巴马、特朗普到拜登, 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呈全球范围的战略收缩之势, 着力重建国家竞争力, 向亚太地区腾挪战略资源以应对中国崛起。2021 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所谓“21 世纪全球最大地缘政治考验”。重建美国竞争力是拜登政府恢复盟友伙伴对美国霸权信心, 维护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和规则的重要布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总体延续战略现实主义的强硬立场, 提出“对抗、竞争、合作”三分法的政策架构, 即“该竞争时竞争, 能合作时合作, 须对抗时对抗”。拜登政府对华以“激烈竞争”为主基调, 同时防止中美竞争演变成冲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提出“负责任的竞争”“管理竞争”等概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1.008

作者简介: 汪曙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引用格式: 汪曙申. 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前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1): 86-94.

贝尔声称，中美“接触”时代已经过去，但不认定中美关系必然进入“新冷战”，主张两国“竞争性共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美要负责任地管理分歧，避免对抗甚至发生危机^[1]。在2021年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拜登提到中美管理战略风险的重要性，有必要建立常识性的护栏，以确保中美竞争不会转向冲突^[2]。自中美建交以来，台湾问题始终是双方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台海安全与中美互动密切相关。历史上爆发的三次台海危机表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走向对抗与冲突的可能，中美战略界对此均有长期深刻的认知。拜登政府强化对华激烈竞争，全面深度介入台海，同时为预防中美冲突设置“护栏”，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政策和决策选择值得研究。

一、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思维

基于对拜登政府国安决策核心团队涉及台海问题与两岸关系的言论观点的分析，可以初探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战略思维。其与特朗普和共和党战略鹰派相比既有政策延续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性。

（一）主张从结构上重建相对稳定的“台海平衡”

民主党建制派与共和党保守派认为海峡两岸综合与军事实力失衡日益严重。他们并不认同特朗普时期以极限施压手段颠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三方关系动态平衡。坎贝尔等认为，长期以来，中美采取弹性和有微妙差别的方式处理对台政策，其中形成的模糊地带使台湾地区受益^[3]。拜登政府臆想，美国需要在中美战略稳定的架构下重新建立所谓“台海平衡”，从经济、军事和安全上减少台湾地区的脆弱性，增强台湾地区的所谓“抗压性”。

（二）重视在变动中“维持现状”的战略价值

美国建制派的传统观点是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其中包含“战略模糊”与“双重威慑”理念，以确保两岸长期“不统、不独、不武”状态^[4]。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鹰派以改变现状的方式将台湾地位“准国家化”，从传统的两岸双向平衡走向对大陆的单向遏制^[5]。袁鹏认为，过去数年美方从立法、军售、高层互访等各方面突破了中美过去几十年达成的战略默契或共识，再往前走将极其危险^[6]。拜登政府提出对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美国可以选择避免中美冲突、“新冷战”和“修昔底德陷阱”。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支持台湾维持所谓“独立状态”与强化防卫安全，但不赞成将台湾地区作为战略博弈的交易筹码或单纯“处罚性的工具”，在政策思维上更关注“维持现状”和“保持平衡”。葛来仪认为，台湾问题不会是拜登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一种策略性工具。

（三）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所谓“实质性”重于象征性

在中美激烈竞争背景下，台湾问题给美国主张遏制中国的鹰派相当大的“战略诱惑”，他们倾向公开支持“台独”和制造激化两岸关系的政治、舆论效应。特朗普时期，美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官方化”操作不少是将台湾地区放在镁光灯下的象征性事件，如2020年8月、9月，特朗普政府派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副国务卿基思·克拉奇访问我国台湾地区。而拜登政府打“台湾牌”更重视所谓“实质性”效果，企图强化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实质性安全与经济伙伴关系”。拜登政府妄称，中国大陆在崛起中加快推动国家统一进程，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可利用台湾问题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作用支持其对华竞争政策。

二、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表现

学界一般认为拜登政府台海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测性要高于特朗普政府。这一方面是因为拜登政府涉华决策团队为民主党建制派，他们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参与拟定、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有较充分认知；另一方面是因为拜登政府接收了特朗普时期的一部分涉台政策遗产，但对特朗普反建制、极限施压和工具式打“台湾牌”并不认可，主张对台政策与美国“印太战略”精巧对接，更多体现理性算计和成本收益考虑。

（一）采取所谓“一法三公报六保证”的对台政策架构

2021 年 1 月 23 日，拜登政府发布的首份对台政策声明妄称，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与台湾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坚持在三个联合公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六项保证”中作出的长期承诺，将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7]。该声明定调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包括将对台所谓“六项保证”公开化、政策化，施压中国大陆调整对台策略。2021 年 4 月，沙利文妄称，美国承诺在台湾议题上采取稳健、清晰并坚定的做法，落实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对台“六项保证”。2021 年 6 月 17 日，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费德玮妄称：“一个中国政策”指的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关系到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席位；但是在“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下，尽管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现在是非官方关系，我们仍然公开和私下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保持并事实上发展与台湾地区在安全、经济、文化和许多其他领域非常密切的关系^[8]。拜登政府在关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新闻稿中声称，美国仍然奉行在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所谓“六项保证”指导下的“一个中国政策”，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削弱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9]。中方发布的中美元首会晤新闻稿显示，美方承诺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10]。

（二）全面利用美国联盟体系干预台海问题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是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资产与不对称优势所在。坎贝尔、杜如松在出任拜登政府核心幕僚之前撰文声称，中国崛起导致印太地区权力失衡并提议“重新建立平衡”，美国与盟友伙伴一致行动是建立真正地区平衡的需要^[11]。拜登政府重视并加强外交在实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通过联盟外交和多边外交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其中包括承接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拜登上台以来，积极在美国盟友体系内部协调涉台政策，美日、美韩、七国集团、北约等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台湾问题和台海紧张局势表示“战略关切”，将“改变现状”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大陆。比如，2021 年 4 月 16 日，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台海问题”。这是 1969 年以后美日首脑首次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敏感的台湾问题。2021 年 6 月 13 日，G7 首脑峰会声明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从这些动作看，拜登政府正利用美国盟友体系的优势，试图将台湾问题制造成为一个“多边问题”。

在美国战略界的评估中，台海权力结构失衡造成美国在西太平洋对华传统威慑战略被削弱，美国将日本、澳大利亚、G7、北约等作为对华威慑战略的“倍增器”。在美国支持下，澳大利亚介入

台海安全的态度与政策发生显著变化。2021年9月16日，第31届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举行，澳美双方声称中国台湾地区是两国重要合作伙伴，有意加强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继续支持在不诉诸威胁或胁迫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两岸问题。2021年6月9日，澳大利亚与日本进行外交和国防部长级2+2会谈，其联合声明首次写入“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2021年8月30日，澳大利亚与法国建立外交与国防（2+2）部会咨商架构，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台海议题和平解决”，他们对“中国台湾地区依循组织法规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一事表达支持”^[12]。

拜登政府通过拉帮结派“打群架”的方式介入台湾问题，少数中东欧国家也开始跟随美国升级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实质关系”。立陶宛同意台湾当局设立所谓“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获得美国政府公开声援。2021年12月，美国和欧盟举办第二届美欧中国议题对话，在声明中妄称双方对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的“单方面问题行径”表示强烈关切。在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干预台海问题的作用下，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国家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日益凸显。

（三）注重“实质”强化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军事安全关系

从战略上，美国以此消彼长、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看待中美长期竞争关系。美国战略界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大陆会利用不断累积的综合力量推进两岸统一进程，美国需要采取与传统有别的军事安全战略予以应对。这不仅因为台湾问题是攸关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中方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方妥协，也是由于中美如爆发台海冲突将很难管控战争规模，美方缺乏单方面管控台海战争演变与升级的战略能力。

2021年6月8日，坎贝尔表示，拜登政府认为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和台海两岸之间发展起来的政策架构是最好的，美国遵循一套寻求加强威慑的全面步骤，以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让台湾和平生存”。其策略包括：一是通过私下安抚和公开警告，发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声明；二是根据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保持美国有能力应对西太平洋发生的“令现状不稳”的事情；三是继续向台湾地区提供关键的防卫武器，使台湾地区加强自我威慑力^[13]。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声称，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严重削弱美军在台海威慑效力，建议美国应在短期内采取紧急措施强化美国军事威慑可靠性，帮助台湾当局加强向美国军购能力，并加速军事销售与交货程序^[14]。基于以上思维，拜登政府实施军舰常态化穿越台湾海峡，基本保持每月一次的行动频率。军事舰艇在台海例行过境成为美国实施对华前沿威慑的重要策略。2021年10月，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与加拿大“温尼伯”号护卫舰巡航台海，这是拜登政府加大拉拢美国盟友介入台海安全事务的例证。2021年8月，拜登公布任内首次对台军售案，批准售台价值7.5亿美元的40套自行榴弹炮系统和相关设备，声称其“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有助于提升台湾安全”^[15]。2021年11月，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披露负责整理部队数据的五角大楼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在奥巴马政府末期和特朗普政府上台初期，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派遣了大约10名军事人员。特朗普任期结束时这一数量又增加一倍。拜登上台后又继续增派，目前已有39名美军事人员（含29名海军陆战队员）协训台湾防务力量^[16]。2021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实现从部长向元首会谈的升级，美英澳缔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些均是拜登政府运用美国盟友体系对华军事制衡的布局。在所谓协防台湾问题上，美国战略界讨论从传统“战略模糊”向“战

略清晰”调整的声音增多，参与论战的双方虽有分歧，但在展示美国有能力与意愿保护台湾地区的“策略清晰”问题上具有一致性。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不间断地宣示美国根据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所谓“六项保证”支持台湾地区自我防卫；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签署所谓“设立海巡工作小组谅解备忘录”，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机构的海上准军事合作；派遣小编队军事人员轮流入岛，指导和协训台湾防务力量。未来美国将不会允许台湾当局在军事安全上的“搭便车”行为，因为这将使台湾当局减少防务资源的长期投入，加剧大陆和台湾防务力量失衡的状况，也将提高美国在“台海有事”情况下军事介入的战略成本与风险。

（四）大幅度提升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科技合作

在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中，中美之间属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拜登政府则将其视为所谓“民主与威权”之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因素几乎渗透到美国对华政策各个面向与领域。拜登政府将经济和科技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特别是在核心科技领域与中国加速“脱钩”，以保持美国在高精尖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

2021 年 3 月，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份长达 756 页的建议，其中提到美国在微电子领域的领导地位正在削弱，特别是在制造、组装、测试和封装领域^[18]。美国国防部估计，到 2022 年，全球半导体制造中将只有 8% 在美国进行，低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40%^[17]。在中美科技激烈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导致科技供应链问题凸显的大背景下，拜登政府对维持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久竞争力给予更高重视。我国台湾地区与美国贸易、科技交流密切，双方将彼此定位为所谓“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特别是台湾地区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显著优势获得美国战略界重视。拜登政府将我国台湾地区作为维护美国科技供应链安全、配合其对华高科技“脱钩”与技术遏制的“重要伙伴”。蔡英文当局为减少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阻断台湾半导体产业和科技人才向大陆转移，实施与美国战略相对接的经济安全政策。2021 年台积电在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下停止为华为提供代工芯片，并且在美国方面强烈要求下，开始在亚利桑那州投资建设 5 纳米先进制程的晶圆厂，计划 2024 年实现量产。未来，半导体产业相关供应链可能向美国转移。目前看，台湾地区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居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在半导体设备、材料和设计领域具有优势，是台积电最主要需求客户。双方加强科技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趋势会持续增强。2021 年 12 月，美国与台湾当局同意建立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所谓“技术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以推动科技合作。预计在拜登政府任内，我国台湾地区作为美国科技战略伙伴的地位会提升，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安全合作会走向深化。

三、美国因素对岛内政党两岸政策的影响

美国对台政策、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是两岸关系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变量。这在中美关系新形势和蔡英文任内更为突出。从主要面向看，美国因素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以及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一）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影响

2016 年蔡英文上台，正逢美国对华战略大幅度转向竞争与对抗之时。民进党认为中美大国权力

角逐的结构性矛盾上升，位居第一岛链中枢的台湾地区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地位与价值升高。这就刺激民进党推动了更多的“台独”议程。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以“渐进台独”路线为主轴，在岛内遏制统派和两岸交流派，以所谓“反统战”为由限制两岸各领域交往，加快在国际上制造所谓“一中一台”。美国对民进党“渐进式台独”总体持容忍、纵容态度，将蔡英文上台改变两岸现状的责任反推给中国大陆，并且以“切香肠”手段提升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助长了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拒统谋独”的政策企图。

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公布所谓新版“对台交往准则”，较大幅度放宽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官方接触的约束。拜登政府继续实施对台常态化军售政策，公布美国军事人员入岛协助台湾当局的防务训练，支持中国台湾地区参与联合国体系活动，邀请台湾当局有关人员参加所谓“民主峰会”。对此，2021年7月26日，王毅在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就如何有效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失控提出要求，其中就包括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至于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18]。2021年10月31日，王毅在会见布林肯时，要求美方奉行真正的一中政策，而不是假的一中政策；要求美方把一中政策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1]。美国未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空洞化和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战略及相关政策，是蔡英文当局压制两岸关系、推动“台独”施政的外部支撑。2021年10月，蔡英文抛出所谓“四个坚持”和两岸“互不隶属”的论述，在两岸关系定位问题上朝更公开的所谓“一中一台”或“新两国论”的方向转变。

问题的另一面是，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仍然受到美国因素限制。美国对台湾当局给予政治支持和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证，但为预防、管控中美冲突，或如拜登政府所说的设置“护栏”，并不支持台湾当局走向引发台海战争的“法理台独”。2018年4月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威廉·佩里妄称，如果中国大陆“侵犯”台湾，美国会防卫台湾；如果是台湾挑衅，美国则不会，如何定义挑衅则有解释的空间。在目前美国战略界，相当一批人认为美国在台湾防卫问题上走向“战略清晰”将会适得其反，原因之一是美国不能轻易给“台独”开空头支票。在美国看来，蔡英文作为非典型民进党人，在两岸政策上不像陈水扁当政时期那样冒进，但这并不能保证未来民进党的理念与政策不会走向激进。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战略清晰”将改变台湾内部政治平衡，许多台湾政客乐于利用选民的天真热情赢得选举，让美国陷入困难的境地，因此美国对鼓动岛内激进因素要极度谨慎^[19]。2019年，美国在台有关机构表示，“美方不支持单边片面行动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公投，这是美方一直以来的政策”^[20]。美国涉及“法理台独”时的所谓审慎立场和态度，对民进党当局推行所谓“修宪台独”“公投台独”等激进政策形成一定限制。

（二）对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时期，美国全方位支持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政策，疏远主张“亲美”“和陆”的国民党。国民党奉行的平衡政策难被美国共和党对华战略遏制派所接受，这在客观上造成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的传统优势空间被压缩。加上2020年岛内选举的政治动员充斥“反中拒统”元素，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频繁高强度打“台湾牌”，国民党大陆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

在拜登政府发布首份对台政策声明后，国民党方面声称，美国民主党政府秉持过去40多年的两岸政策架构，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鼓励两岸对话^[21]。拜登政府上台后，国民党逐步认识到其在两岸关系中具有更加灵活的政策空间。其政策观点包括 3

项内容。第一，台湾不要变成美国与中国大陆任何一方对弈的筹码；第二，国民党奉行“亲美”“和陆”并行路线，以与民进党“倚美反中”立场相区隔，体现双向平衡的策略思维；第三，国民党主张维持和推动两岸和平交流。2021 年 10 月，朱立伦提出，积极推动两岸改善关系，恢复官方沟通管道，将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黄介正认为，美国谨守克林顿“三不政策”与对台非官方关系；美国维持对台承诺，但鼓励两岸对话^[22]。2021 年 10 月，国民党通过的政策纲领修正案声称，将延续过去党章、党纲的基础，坚持反对“台独”，积极推动两岸改善关系；两岸应搁置争议，促进经贸及民间社会往来，以期建立平等互惠的制度性贸易机制与具备韧性、善意的社会联结^[23]。基于以上三个政策观点，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试图发挥其“和平稳定价值”“交流沟通价值”“经济合作价值”，突显其与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差异性。

四、结语

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沿袭了美国传统战略架构和特朗普的遗产，主张“修正失衡”“维系现状”“规避冲突”，同时在“印太战略”框架中安排中国台湾地区的角色，在国际多边体系中维护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事实独立现状”，利用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持续提升牵制和影响两岸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朝经济科技、军事安全和国际影响力领域扩散的背景下，涉台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在拜登政府对台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未来美国提升与台湾当局所谓“实质关系”的主要方向。这将对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和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产生作用，影响日趋复杂的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

拜登政府对台政策从属于新时期美国对华制衡与遏制战略，在美国全球霸权相对收缩和向“印太战略”聚焦背景下展现出新的元素与特点，对中国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带来复杂影响。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虚化、倒退，美国整合联盟资源介入台湾问题，与中国台湾地区加强防务战略协调、安全合作关系等，这些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美涉台博弈与斗争的重要面向。美国干预台海的幅度与深度，不仅取决于中美双方整体实力较量，也将受到各自战略执行能力的影响。

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针对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变化，中国大陆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有战略塑造力。这就需要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领域予以综合性应对，在维持台海局势总体稳定、防止衍生重大颠覆性风险的同时，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巩固和强化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与步伐。

参考文献：

- [1] 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EB/OL]. (2021-10-31) [2021-11-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187799364300219&wfr=spider&for=pc>.
- [2]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Virtual Meeting

- [EB/OL] . (2021-11-15) [2021-11-15] .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6/readout-of-president-bidens-virtual-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3] Jake Sullivan and Kurt M. Campbell.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EB/OL].(2021-09-12)[2021-11-1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competition-with-china-without-catastrophe>.
- [4]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tegic Ambiguity or Strategic Clarity,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 汪曙申. 特朗普时期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J] . 美国研究, 2021 (5) : 118-123.
- [6] 袁鹏谈中美关系: 如何认识拜登团队的中国观? 中美如何能走出安全困境? [EB/OL] . (2021-03-17) [2021-11-15] . <https://news.ifeng.com/c/84h5gaQAb6q>.
- [7] PRC Military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Threatens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EB/OL] . (2021-01-23) [2021-11-15] . <https://www.state.gov/prc-military-pressure-against-taiwan-threatens-regional-peace-and-stability/>.
- [8] Testimony of Jonathan Fritz,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the Pacific, and International Cybersecurity Policy, Strength Through Partnership:Building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EB/OL] . (2021-06-17) [2021-11-15] .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strength-through-partnership-building-the-us-taiwan-relationship-061721>.
- [9]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Virtu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 (2021-11-16) [2021-11-15] .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6/readout-of-president-bidens-virtual-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10] 杨依军.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EB/OL] . (2021-11-16) [2021-11-15] . http://www.jjckb.cn/2021-11/16/c_1310314569.htm.
- [11]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 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 [EB/OL] . (2021-01-12) [2021-01-15] .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2/how-america-can-shore-asian-order>.
- [12] Inaugural Australia-France 2+2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EB/OL] . (2021-08-30) [2021-11-15] .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inaugural-australia-france-22-ministerial-consultations>.
- [13] Richard Fontaine. Fireside Chat with Kurt Campbell [EB/OL] . (2021-06-08) [2021-11-15] .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video/fireside-chat-with-kurt-campbell>.
- [14] 2021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 . November 2021: 387-423.
- [15]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Department of Defens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ECRO) - 155MM M109A6 Paladin Medium Self-Propelled

- Howitzer System [EB/OL]. (2021-08-04) [2021-11-15]. <https://www.dsca.mil/press-media/major-arms-sales/taipei-economic-and-cultural-representative-office-united-states-20>.
- [16] 五角大楼悄悄向台湾增派军人 [N]. 参考消息, 2021-11-22 (14).
- [17] Michaela D. Platzer, et al. Semiconductors: U. S. Industry, Global Competition, and Federal Policy [EB/OL]. (2021-10-26) [2021-11-15]. <https://fas.org/sgp/crs/misc/R46581.pdf>.
- [18] 潘洁, 李鲲. 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EB/OL]. (2021-07-26) [2021-11-15]. http://www.gov.cn/guowuyuan/2021-07/27/content_5627593.htm.
- [19] Shelley Rigger, Testimony for the U. 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ross-Strait Deterrence [EB/OL]. (2021-02-18) [2021-11-15].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1-02/Shelley_Rigger_Statement_for_the_Record.pdf.
- [20] 美在台协会: 美方不支持“台独公投” [EB/OL]. (2021-02-14) [2021-11-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5403593084878096&wfr=spider&for=pc>.
- [21]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 美方支持符合台湾利益的两岸方案, 国民党表示欢迎 [EB/OL]. (2021-01-24) [2021-11-15]. http://www.kmt.org.tw/2021/01/blog-post_24.html.
- [22] 黄介正: 台海稳定愈来愈靠自己 [EB/OL]. (2021-10-01) [2021-11-15].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5784436?from=udn-catelistnews_ch2.
- [23] 陈键兴, 徐瑞青. 中国国民党通过新政纲 [EB/OL]. (2021-11-01) [2021-08-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176293302920196&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176293302920196&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 孙德魁



从特朗普到拜登： 美国涉藏政策的动向、影响及应对

郭永虎 朱博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近五年来，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干涉总体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从美国行政当局来看，拜登在延续特朗普时期干涉主义态势的同时，又将涉藏问题纳入“印太战略”框架之下，暴露出其染指中国西藏事务的意愿更强。美国国务院作为插手西藏事务的重要主体之一，定期发布各类涉藏报告，并将其作为对华开展人权外交的工具。从美国立法部门来看，美国国会涉藏立法活动非常活跃。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美国行政部门积极介入西藏事务，制定对华制裁措施；设法使美国外交人员和记者“自由”进入西藏；为“藏独”势力提供拨款援助。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干涉不仅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增加中国政府治理西藏的难度，还助长藏身海外“藏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应从管控美国涉藏活动底线、建构涉藏话语权、完善藏区治理等方面予以反制。

关键词：中美关系；印太战略；美国；西藏；拜登；特朗普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1-0095-11

DOI：10.13946/j.cnki.jcqi.2022.01.009

作者简介：郭永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朱博，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979—2019）”（19ZDA169）

引用格式：郭永虎，朱博．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涉藏政策的动向、影响及应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1）：95-105．

特朗普任期内和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中美关系热点问题中的“3T”——台湾(Taiwan)、贸易(Trade)、西藏(Tibet),仍然是影响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领域。然而,学界对此现象的关注度与美国涉藏活动的活跃程度并不相称。从学术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近五年来美国涉藏政策的整体研究十分薄弱。这主要体现在缺乏对特朗普任期内和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涉藏政策的系统性研究。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对美国国会涉藏立法活动进行研究。有的学者以所谓“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为个案,分析其出炉背景、主要内容、实质,认为其实质和目的是打“西藏牌”和利用所谓“西藏问题”遏制中国^[1]。有的学者以美国国内政治动因为视角,对1987年第100届国会至2020年第116届国会期间的涉藏法案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府会关系和涉藏议题的社会热度影响美国国会涉藏立法行为^[2]。有的学者以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的内容为主,结合所谓“2021财政年度综合拨款法案”中的涉藏内容进行分析,指出这些内容表述中的偏见与谬误,揭露相关表述背后掩盖的逻辑错误与险恶用心^[3]。国外学者主要在分析特朗普和拜登时期美国对印度和中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时,论及美国国会涉藏法案^[4]。从研究的现实意义来看,探讨美国涉藏政策对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具有参考价值。《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5]。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仍是干涉西藏事务最主要的外部因素。本文拟对近年来美国涉藏活动的动向及其负面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

一、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涉藏政策的总体特征

(一) 特朗普政府的涉藏政策

与民主党人热衷于鼓吹人权问题不同,特朗普更加强调“美国优先”,这种优先更多体现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等硬实力领域。因此,特朗普政府未将涉藏问题的地位上升到战略高度。特朗普政府在涉藏问题上的基本做法是,按照美国国内法律,应国会要求,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例行性干涉。但在涉藏问题的关键环节上,如在会见达赖问题上,其则持拒绝态度。对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来说,“西藏牌”不在其对华战略的优先事项排序之中。从主观能动性来看,特朗普本人对西藏事务的介入意愿明显偏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其在任内长期没有任命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界定了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职责:协调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涉藏政策、项目、计划^[6]。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设立是美国政府干涉西藏事务的制度化体现。自1997年设立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职位以来,美国政府对该职务的任免从未间断过,但在特朗普时期却发生了“断档”。

二是其对待达赖喇嘛“访美”的立场与以往不同。与奥巴马频繁与达赖喇嘛接触不同,特朗普对待达赖喇嘛窜访的态度较为消极^[7]。然而,上述“消极”表现绝不意味着特朗普在涉藏问题上无所作为,其对华打“西藏牌”的基本策略并未停止。特朗普时期,美国干涉西藏事务的主要动作是将所谓“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和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签署成为所谓“法律”。

（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涉藏政策立场新变化

特朗普继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又提出所谓“印太战略”。作为民主党人，拜登当选后并未恢复奥巴马的外交战略，而是继续推行“印太战略”，大幅提升印度在该战略中的地位。2021年3月2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在访印时称美印两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关系日益密切^[8]。7月27日至28日，布林肯作为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印，旨在加深印美全面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毋庸置疑，印美“印太战略”汇合的根源和目标是美国，美国和印度在对华政策上互相利用、互相借重。美国企图通过“印太战略”围堵中国，印度则欲通过“印太战略”拉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9]。利用涉藏问题遏制和围堵中国是美印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契合点。拜登上台后已出现美国有意将涉藏问题纳入“印太战略”的迹象。布林肯访印期间会见达赖喇嘛代表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对涉藏问题的介入意愿显著增加，干涉西藏事务的力度也随之加强。在竞选期间，拜登就围绕涉藏问题大做文章。2020年8月，拜登发表所谓“涉藏声明”，表示当选后将强势介入西藏事务。2020年9月3日，拜登的竞选团队发表声明，承诺如若当选，将会把价值观重置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心。拜登所谓“涉藏承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会见达赖喇嘛；任命新的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与美国盟友一道向中国施压，以使得他们重启与达赖集团代表的直接对话；坚持要求中国政府使美国公民（包括美方的外交官和记者）重获到访西藏的权利，扩大“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藏语服务；制裁中国官员^[10]。2021年3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拜登政府对达赖喇嘛转世的立场时妄称：“中国不应该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11]2021年11月16日，在中美两国首脑举行首次视频会晤时，拜登就向中方提及所谓“涉藏人权问题”^[12]。拜登积极介入西藏事务，与其早期从政经历有很大关联。在长达36年的参议员生涯中，拜登在策动所谓涉藏立法提案方面，可谓是“高产”的提案者。据统计，在此期间，拜登作为涉藏提案发起人，共提出3项所谓“涉藏法案”；作为共同提案人共提出11项所谓“涉藏法案”。

（三）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涉藏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涉藏政策有着较强的连续性。因此，总统更迭不会导致美国涉藏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总体上看，拜登政府的涉藏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主体内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利用所谓“人权”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整体战略没有变化；二是无论谁上台，美国都可能完成两部基本的所谓“涉藏法律”布置，即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这些所谓“涉藏法律”对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提出了干涉西藏事务的“任务”：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将涉藏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定期提交各类所谓“涉藏报告”；干涉中国政府和达赖集团及其代表的接谈事宜，设立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并强化其干涉职能；为“藏独”势力提供拨款；等等。作为民主党人，拜登上台后，除履行上述“涉藏法律”的基本要求之外，还试图有所“创新”。比如：将涉藏问题更多地融入美国“印太战略”之中；联合其盟友共同谋划“后达赖”时代的干涉策略；等等。因此，拜登政府的涉藏政策充分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干涉主义核心因素，并与时俱进地炮制了新的干涉手段。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涉藏政策的延续和发展，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国内政客对涉藏议题的炒作。2021年12月14日，美国60多名国会参众议员致函美国国务院，煽动所谓“西藏自治”，并呼吁拜登政府从多个领域深化对西藏事务的干预。

这封联名信的发表，与正妄图推动“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海外“藏独”分子遥相呼应，试图重演“藏独”势力在2008年干扰北京奥运会的闹剧。

二、美国国务院干涉西藏事务的主要活动

美国国务院是美国外交政策运行的核心机构，在美国政府各部门中居首席地位。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多要通过美国国务院具体实施。美国国务院还承担着对外输出美式民主的职责。美国国务院介入西藏事务的主要依据是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其下属两个机构与西藏事务密切相关，分别是鼓吹“宗教信仰自由”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和标榜推广所谓“普世价值”的“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13]。2017至2021年间，美国国务院的涉藏活动主要包括2项：一是美国国务卿就涉藏问题表达立场声明，二是定期依据美国国内法律发布涉藏报告。

（一）美国国务卿的涉藏立场

作为美国国务院的首脑，美国国务卿的职务等级仅次于正、副总统。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美国国务卿主要负责和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同时兼任总统首席外交顾问。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历任美国国务卿都不同程度地都介入了中国西藏事务，是实施美国政府涉藏政策具体负责人之一。美国国务卿的涉藏立场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特朗普和拜登共任命了三任国务卿，分别是雷克斯·蒂勒森、蓬佩奥和布林肯。

2017年2月，蒂勒森就任第69任国务卿。就任伊始，他就在书面回应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质询时表示，介入西藏宗教事务是当务之急，承诺继续鼓励北京与达赖集团的代表进行“对话”^[14]。蒂勒森担任美国国务卿仅一年多便被特朗普解除职务，由蓬佩奥继任国务卿职务。蓬佩奥在就任之前就向国会表态将积极介入西藏事务。2018年4月12日，蓬佩奥在出席国会参议院提名国务卿的确认听证会上阐明了涉藏立场，其与蒂勒森在涉藏问题上的立场如出一辙。他向国会保证将充分贯彻执行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在被问及是否将会见达赖时，他并未正面回答，只是称美国国务院官员应当在适合的时候对其进行会见。2018年4月27日，蓬佩奥正式就任美国国务卿。6月7日，蓬佩奥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书面回复。他声称，将推动中国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与达赖集团进行有意义的直接“对话”，“将致力于美国记者、公民、立法者和学者能够正常进入中国，包括中国五省（区）藏区”^[15]。布林肯在就任美国国务卿后的涉藏活动也较为活跃。2021年2月5日，布林肯在与杨洁篪通话时就干涉中国西藏事务^[16]。2021年7月，布林肯在印度新德里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这是自2016年奥巴马与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会见以来，美国官员与“藏独”头目的再次接触。

（二）美国国务院定期发布所谓“涉藏报告”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各类所谓“涉藏报告”，都是依据美国国会制定的所谓“法律”要求必须完成并向美国国会汇报的。通过这些所谓“报告”，一方面，美国国会实现了对美国行政部门关于西藏政策实施的监督，因为这些所谓“涉藏报告”不只是陈述性的流水账，还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汇报其干涉西藏事务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发布所谓“涉藏报告”也在向国际社会表达美国的立场，旨在争夺涉藏话语权，发动舆论宣传攻势，丑化中国国际形象。美国国务院提交所谓“涉藏报告”

已经成为美国介入西藏事务的“制度性行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的所谓“涉藏报告”主要有4个，分别是：两个专题性的——所谓“西藏谈判年度报告”和“关于‘2018对等进入西藏法’第4条之报告”；两个包括涉藏内容的综合性“报告”，分别是所谓“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1. 所谓“西藏谈判年度报告”。根据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美国国务院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要向国会提出所谓“西藏谈判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汇报美国政府各级别的官员在过去一年里干涉中国政府和达赖集团“对话”的所谓“政绩”。比如，2018年，美国国务院向国会递交了特朗普政府所谓“西藏问题谈判报告”；201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所谓“西藏谈判年度报告”。这两份所谓“报告”的重点由推动中国政府与达赖集团“对话”转移到了干涉涉藏人权事务上来，罗列了一些低级别美国政客关注涉藏人权的言行。2021年5月19日，美国国务院提交了拜登政府所谓“西藏问题谈判报告”。其将干涉重点转向干涉达赖转世事务和要求美国外交人员进入藏区活动。

2. 所谓“关于‘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第4条之报告”。美国国务院根据特朗普签署生效的所谓“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第4条之规定，要定期向美国国会提交美国人是否被批准进入西藏的情况报告。2019年3月25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按照要求向国会提交所谓“报告”，评估了2018年中国政府批准美国外交人员、记者和旅行者进入西藏的级别水平，指责中国政府限制美国的外交官、官员、记者和游客前往藏区^[17]。2020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所谓“西藏旅行对等法”年度报告，继续指责中国对外国人前往西藏旅行实施的严格限制^[18]。

3. 所谓“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的涉藏内容。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每年都发布所谓“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从1994年开始，在所谓“涉华人权报告”中，西藏就被作为单独一部分列出并予以“评价”。2018年，美国国务院发布所谓“2017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涉藏人权事务“品头论足”^[19]。201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所谓“2018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再次指责中国涉藏人权状况。2019年3月15日，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反驳^[20]。2021年3月，美国国务院发布所谓“2020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攻击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值得关注的是，在西藏地位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在相关“报告”中的措辞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所谓“人权报告”删除了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表述^[21]。

4. 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的涉藏内容。依据所谓“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院建立了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负责起草所谓“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22]。2018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所谓“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以所谓“西藏宗教自由问题”为借口，对中国西藏政策横加指责^[23]。2019年6月，美国发布所谓“2018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再次罔顾事实，攻击中国西藏事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公然对我国的宗教政策提出所谓“关切和敦促”。2019年6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方所谓“报告”中的涉华内容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关言论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24]。2021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所谓“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敦促拜登政府充分地执行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并以此为由抵制中国主办的2022年冬奥会；还建议美国政府尽快提名一位合格的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25]。

总体来看,特朗普和拜登时期美国国务院提交的所谓“涉藏报告”并无新意,形式主义色彩更浓。其共同特征是缺乏客观性,相关资料大部分由海外“藏独”分子和反华势力提供,不具可信度,所列举的案例都是捕风捉影;无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藏人权事业取得的成果,对涉藏事务进行严重的歪曲性评价。美国国务院的目的绝非其所标榜的关注涉藏人权,而是在于利用所谓“报告”插手涉藏事务,丑化中国国际形象。美国各类所谓“涉藏报告”已经成为争夺国际涉藏话语权、开展对华人权干涉的工具。

三、美国国会对西藏事务的立法干涉活动

在美国行政部门干涉西藏事务的同时,美国国会在涉藏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国会通过宪法赋予的立法权和拨款权全面介入中国西藏事务。在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美国国会的涉藏立法活动表现得愈发积极和激进,已成为干涉西藏事务不可忽视的又一重要主体。

(一) 美国第115—117届国会涉藏立法活动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即第115—117届国会期间,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数量显著增加,仅从2017年至2021年10月的立法数量就多达45项。其中所谓“法案”数达31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所谓“决议案”有14项。从议员所属党派上看,共和党的提案数量略高于民主党。从文本内容来看,近五年来,美国国会涉藏所谓“法案”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求美国政府介入西藏事务。美国国会在多项所谓“法案”中要求特朗普和拜登在涉藏问题上“有所作为”。2017年2月16日,众议院提出第65号所谓“决议案”,敦促美国总统在每次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及西藏事务^[26]。2017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提出第89号所谓“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将西藏事务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干涉西藏事务的具体举措:继续贯彻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进行“对话”;在西藏拉萨设立办事处,用于“监督”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任命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27]。2018年2月1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第743号所谓“决议案”,要求国务卿与美国“友邦”进行国际合作,全面落实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28]。为进一步督促美国行政部门干涉西藏事务,2019年5月13日,美国国会32名议员联名致信蓬佩奥,敦促美国政府全面迅速地实施美国国会历年来制定的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所谓“法律”,怂恿特朗普和蓬佩奥全面落实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和“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29]。2021年6月8日,参议院通过所谓“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又称所谓“无尽前沿法案”。它不仅提出要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而且对干涉西藏事务列出许多条款。其中要求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必须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同意,而且要求必须由美国国务次卿级别以上的官员担任该职。同时,其规定在恢复驻成都总领事馆或成立驻拉萨领事馆之前应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设立所谓“西藏部”,而且应直接派遣至少两名美国工作人员至该部门,并且至少要聘请一名当地的工作人员。该所谓“法案”还鼓励美国国务卿与盟友接触,反对中国政府管理达赖转世事务^[30]。

2. 继续为海外“藏独”势力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国会涉藏“拨款援助”的所谓“立法”由来已

久，自2002年小布什签署了有关援助“藏独”势力的所谓“法案”后，一直延续至今。特朗普任内，美国国会在所谓“2018财年综合拨款法”和“2019财年综合拨款法”中提供的涉藏“援助”总金额相同，都是1 700万美元，其中用于印度和尼泊尔藏人社区600万美元，另外还有300万美元用于达赖集团各类机构^[31]。

3. 声援“藏独”势力。近三年，美国国会还提出一些所谓“决议案”声援“藏独”势力。2018年3月11日，为配合达赖集团鼓噪“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所谓“纪念”活动，美国国会先后提出3项所谓“议案”，决定将2018年3月10日设为所谓“藏人权利纪念日”。

4. 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地位。2021年6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所谓“第4281号法案”。该项所谓“法案”明目张胆地承认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唯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妄称西藏“独立”将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并对直接或间接参与支持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的高级政府官员、军事人员实施经济和签证制裁^[32]。

（二）所谓“涉藏法律”内容剖析

从所谓“立法”的成功率来看，截至2021年10月，有8项所谓“涉藏法案”获通过并被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所谓“法律”，对美国涉藏政策施加了实质性的“法律”影响。特朗普和拜登任内，在美国国会炮制的众多所谓“涉藏法律”中，从实质内容和影响来看，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两个。

1. 所谓“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特朗普时期，美国国会制定了一部所谓“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这是继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之后的又一部专门性的所谓“涉藏法律”。近年来，在涉藏领域，美国国会越来越强调所谓“对等”原则，美国国会制定的所谓“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的“侵犯”人权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包括不能入境美国、针对个人财产进行制裁等。2017年4月，美国众议院提出第1872号所谓“法案”，即所谓“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其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批准中国官员进入美国时，与中国批准美国外交人员挂钩。2018年12月11日，经参议院通过，该所谓“法案”于12月2日由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所谓“法律”^[33]，对美国国务院产生实际约束力。其消极作用不可低估，意味着美国国务院将依据其对中国相关人员进入美国设置障碍。尽管其签署并不意味着美国涉藏政策的基本原则发生转变，但是其以所谓“对等原则”鼓噪对有关中方官员采取歧视性签证政策，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并向“藏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34]。

2. 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2020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这一所谓“法案”随后被捆绑在所谓“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之中并于2020年12月27日被特朗普签署成“法”。这一所谓的“法”旨在强化与更新所谓“2002年美国西藏政策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七项：强化美国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职能，在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干涉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继续干涉中国政府与达赖集团接触和会谈问题，干涉中国在西藏水利工程建设，对达赖集团提供援助，干涉西藏宗教事务^[35]。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是近年来美国国会诸多所谓“涉藏法案”的重新整合，全面反映了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最新要求。该项所谓“法律”的干涉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为历年来美国国会涉藏立法所罕见。

美国国会通过上述立法活动，全面介入美国涉藏政策的制定，成为影响美国插手西藏事务最为活跃的主体。美国国会制定的所谓“涉藏法案”，特别是所谓“涉藏法律”对美国政府干涉西藏事

务提出了“刚性”要求。按照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立法权成为影响美国涉藏政策的“杠杆”。

四、美国涉藏活动的负面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

美国在涉藏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趋热并趋强，“西藏牌”在中美关系中的筹码可能会加重。近五年来，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的频繁干涉已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加强应对美国干涉西藏事务的措施，有效抵制影响中国核心利益和藏区安定团结的“美国因素”。

（一）美国涉藏活动的消极影响

1. 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纵观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涉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阻滞性因素。短期内，美国不可能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步伐，而中国为捍卫主权和国家利益，必然要坚决同美国的干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这使中美两国在所谓“涉藏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消除，给中国政府治理西藏带来了外部干扰因素。

2. 助长了“藏独”势力的嚣张气焰。首先，美国的干涉增加了“藏独”势力鼓噪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信心，助长了其在国外的分裂活动气焰。以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为例，其出台给国外“藏独”势力打了一针“强心剂”。“藏独”头目称其为一部“里程碑式”的所谓“涉藏法律”。该所谓“法律”不仅对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地位”加以承认，还为培训青年“藏独”头目拨出专款，企图培养下一代“藏独”接班人。该所谓“法律”不遗余力地为“藏独”势力撑腰壮胆，施压中国政府，无疑将极大地加剧国外“藏独”势力的嚣张气焰。

其次，美国对“藏独”势力的各种援助则为其提供了鼓噪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物质基础。美国国会主要通过所谓“难民救助”的名义为达赖集团提供经济援助，另外也通过移民、奖学金等形式给予后者支持。可以说，美国的资助是“藏独”势力能够在海外活动多年、不断扩大政治影响的物质前提。

3. 对美国政府干涉西藏事务施加更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对美国政府具有约束力的所谓“涉藏法律”主要有三部，分别是所谓“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这些所谓“涉藏法律”对美国行政当局的涉藏政策，将对白宫和国务院形成所谓“法律约束力”。

（二）中国应对策略

1. 划定美国涉藏活动的红线。在未来中美高层会晤过程中，涉藏、涉疆等问题将可能成为常设性话题。中国相关部门在中美各层级交往过程中应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在与美方进行交涉和对话的同时，应阐明中方底线：“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要为美国涉藏政策划出一道红线，即不允许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允许承认所谓“西藏流亡政府”。

2. 提升中国涉藏话语权。在一定意义上看，中美围绕涉藏问题的角力也是双方涉藏话语权之争。由于美国等西方主流传媒对国际涉藏话语权的长期垄断，国际上的涉藏新闻信息传播严重不公正、不对称，涉藏国际舆论斗争日益尖锐和复杂。为此，中国应将西藏事务放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来考

量，努力提升在该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确立涉藏大外宣理念，拓展涉藏公共外交，掌握涉藏外宣工作主动权。

3. 完善藏区治理。处理好藏区事务是应对美国干涉西藏事务的内生动力。按照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强边境地区建设，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要加强对藏区群众的教育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要密切关注美国涉藏政策的最新动态和变化，制定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 [1] 杜永彬. 美国“西藏帮”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新花样——评《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J]. 中国西藏, 2020(2): 4-6.
- [2] 肖杰. 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国内政治动因研究(1987—2020)[J]. 中国藏学, 2021(1): 168-178.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课题组. 美国涉藏法案的谬误分析[J]. 中国藏学, 2021(3): 15-23.
- [4] Ayjaz Wanikashish, Parpiani.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ndia and China, Issue Briefs And Special Reports, Apr 28, 2021 [EB/OL]. (2021-04-28) [2021-07-20]. https://www.orf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ORF_IssueBrief_462_HR-USForeignPolicy.pdf.
- [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 2021-11-17(1, 5-8).
- [6] H. R. 1646 -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 2003, 09/30/2002, Public Law No: 107-228 [EB/OL]. (2002-09-30) [2021-07-20]. <https://www.congress.gov/107/plaws/publ228/PLAW-107publ228.pdf>.
- [7] 求见特朗普遭拒[EB/OL]. (2017-05-27) [2021-07-20].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36KZ>.
- [8]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Joint Remarks With Indian Defense Minister Raksha Mantri Shri Rajnath Singh in New Delhi, MARCH 20, 2021 [EB/OL]. (2021-03-20) [2021-07-20].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2544449/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joint-remarks-with-indian-defense-minis/>.
- [9] 林民旺. 印度被锁定在“美国战车”上?[N]. 环球时报, 2021-07-29(14).
- [10] Statement by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on the Deepening Repression in Tibet, September 03, 2020 [EB/OL]. (2020-09-03) [2021-07-20].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statement-vice-president-joe-biden-the-deepening-repression-tibet>.
- [11] Department Press Briefing, March 9, 2021, Ned Pr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EB/OL]. (2021-03-09) [2021-07-20]. <https://www.state.gov/briefings/department-press-briefing-march-9-2021/Washington, D.C. MARCH 9, 2021>.
- [12]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Virtu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16, 2021 [EB/OL]. (2021-11-16) [2021-11-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6/readout-of-president-bidens-virtual-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 [13] 马方方. 美国国务院在“塑造亚太”中的角色分析 [J]. 和平与发展, 2016 (6): 19-33+114.
- [14] 美新国务卿称会与达赖见面 [EB/OL]. (2017-02-03) [2021-07-20]. <http://usa.people.com.cn/n1/2017/0203/c241376-29056721.html>.
- [15] US should express China engages in direct dialogue with Dalai Lama: Mike Pompeo [EB/OL]. (2018-06-13) [2021-07-20].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world/2018/jun/13/us-should-express-china-engages-in-direct-dialogue-with-dalai-lama-mike-pompeo-1827582.html>.
- [16] Secretary Blinken's Call with PRC Director Yang, February 5, 2021 [EB/OL]. (2021-02-05) [2021-07-20].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call-with-prc-director-yang/>.
- [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Section 4 of the 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 of P.L. 115-330 [EB/OL]. (2019-05-25) [2021-07-20]. <https://www.state.gov/report-to-congress-on-section-4-of-the-reciprocal-access-to-tibet-act-of-2018-of-p-l-115-330>.
- [18] Report to Congress on Access to Tibetan Area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Sec. 4 of the 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 PL 115-330//22USC 1182 [EB/OL]. (2020-08-05) [2021-07-20]. <https://www.state.gov/report-to-congress-on-access-to-tibetan-area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rc-sec-4-of-the-reciprocal-access-to-tibet-act-of-2018-pl-115-330-22usc-1182/>.
- [19] 2017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EB/OL]. (2018-04-20) [2021-07-20].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17-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
- [2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N]. 人民日报, 2019-03-15 (3).
- [21] 2020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China, Tibet, MARCH 30, 2021 [EB/OL]. (2020-03-30) [2021-07-20].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0-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china/tibet/>.
- [22] 习五一. 简评美国《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 85-93.
- [23]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17 [EB/OL]. (2018-05-30) [2021-07-20]. https://www.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freedom/index.htm?dynamic_load_id=280816&year=2017#wrapper.
- [24]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06-25 (2).
- [25]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20 [EB/OL]. (2021-05-12) [2021-07-20]. <https://www.uscirf.gov/sites/default/files/2021-04/2021%20Annual%20Report.pdf>.
- [26] H. RES. 65, 02/16/2017 [EB/OL]. (2017-02-16) [2021-07-2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65/text?q=%7B%22search%22%3A%5B%22tibet%22%5D%7D&r=20&s=5>.
- [27] H. Con. Res. 89, 11/29/2017 [EB/OL]. (2017-11-29) [2021-07-24].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concurrent-resolution/89/text?q=%7B%22search%22%3A%5B%22tibet%22%5D%7D&r=18&s=4>.
- [28] H. RES. 743 February 16, 2018 [EB/OL]. (2018-02-16) [2021-07-2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

- 115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743/text?q=%7B%22search%22%3A%5B%22tibet%22%5D%7D&r=27&s=5.
- [29] Members of Congress to Pompeo: It's Time to Implement Tibet Legislation, May 13, 2019, [EB/OL]. (2019-05-13) [2021-07-20]. <https://humanrightscommission.house.gov/news/press-releases/members-congress-pompeo-it-s-time-implement-tibet-legislation>.
- [30] S. 1260,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04/20/2021 [EB/OL]. (2021-04-20) [2021-07-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260/text?q=%7B%22search%22%3A%5B%22Innovation+and+Competition+Act+of+2021%22%2C%22Innovation%22%2C%22and%22%2C%22Competition%22%2C%22Act%22%2C%22of%22%2C%222021%22%5D%7D&r=1&s=4>.
- [31] H. J. Res. 31,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19, 01/22/2019 [EB/OL]. (2019-01-22) [2021-07-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joint-resolution/31?q=%7B%22search%22%3A%5B%22tibet+++Consolidated+Appropriations+Act%2C+2019%22%5D%7D&s=5&r=5>.
- [32] H. R. 4281, Tibet Independence Act, 06/30/2021 [EB/OL]. (2021-06-30) [2021-07-20]. <https://www.congress.gov/117/bills/hr4281/BILLS-117hr4281ih.pdf>.
- [33] H. R. 1872, 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 04/04/2017 [EB/OL]. (2017-04-04) [2021-07-20]. <https://www.congress.gov/115/plaws/publ330/PLAW-115publ330.pdf>.
- [34] 就美国“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12-21(2).
- [35] H. R. 133, 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21, 12/27/2020, Public Law No: 116-260 [EB/OL]. (2020-12-27) [2021-07-20]. <https://www.congress.gov/116/plaws/publ260/PLAW-116publ260.pdf>.

责任编辑：孙德魁



本刊微信公众号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性质、解构及应对

靳晓哲

（兰州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99）

摘要：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不是一种孤立性言说，而是西方反华学者、右翼媒体和政府等共同编织建构的、有较强逻辑但明显违背事实的污名化国际表达。从性质上看，这种表达是空幻和虚假的。从逻辑上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利用了西方民众对中国新疆的知识“匮乏”及其历史记忆中的情感因素，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虚假关联。美国政府对虚幻涉疆人权话语的接受与利用，是其对华战略不断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成与传播，在本质上深植于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极端迷恋，同时是美国“东方主义”认知偏见的当代体现。对此，我国应主动揭露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属性，有效区分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偏好与话语偏见，加强国际智库与媒体力量的建设，降低国际社会对新疆知识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人权话语；涉疆人权；国际话语权；霸权主义；美国；新疆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1-0106-13

近年来，美国对新疆的所谓“人权指责”愈加频繁，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2021年3月30日，拜登政府在一份所谓“人权报告”中对新疆地区所谓“大规模拘留和绝育行为”做出评估^[1]；12月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对外声称：拜登政府将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冬季残奥会^[2]。可见，涉疆人权议题的国际扩散，对我国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危害极大。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1.010

作者简介：靳晓哲，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讲师。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学科交叉团队创新建设项目（211zujbkytd002）、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定向探索项目（人文社会科学）（211zujbkydx005）

引用格式：靳晓哲.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性质、解构及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106-11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个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3]我国在涉疆等问题上遭受来自美西方所谓“人权指责”，是我国“挨骂”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重要体现之一。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研究大体有人权学、传播学、国际话语权等三个主要研究视角。人权学视角认为，西方主张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学说存在先天局限性，其实质是在人权旗号下的西方民主输出。传播学视角认为，美西方炒作所谓涉疆人权议题，已成为其对中国进行战略施压的主要手段之一，其本质是右翼民粹主义对身份政治的操弄，是转移国内矛盾、实施对华遏制的必然结果。国际话语权视角认为，建构中国的人权话语体系，不仅需要主动回应美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议题的非公正批评，还需坚定人权自信、深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不断充实和更新我国人权话语叙事。既有研究对认识美西方的人权话语提供了多学科视角，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助力，也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参考。

然而，上述研究对涉疆人权议题的具体关注略显不足。其一，涉疆议题与人权议题是如何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实现融合的？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演进中，人权话语并非一开始就被应用于涉疆议题，而是美国对华战略不断演进的结果。其二，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性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尽管很多学者指出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虚假性、工具性等特征，但对虚假性人权话语为何能够传播，尤其对虚假人权话语背后的制度性问题等探究不够深入。换言之，在涉疆问题上，为何明显有违事实的人权话语，能在国际社会得到传播？美国政府为何要接受这些虚假的人权话语？其内在逻辑与本质是什么？我国应如何应对？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性质

海登·怀特指出，叙事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被用来是否重现真实事件发展过程的中立话语形式，而是需要涉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选择，这些选择带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甚至特定政治意义^[4]。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指美国政府围绕涉疆人权议题而产生的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国际表达。这种表达往往是负面或带有显著消极倾向的表达或定性。近年来，围绕涉疆人权议题，美国新闻界、学术界、政界等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批评与指责”浪潮。从本质上看，美国对我国新疆人权状况的所谓“指责”，根本就是空幻、虚假的。

（一）空幻性：概念使用的两面性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空幻性，主要体现在“人权”概念使用上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人权”是一种否定性概念使用，是对世界人权发展多样性的否定。从17、18世纪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个体人权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以民族自决权为代表的集体人权概念，再到此后强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的综合人权概念^[5]，可以看出世界人权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演变的过程，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人权发展与内涵并不相同。美国针对新疆的所谓“人权指责”只强调一种单一性话语，即单纯强调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内核的价值改造，忽视了生命权、发展权等维度。从民主层面看，对自我治理模式或价值观的极端推崇，导致了美国不接受其

他治理模式下的繁荣，抑或认为这种繁荣是虚假的，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一种“民主和平论”的衍生物，即其偏执地认为，只有“民主体制”才是终极答案，而其他类型的治理只能导致对人权的所谓“践踏”。从自由层面看，新疆分裂势力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活动，使美国接受了新疆分裂势力的所谓“迫害性”话语表达。以“世维会”为代表的分裂组织，在美国积极活动，四处散播所谓被“迫害”言论。这种所谓“悲情”言说的目的就是通过媒体等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6]。在所谓“受害者”表达的推动下，美国接受了所谓“中国压迫人权”的虚假命题，强化了中国政府与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相对立的认识。美国的涉疆话语诬称，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的所谓“专制统治”、推行的所谓“汉民族主义”，是导致新疆所谓“人权践踏”现象的根本原因。很显然，这仅是一种强调个体片面性权利的单一话语，而非结合事实的客观言说。

另一方面，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所谓“人权”，是一种模糊性概念使用，是利用“人权”思想将自我的价值观念置于全人类道德制高点的错位桥接。“人权”与“人权概念”并不能等同。前者是有关人本身权利的抽象命题，后者是人权观念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自身活动的本质进行抽象的产物，最早出现在二战后的联合国文件中。换言之，“人权并不是有关‘人’的全部，只是对‘人’的一方面权利的具体表达；而人权概念则是需要进一步地表述为各项具体权利的，如民主、自由、发展权、生存权、人格权、尊严、环境权等”^[7]。在理论上，人权话语是对人权概念的具体阐述。基于不同立场和解释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人权话语。美国仅从所谓“自由”“民主”等政治权利出发，假借为新疆分裂势力伸张所谓“权利”，根本不顾及新疆地区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等权利。从根本上看，这混淆了人权与人权概念在人权话语中的使用，错误桥接了“人权”与人权话语。因为“人权”是人们基于人类群体的共有价值而产生的表达，仅是一种抽象价值观的呈现，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显然扭曲了“人权”在人权话语中的表达，仅从自我价值观出发，仅为一小部分人伸张所谓“民主”与“自由”权利。这显然是将自我价值观念置于“人权”之上，用所谓“民主”“自由”绑架“人权”，甚至将自我价值观念拔高到全人类道德高度。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可取。可见，美国利用了“人权”的抽象性，以自我价值观念为新疆分裂势力站台，实际上“把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拔高到了约束全人类的普遍性法则的崇高地位”^[8]。这是一种谬论。

（二）虚假性：肆意歪曲与编造事实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虚假性，主要体现在其不以事实为根据的肆意歪曲与编造上。近年来，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与德国人郑国恩的大肆鼓吹与造谣密切相关。自2016年底开始，郑国恩就在推特上频繁发布涉疆的不实言论。2019年7月，亚洲自由电台甚至将郑国恩吹捧为所谓“权威专家”。此后，西方媒体不加辨别地引述其言论，造成涉疆谎言在国际社会传播。比如，郑国恩妄称“尽管新疆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1.8%，但却使用了中国80%的宫内节育器（IUD）”。事实上，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新疆地区的IUD使用数量仅占全国的8.7%^[9]。这表明，郑国恩的所谓涉疆人权“证据”根本就是其编造、歪曲的，但其杜撰的所谓“报告”却屡屡成为美国媒体与政府引述的重要来源，甚至成为涉疆人权话语的所谓“论据”，不免让国际社会错愕。

西方反华学者历来热衷于编造与臆测。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下属的国际网络政策中心刊载的许秀中等的所谓“独立报告”为例，尽管其中的参考文献多来自中文，但查看文献原文就可知其引

用多是断章取义，其所谓“论据与结论”更是主观编造和臆测出来的。比如，其所谓“报告”诬称，每50名维吾尔族工人就配备一名政府安保人员，负责实施所谓“监视”^[10]。然而其所引用文献的原文为“当地在劳动力输出方面已形成成熟的品牌模式，主要以政府有组织输出为主，每批输出50人及以上，每50人配备一名管理人员（由当地派出并支付工资）、厨师等后勤人员”^[11]。此外，许秀中等全凭臆想，造谣新疆籍劳工的活动被“使用微信或从智能手机中提取资料”“充分追踪”^[10]。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和哈德逊研究所等持续炒作涉疆人权议题，也杜撰所谓“研究报告”。这些所谓“研究报告”并不可信，但经西方主流媒体配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严重误导了国际涉疆舆论^[13]。美国媒体不加甄别地引述所谓“独立智库”的所谓“报告”，借助所谓“人权”大肆炒作。这从根本上并不能改变美国涉疆人权话语虚幻性的实质。

二、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逻辑解构

一方面，虚幻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之所以能得到传播，原因在于其符合议程设置理论中的“中度导向需求—被动倾向”模式，这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传播主导权完全属于媒体与政府的传播模式。另一方面，虚幻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其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应将其放在美国对华战略的宏观背景下，从现实的战略需求层面进行分析。

（一）议程设置下的理论解构

虚幻的涉疆人权话语，为何能在国际社会得到传播？议程设置理论中的“导向需求”研究，可以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较为充实的理论解释。“导向需求”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描述的是需要获得的引导线索与寻求背景信息方面的个体差异。基于个体背景、经历差异，个体对信息的需求有明显差异。个体的导向需求受到关联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且二者相继发生作用。关联性是导向需求的初始界定条件^[14]。因为在获取信息时，个体兴趣的激发首先是基于该信息是否与自我相关的判断。不确定性是影响导向需求的第二个因素，也是其后置的界定条件，指的是个体在获取信息前对该主题的熟悉程度。通常来说，个体获得相关话题的信息越多，不确定性就越低。根据议程设置理论的推演，在公共事务领域中，个体的导向需求与大众媒体议程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导向需求分为低、中、高三种，它们分别对应低关联性低不确定性、高关联性低不确定性、高关联性高不确定性^[15]。根据两个变量的取值，有种情况是被遗漏的，即低关联性高不确定性。大卫·韦弗依据关联性、不确定性的取值，创建了2×2模型^[16]，从而解释了这种情况。在该模型中，高相关性、低不确定性被定义为“中等导向需求—主动倾向”，低相关性、高不确定性被定义为“中等导向需求—被动倾向”。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主动倾向多是与个体息息相关的个人事务，而被动倾向更多是与个体不大相关的公共事务。前者因信息的不确定性低，因而个体容易做出自己的判断；后者因信息的不确定性高，只能更多依赖媒体的议程设置。这就为媒体设置公众议程提供了空间与条件，或者说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交到了媒体手中，特别是在与民众日常生活高度不相关但民众又怀有较强好奇心的领域。

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推演，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较为符合“中等导向需求—被动倾向”的情况。近年来，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之所以能在较大范围内传播，其原因并不在于美国

民众对新疆的关注，而在于西方反华智库与媒体恶意建构的虚假议题。以所谓“强制绝育”为例，2020年6月，郑国恩在其所谓“研究报告”中污蔑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实施所谓“强制绝育”措施。此后，美国主流媒体进行了大范围转载与跟进报道。但这些报道不仅未核实其中的所谓“数据”与“事实”，还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最终引发失实报道的国际传播效应。事实上，对美国民众而言，引发其浓厚兴趣的并非新疆，而是标题中的所谓“强制绝育”。因为在西方社会，当此类标题出现时，事实为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发大众高度关注。加上西方民众对中国新疆了解甚少，此种议题传播的信息设置主动权，掌控在这些无良学者和媒体手中。

与此类似，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所谓“种族灭绝”谎言的传播，实际利用了普通民众对“种族大屠杀”的特殊历史认知。最早郑国恩使用的是所谓“文化灭绝”表述，他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实施所谓“汉化”，但这并未引发国际社会传播。此后，西方媒体开始对郑国恩的所谓“学术观点”进行加工，并不加验证地予以引述。为博取更多国际关注，所谓“文化灭绝”在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悄然升级为所谓“种族灭绝”。2020年底至2021年初，美国国内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反思二战期间“种族大屠杀”的国际会议，所谓“涉疆议题”也被囊括其中，而且郑国恩等也在参会之列。这说明，美国部分人士有意将“新疆”与所谓“种族灭绝”议题相勾连，营造一种二者有关的假象。其目的在于向公众传递一种信息，即“新疆”与所谓“种族灭绝”相关。此后，当“新疆”与所谓“种族灭绝”再次出现在媒体报道的场域中时，普通民众只会固化这种既定认知。这种情感层面的利用，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向民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继而，美国政府开始介入并印证这一说法，即以官方身份对此表态，最终对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作出定性。2020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妄称，中国在新疆对待穆斯林的方式接近所谓“种族灭绝”^[17]；2021年1月1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然在涉疆问题上使用所谓“种族灭绝”概念^[18]。至此，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所谓“种族灭绝”完成了自所谓学者、媒体向民众、政府的传播过程。

可见，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之所以能在民众与政府中得到传播，利用了民众情感及其对新疆“知识”的缺乏。从美国的议程设置重点来看，新疆“发生了什么”对西方民众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将触及民众情感的字眼与“中国新疆”进行关联。加上西方民众对新疆“知识”不确定性高的条件，就形成了议程设置理论中的“中度导向需求—被动倾向”模式。事实上，西方民众关注新疆，并非因为个体利益的驱动，而是内心的情感动机，但操弄这些情感的恰恰是西方无良的反华学者和不负责任的媒体。简言之，在低关联性、高不确定性的“中度导向需求—被动倾向”模式下，美国拥有了编造、歪曲、传播涉疆谎言的空间。

（二）对华战略下的现实解构

早在二战时期美国就已经在政治上介入了新疆，但此时的动机主要是“斡旋中苏关系、扩大影响与制衡苏联”^[19]。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重心在于美苏关系，因而并未过多介入新疆。冷战结束后，安全因素在美国政府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价值观因素开始凸显。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在涉疆问题上开始深耕，并逐渐转向“人权”。

“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政府通过“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会见新疆分裂势力头目等方式，尝试全面介入新疆事务。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启动的所谓“新疆工程”声称，“不能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其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这说明，

美国关注并介入涉疆事务的深层原因，是基于其对华战略的布局，并非只是为新疆分裂分子“站脚助威”。换言之，新疆分裂势力至多是美国政府开展对华竞争的工具，是一种“被利用”的角色。

“9·11”恐怖袭击之后，基于全球反恐的需要，并考虑到国际舆论影响，美国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由“公开”转为“暗中”。以此为背景，新疆分裂势力分化为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渐进”派和以“东突”为代表的“暴力”派。2005年，伴随热比娅的外逃，美国政府在涉疆话语的表达上彻底锁定所谓“人权”。这一时期，利用热比娅因素，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四处高唱所谓“保护人权”的基调，站在所谓“道义”制高点“指责”中国^[6]。与此同时，热比娅频繁出现在美国国会所谓“听证会”上，以“现身说法”形式向美国政府传达维吾尔族“受迫害”谎言。因而，美国介入新疆事务，特别是将抓手锁定所谓“人权”领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其对华战略的不断调整中转变的。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涉疆人权领域对中国的攻击变本加厉。特朗普上台后，右翼民粹主义主导了美国对华外交，特别是突出了“身份政治”的外交模式，即以“自我”和“他者”为基本界定，扩大自我的同质性以及与他者的异质性建构^[21]，以此明晰在国际社会的敌友身份。在排他性的异质性建构中，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塑造了“身份政治”的外部化，并将中国视为被责难的“他者”。这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涉疆人权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例如，其将国内的经济衰退、失业等归咎于中国的所谓不正当竞争，在政治上以“病毒”和“疫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宣传，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对美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和破坏等。这都是美国塑造“身份政治”外部化的重要体现，也与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并行而行。2021年3月，美国白宫发布的“中期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妄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22]。这种论述说明，拜登政府事实上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涉疆人权问题则是其污名化中国的重要议题和载体。略有不同的是，拜登更加强调联合盟友，在涉疆人权等议题上共同向中国施压。

在涉疆人权话语展开的过程中，美国右翼支持的所谓“智库学者”担当了急先锋角色，郑国恩就是典型代表。郑国恩所依托的詹姆斯敦基金会等所谓“智库机构”，带有浓厚右翼色彩。根据灰色地带网站的起底，2021年3月，美国“新行战略与政策研究所”（Newlines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Policy）发布的所谓“报告”，大量采用了郑国恩编造的谎言，其中罗列的所谓专家都是美国议会鹰派成员、前政府官员和狂热的军事干预主义者^[23]。此外，从所谓“智库学者”发布所谓“报告”到媒体报道，再到政府表态的时间线看，美国政府对虚幻的涉疆人权话语支持态度，其目的是将其塑造为对华战略工具。比如，在2020年6月郑国恩发布所谓涉疆“强制绝育”报告后，美联社几乎同步跟进，就发布了相关报道^[24]。6月29日，蓬佩奥妄称：郑国恩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对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了所谓“强制绝育”，持续“虐待和镇压”少数民族^[25]。在涉疆人权话语的塑造上，美国右翼智库、媒体、政府等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

当然，尽管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产链条较为完整，但各方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第一，郑国恩、许秀中等人充当“旗手”。以郑国恩为例，2017年之前，他未发表过任何有关新疆的研究成果，但2017年后他却摇身一变为所谓“新疆研究专家”。郑国恩发表的所谓“学术成果”更像是为博取利益或“名声”的学术投机，抑或是仅为西方攻击新疆制造理由。第二，新疆分裂势力在美国长期活动，是美国所谓涉疆人权话语的必备要素。在逻辑上，美国政府直接攻击涉疆人权并不具备合理性，因为一个针对“他者”的言说行为，其说服力与可信度并不高。但借助新疆分裂势力的所

谓“受害者”言说，再戴上所谓“人权”帽子，就赋予了美国在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上言说的“合理性”。第三，反华智库、媒体、人权组织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传播学看，反华智库或人权组织发布的所谓“研究报告”，并非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但经媒体转载、报道甚至配合，小话题往往被放大为社会议题，并进入国际传播主流。在涉及西方国家力推的政治议程时，这些机构往往会全力配合。比如，2019年底，为揭露美西方在涉疆问题上的抹黑，中国国际电视台发布了纪录片《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但在上传YouTube后就被以“涉嫌违规”为由下架^[26]。第四，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是其接受并利用虚幻涉疆人权话语的根本动因。从现实层面看，美国政府接受并利用被恶意制造的涉疆人权话语，受到其对华战略驱动。如果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那么美国政府根本不会接受虚幻的涉疆人权话语，也就谈不上传播。相反，面对虚幻涉疆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美国政府并非缺乏甄别手段，而是采取了无须甄别的态度。近年来，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契合了美国的对华战略，能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污名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创造议题、载体与空间。加上人权话语本身的投入成本较低，最终造就了美国污名化新疆的所谓“人权话语”大肆泛滥。

三、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本质

乔治·迪林指出，不能把话语仅视为一套形式化的、确定无疑的结构，因为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27]。在国际社会中，各国的表达并不是随意、杂乱无章的，而是一种带有目的性或指向性的言说。这种言说不仅带有自身立场，而且融合于自身认知。探究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不仅需要对其逻辑进行解构，还需对其本质进行深入分析。

（一）制度傲慢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对新疆的诋毁与指责，在根本上包含美国政府对“自我”身份的一种极致肯定。这种肯定既是对西式民主制度所谓“普适性”的推崇，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全面排斥。苏联的解体不仅强化了美国对自我治理模式的信心，而且激发了其在全球输出民主价值观的狂热。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叙利亚乱局，无不附着美国在全球输出“民主”的痕迹。血腥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证明，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下的民主输出使这些国家陷于更加混乱与动荡的境地。

美国输出西式民主制度的主要借口，是所谓“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论”。源于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反思，1976年斯莫尔和辛格首次使用了所谓“民主和平论”。此后，杰克·列维、迈克尔·多伊尔等从概念上对“民主制度”进行重塑，为西方国家极力鼓吹所谓“民主和平论”奠定了基础。杰克·列维将“民主国家”定义为“康德在著作中所描述的共和制国家”，并提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经验规律”^[28]。在此基础上，迈克尔·多伊尔对50多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实证探究，通过比较后得出“这些民主国家在150多年的历史中没有爆发过战争”的结论^[29]。这些研究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制度的理论根基。从克林顿时期的“全球民主化”战略到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再到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所谓“民主输出”俨然成为美国改造非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常态^[30]。美国在涉疆人权上的话语表达，体现的也是以所谓“民主输出”为核心的隐含性逻辑。美国政府频频指责新疆所谓“践踏人权”问题，其深

层次指向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存在的所谓“问题”，而“民主制度”恰好是解决这些所谓“问题”的“良方”。这种逻辑的实质是其着力以西式民主制度来改造中国，最终目的是颠覆我国在新疆地区的主权合法性。

同样，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论”也是美国政府输出西式民主制度的旗号。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无论何种信仰、国籍、种族、政治观念、社会出身，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人权^[31]。这成为西方国家高举“人权”大旗的借口。1977年5月，卡特政府声称，“对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信条^[32]。自此，所谓“人权”成为美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核心旗号。那些所谓“人权至上”的鼓吹者们认为，为预防或避免发生人道主义灾难，通过军事手段等对某些国家进行政体改造，将其改造为符合西式民主制度标准的国家是完全必要的^[33]。事实上，这种打着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政体改造，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心态，即无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及各国发展的实际，以所谓西式民主制度的迷思判定各国发展的优劣。其背后暗含的是盲目的制度优越论。近年来，从所谓“强制绝育”“强迫劳动”到所谓“种族灭绝”，美国政府在涉疆人权话语上的不断升级，目的在于通过所谓“种族灭绝”的定性，赋予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政府的所谓合理性，为干涉中国内政制造舆论和声势，最终遏制中国崛起。

无论是所谓“民主和平论”还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论”，都暗含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这种傲慢是对西式民主制度的一种极度自信，以至发展到极端自负的状态。换言之，那些所谓“人权”的鼓吹者们认为，只有西式民主制度才能保证所谓“人权”，西式民主制度才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所谓“最终正确选择”；只有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政府，才具有所谓“合法性”，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所谓“人权”。这种心态上的极度自负以及对西式民主制度的傲慢，既不符合各国发展实际，也不契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更不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34]。美西方国家有意忽视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问题的，实际上是以西方文明的“一元”来统摄世界文明的“多元”，以傲慢的心态否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从根本上说，这种傲慢心态不仅不能解决各国现实发展问题，反而可能给国际社会增添更多冲突、动荡与战争。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映射出一种西方文明至上的傲慢，是美国政府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现实性证明。

（二）认知偏见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恶意攻击，还源于美西方认知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东方主义”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权力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the Orient”（东方）与“the Occident”（西方）的相对，是“东方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作为一种权力话语，“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35]。“东方主义”^①的最基本特征是，作为西方的“自我”与东方的“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对此，萨义德认为，这是“一个绝对不容许侵犯的禁忌”^{[35] 311}。从根本上说，“东方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带有敬慕、神秘等情感，但在西方开启海外殖民之后，在其所

^① 萨义德《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主要指代的是伊斯兰世界，但历史上西方对远东中国的“东方主义”叙事采取了同样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建构的世界权力等级秩序之下，有关中国的否定性认知便占据了主导。历史上，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一个被西方化了的中国，是西方真正的“他者”^[36]。西方试图用“东方主义”权力话语表达控制与操控中国。

美国的“东方主义”传承于欧洲，但又更进一步。美国“东方主义”的核心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东方主义”，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关注东方的方式。早在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成立后，其首任会长约翰·皮克林在1943年首届年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了东方学的政治性意义而非学术性意义。萨义德指出：东方并未像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那样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问题，（在美国）而是成为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一个与政策有关的问题^{[35] 290}。因而，自产生之初，美国的“东方主义”就与欧洲有所区分，就附带美式意识形态和文化。所谓“美国例外论”则是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最典型体现。所谓“美国例外论”宣称，美国是全人类的代表，是世界“灯塔”，只有它代表人类前进方向，是世界发展的最后归宿；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白人在道德等方面是最高尚和最优越的，因为他们是由那些追求自由的新的人们组成的，真正的美国人都是清白无邪、诚实正直和善的化身。为将“自我”塑造成了一个美好的“例外”与“上帝选民”，美国必须建构出一个负面的“他者”来衬托，而这种认知一旦走向极端，就必然产生认知偏见，并相应地将“他者”妖魔化。

所谓“黄祸论”“赤祸论”等都是美国“东方主义”认知偏见的重要体现。所谓“黄祸论”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但根源于西方的种族主义和所谓异类恐惧症。在19世纪，以查尔斯·迪尔克等人代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鼓吹，种族融合会导致西方白人种族和文明的降低和退化。在这种认识下，华人劳工成为破坏美国族群纯洁性的所谓“黄祸”。这种威胁建构源于美国种族主义者对“他者”的恐慌以及对自我身份或文明衰败的焦虑。冷战时期，这种认知延伸到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判断上。实际上，共产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在冷战背景和认知偏见的双重影响下，共产主义被西方刻意赋予一种野蛮、非理性、蛊惑人心的“特质”，经常被认为是一种“东方”产物^{[36] 90}。中国的共产主义更是被污名化^[37]。冷战时期有关中国的错误描述，与此前的所谓“黄祸论”等，均未脱开美国“东方主义”的认知偏见。

近年来，美国涉疆人权话语逐步升级到对中国的恶意攻击，这是美国“东方主义”的一种当代延续。“中国威胁论”是承载这种认知的延续性话语。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被美国冠于“一种负面的、令人不安的和凶险的色彩”^[38]。这种基于对自我身份保护的认知，实质上是对美国“东方主义”偏执性观念的反映。这种认知内含于“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思维，是一种主观塑造“他者”的逻辑，而非依据事实的认知。换言之，这种认知是单方面的、主观的，且深植于本国文化之中。在这种认知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遵从“想象的逻辑”，而非“事实的逻辑”。在中国已经被妖魔化为威胁性极强的“他者”的前提下，推导出所谓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了所谓“侵犯人权”的结论，显然是符合其惯有认知的。因此，在众多反华学者的所谓“报告”面前，美国政府罔顾事实进行恶意指责，也就不难理解了。甚至，在中国政府先后发布《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

《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等反映新疆现实发展与人权进步的系列白皮书后，美国政府仍然置若罔闻，其认知背后的偏执与偏见，可见一斑。在这种极端化认知偏见下，美国政府极易相信所谓“研究报告”，甚至不加判断予以全盘接收。即便关注到中国政府为澄

清谎言而发布的白皮书，美国政府仍偏执地认为“这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表现”。简言之，无论新疆社会的发展事实是什么，在美国“东方主义”的偏见中，美国政府选择相信妖魔化中国政府的所谓“研究报告”，而现实的真相是什么，却不在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关注范围之内。

近年来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并非孤立性现象，而是一种带有强烈制度傲慢与认知偏见的敌对性表达。通过塑造外部“他者”的所谓“人权问题”，强调自我身份的优越性，通过塑造外部“他者”的所谓“威胁认知”，映射意识形态的偏见性。正如萨义德所言，任何一种表达“都无法脱离表述者所用的语言，其次是其所处的文化、制度和政治氛围”^[39]。在主权国家的权力结构下，各国对本国所选择的国家制度具有自信，是建构国家认同的必要措施，但一旦这种“自信”超出了一国范畴，膨胀为对他国的强制甚至敌意，那“自信”也就异化为“傲慢”。尽管各国的文明底色各有差异，发展阶段不甚相同，但不同的话语表达仅是国家偏好的范畴。一旦某国以强权为基础，对其他文明持蔑视或敌对态度，甚至执意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无疑就会陷入一种偏见。在国际交往中，制度自信可取，制度傲慢不可取；认知偏好可取，认知偏见不可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应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与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40]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我国成功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挨骂”问题仍有待解决，这在人权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41]。在应对这种现实挑战时，中国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话语建设，降低不确定性

外宣对于国际社会认识一个正确、真实的新疆至关重要。“思想和事实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是两个相互分立、相互独立的东西。”^[42]因为只有通过话语和知识，社会事实才能存在和具有意义，就像只有通过光的映照，实物才能为人所见^{[38] 22}。近年来，美国对涉疆议题的恶意攻击及其传播，主要采取低关联度、高不确定性的议程设置逻辑。对此现象，我国涉疆外宣工作要加强主动性和系统性。降低新疆知识的不确定性，增加新疆知识的国际传播广度，将是打破美国涉疆人权围困和拆穿涉疆人权谎言的有效方向之一。在涉疆问题上，我国应继续深化现有的反恐、反分裂话语，持续加强涉疆话语和叙事体系建设。只有坚持言说，才能在更长的周期内发挥效果。

（二）正视话语偏好，抵制话语偏见

有效区分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偏好和话语偏见，是正确认识国家间认知差异的基础和前提。人权话语是与人权相关的陈述体系和意义生产，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的产物^[43]。作为人权话语的言说主体，基于不同的文明底色和经历，各国出现不同的人权话语体系是十分正常的。这些都是正常的话语偏好范围。只要各方都秉承对话、交流、合作的心态，世界人权实践必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而，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恶意的歪曲攻击，试图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制度偏见”，特别是肆意炒作、丑化歪曲中国形象^[44]。这就超出了正常的话语偏好范围，而成为

一种话语偏见。针对这种话语偏见，我国应坚决地予以抵制和反击。

（三）加强国际传播，化解负面认知

加强我国智库和媒体国际化建设，重视同国际社会的对接，是正确认识国际传播中智库与媒体力量的基础。国际智库和媒体不仅是国家话语表达的重要载体，也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美西方的反华智库和媒体在涉疆人权谎言的编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国际人权领域，各国的认知和看法并不相同。在正常的交流范围内，国际智库和媒体可以担当双方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而一旦超出正常交流范围，国际智库和媒体也可成为国际斗争与传播的多元化主体。着力培养我国有影响力的国际智库与媒体，既可在遭受指责与攻击时采取对等反击，又可有效拓展我国国际传播的窗口。这是我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应对国际挑战、化解负面认知的一种有效策略选择。

（四）揭露强权属性，倡导多元发展

涉疆人权斗争并非单一领域的单一问题，而是融合了经济、政治、传播、历史等多向度的综合性问题。这要求我们认清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属性，积极向国际社会倡导人权发展的多元共生理念。涉疆问题并不是所谓“人权问题”，而是反恐、反分裂问题。美国之所以用所谓“人权话语”来描述新疆，根本目的是维护其国际霸权地位，以此扰乱新疆地区，企图迟滞中国的崛起。要改变或抵制这种霸权话语，第一步就是倡议与霸权话语不同的人权理念。布迪厄认为，社会就是一种“语言交换市场”^[45]。倡导国际人权的多样化发展，是增加国际人权多样性认知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应积极倡导多元的人权发展观，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选择，有意识地建构以“人民性”为核心的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同时还要积极扩大国际人权交往，推动各国人权理念的交流互鉴。唯有如此，才能为打破部分西方国家的人权话语霸权贡献中国力量，才能在国际人权多元共生中彰显中国元素。

参考文献：

- [1] John Hudson. As tensions with China grow, Biden administration formalizes genocide declaration against Beijing [EB/OL]. (2021-03-30) [2021-12-0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china-genocide-human-rights-report/2021/03/30/b2fa8312-9193-11eb-9af7-fd0822ae4398_story.html.
- [2] Allie Malloy and Kate Sullivan. White House announces US diplomatic boycott of 2022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EB/OL]. (2021-12-06) [2021-12-10]. <https://www.cnn.com/2021/12/06/politics/us-diplomatic-boycott-winter-olympics/index.html>.
- [3]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J]. 求是，2016（9）：3-13.
- [4]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 Representation [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鲁广锦. 当代中国人权话语的构建维度与价值取向 [J]. 人权，2020（4）：1-14.
- [6] 靳晓哲.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2）：78-88.
- [7] 张永和. 全面正确理解人权概念、人权话语以及话语体系 [J]. 红旗文稿，2017（14）：7-9.
- [8]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M]. 徐昕，郝望，李保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9] 梁平安. 美国独立媒体起底两届政府诬蔑中国“种族灭绝”依据竟来自极右宗教极端分子滥用和捏造的事实——从郑国恩案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我国大外交战略 [J]. 当代传播, 2021 (4): 66-68.
- [10] Vicky Xiuzhong Xu, Danielle Cave, Dr James Leibold, Kelsey Munro, Nathan Ruser. Uyghurs for sale: ‘Re-education’, forced labour and surveillance beyond Xinjiang [R]. Policy Brief, 2020 (26).
- [11] 广东企业招用新疆籍劳动者指引(试用) [EB/OL]. (2019-01-18) [2021-09-10]. http://hrss.gd.gov.cn/jyzl/ywzt/ldhz/content/post_1309587.html.
- [12] 张云梅. 和田地区创新机制助推劳动力转移就业 [EB/OL]. (2017-05-23) [2021-08-20]. http://www.chinaxinjiang.cn/dizhou/15/201705/t20170523_552732.htm.
- [13] 郑亮. 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93-101.
- [14]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 [M]. 郭镇之, 徐培喜,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8.
- [15] David Weaver. Political issues and voter need for orientation, in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Issues* [M]. Donald Shaw and Maxwell McCombs, ST Paul, MN: West, 1977: 107-119.
- [16] David H. Weaver. Audience need for orientation and media effect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0: 361-376.
- [17] David Brunnstrom. Something close to genocide in China’s Xinjiang, says U.S. Security adviser [EB/OL]. (2020-10-16) [2021-09-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xinjiang-idUSKBN2712HH>.
- [18] Nick Wadhams. Pompeo Accuses China of “Genocide”, With Support From Successor [EB/OL]. (2021-01-19) [2021-09-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1-19/pompeo-labels-uyghur-crack-down-genocide-in-final-shot-at-china>.
- [19] 许建英. 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中国新疆政策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 25-35.
- [20] Graham E. Fuller and S. Frederick Starr. *The Xinjiang Problem* [R].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3: 76-77.
- [21] 李捷. 美国对华政治极化与涉疆虚假人权叙事 [J]. 当代传播, 2021 (4): 69-72+102.
- [22]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EB/OL]. (2021-03-01) [2021-09-1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23] Ajit Singh. “Independent” report claiming Uyghur genocide brought to you by sham university, neocon ideologues to “punish” China [EB/OL]. (2021-03-17) [2021-08-22]. <https://thegrayzone.com/2021/03/17/report-uyghur-genocide-sham-university-neocon-punish-china/>.
- [24] China imposes forced abortion, sterilization on Uyghurs, investigation shows [EB/OL]. (2020-06-30) [2021-09-29].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6-30/china-forces-birth-control-on-uyghurs-to-suppress-population/12404912>.
- [25] The Uyghur Genocide: An Examination of China’s Breaches of the 1948 Genocide Convention [EB/OL]. (2021-03-31) [2021-09-01]. <https://newlinesinstitute.org/events/the-uyghur-genocide-an>

- examination-of-chinas-breaches-of-the-1948-genocide-convention/.
- [26] 新疆反恐纪录片被 YouTube 下架! 西方的言论自由就是个笑话 [EB/OL]. (2019-12-15) [2021-09-11]. <https://news.china.com/focus/ceshifagaos/11167381/20191215/37538008.html>.
- [27] 姚国宏. 话语、权力与实践: 后现代视野中的底层思想研究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12.
- [28] Jack S.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J].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88 (18): 653-673.
- [29]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6 (80): 1151-1169.
- [30] 郝诗楠. 民主输出的“致命自负”——评莱恩·穆勒森的《政体更迭: 从民主和平论到强制性政体更迭》[J]. 国外理论动态, 2015 (4): 122-127.
- [31] 曲伟杰, 胡家琳. 人权旗号下西方民主输出的挫败: 内在困境与原因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5): 103-108.
- [32] 席来旺. 美国“人权外交”简论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1 (2): 92-99.
- [33] 艾四林, 曲伟杰. 西方“人权高于主权”学说的局限及其问题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 (3): 169-174.
- [34]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刘为,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
- [35]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3.
- [36] 施爱国. 傲慢与偏见——东方主义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研究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29.
- [37] J. Fred McDonald. Television and the Red Menace: the Video Road to Vietnam [M]. New York: Purijie Press, 1985: 96.
- [38] 潘成鑫. 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 [M]. 张旗,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45.
- [39]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272.
- [4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68.
- [41] 任丹红, 张永和. 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 [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9 (1): 64-73.
- [42]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M]. London: Verso, 2001: 110.
- [43] 赵永华, 刘娟. 中国人权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1 (5): 117-125.
- [44] 邱昌情.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话语权: 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J]. 人权, 2018 (3): 63-77.
- [45] 高宣扬.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166.

责任编辑: 孙德魁



“灯塔”崩塌：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与运作逻辑

王怀强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回击美国反华势力借民主旗号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需要全面深化对美式民主本质的研究，特别是要揭示美式民主背后的深层结构和运作逻辑。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对美式民主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能够揭示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和运作逻辑。金钱政治、阶级政治、种族政治、营销政治构成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决定着美式民主运作的根本动力、统治结构、文化心理、控制机制等真实逻辑。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和运作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政治上的狭隘性、功能上的局限性和本质上的虚伪性。这些深层结构与运作逻辑表明，美国不是所谓“民主灯塔”，美式民主已经背离民主内核。

关键词：民主话语；美式民主；金钱政治；阶级政治；种族政治；营销政治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1-0119-10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统治形态，古典民主政治曾在古希腊和罗马文明中大放异彩，但随着罗马共和国为罗马帝国所替代，古典民主形态走向消失。直到千年之后，民主政治再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此后，随着现代世界的诞生，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民主政治开始有了全新的政治主导力量和共同体平台。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和专制君主的博弈中，逐渐形成一系列资产阶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1.011

作者简介：王怀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基金项目：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科研咨询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1ZCZD08）

引用格式：王怀强.“灯塔”崩塌：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与运作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1): 119-128.

级民主政治的思想观念及其制度形式，资产阶级拿着自由民主这把锐利武器，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世界内部推翻了持续上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实现了西方历史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日渐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逐渐异化和蜕变，其曾经起到的历史进步意义逐渐丧失，最终彻底堕落为维护 and 美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的政治工具。

进入 19 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在西方国家的完全巩固，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开始输出和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既是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不断形成和建构的过程，也是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确立自己霸权地位的过程。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从冷战时的两极格局演化为“一超多强”格局，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伴随世界政治格局的剧变，“历史终结论”等鼓吹西方道路的意识形态大肆盛行。资本主义民主特别是其最典型的代表——美式民主，被一些人鼓吹为所谓“人类民主政治的普遍模式”，被包装成包治百病的所谓“神奇药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所谓“标准与归宿”。在美国强大的文化传播机器和国际话语权支撑下，民主输出扮演着美国构建和维护冷战后世界霸权的帮凶角色。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在独联体国家、中亚国家和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颜色革命”。多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合法政权被所谓“街头政治”推翻，引发了一系列的地区冲突和政治动荡，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作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发展崛起被一些美国政客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所谓“威胁”，我国因此成为美国“民主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美国意识形态机器的长期渗透和大肆操弄，客观上致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严峻复杂挑战。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影响，美国和西方有关国家加紧以意识形态划线，破坏国际社会团结。特别是 2021 年以来，面对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国内政治撕裂和治理失灵的严重困境，美国政客大搞以民主之名煽动分裂对抗、转移国内矛盾、维护世界霸权地位的拙劣把戏。美国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全面升级，举办所谓“民主峰会”，企图对我国进行孤立和遏制。

针对美国借民主之名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党和政府以及理论界与之开展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在理论建设层面，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鲜经验，全面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2]。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既为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提供了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石，更为我们在国际上讲好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故事、有力回击美国借民主旗号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提供了有力武器。2021 年 12 月 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利用翔实的数据和有力的论证，细致阐述了中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12 月 5 日，外交部网站发表《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对美国民主的异化及其造成的严重国内国际危害进行了揭露。

在学术研究方面，近年来国内学界从不同角度展开对美式民主的研究。一是关于美式民主本质

的研究认为，美式民主在“一人一票”表象之下，实质是“金钱民主”“家族民主”“寡头民主”和“独裁民主”^[3]，“金钱选举”“金钱政治”构成美式民主的最典型特征^[4-5]。二是关于美式民主在国家治理方面缺陷的研究认为，美式民主在总统选举制度和国会议事制度方面存在严重缺陷^[6]，美式民主在现实中无法保证权力和平交接、不能带来政治稳定、无法提供治理效能、不能保障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和平等的政治权利^[7]。三是关于美式民主输出的研究认为，其本质就是美国以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软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政治诉求为先导，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建构的一套追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思想^[8]。四是关于美式民主与种族主义关系的研究认为，美式民主奉行的白人种族主义正在扼住美式民主的喉咙^[9]。

这些成果深化了我们对美式民主的认识。然而，目前相关研究还存在理论分析深度不够和不系统等问题，特别是缺乏对那些真正支配和决定着美式民主建构和运作的深层问题的系统研究，制约了我们对美式民主历史局限性、政治虚伪性和现实危害性的分析。有力回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反华势力借民主旗号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建设中国民主话语权，迫切需要我们全面深化对美式民主本质的研究，特别是要揭示美式民主背后的深层结构和运作逻辑。基于此，本文从根本动力、统治结构、文化心理、控制机制等层面，对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和运作逻辑进行分析，以期推动理论界深化对美式民主本质的研究和认识。

二、金钱政治：美式民主的根本动力

美国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是其整个社会秩序的血脉，金钱作为资本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构成美国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机制，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可以说，如果离开金钱，美式民主在实践中既无法运行，在观念上也无法理解。如果说美式民主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存在什么突出的地方，那就是比其他国家以更直接、更露骨、更彻底的形式展示了金钱在资产阶级政治秩序建构和运行中的支配性地位和主导性作用。“金钱是美国政治的驱动力。美国庞大复杂的政治机器，只有在金钱燃料的推动下，才能持续前行。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润滑剂。离开金钱，美国政治根本无法顺畅运行。金钱政治贯穿了美国选举、立法和施政的所有环节，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顽疾。”^[4]

金钱政治充斥于美式民主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但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仍然是选举。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是美式民主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运作环节，也是美国精英对其民主政治着重标榜的地方。事实上，许多广为流传的西方民主理论就是以美国式选举作为参照标准来界定和阐释民主政治的所谓“本质”。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0]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也从选举角度对民主进行界定。他说：“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11]那么，作为美式民主核心内容的选举，是不是真像他们在理论层面所描述的那样，对每一个公民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呢？当然不是。在美国的现实是，没有金钱，就没有选举；选举离不开募集选举资金，成功的竞选更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对美国竞选政府公职的那些候选人来说，最重要也最具挑战的事情，就是募集足

够多的资金以满足竞选活动的需要。有学者指出：“美国的总统选举，是一种系统性、结构性腐败，是通过暗箱操作却又披上合法外衣的金钱买卖。”^[12]“21 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 2004 年的 7 亿美元，快速增加到 2008 年的 10 亿美元、2012 年的 20 亿美元。2016 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 66 亿美元。”^[4]2020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总支出更是高达 140 亿美元，是 2016 年的 2 倍多，被称为“史上最烧钱的大选”。其中，总统选举花费达到 66 亿美元，国会选举花费超过 70 亿美元^[13]。

美国也曾试图通过立法来改变金钱操控选举的局面。如美国国会曾于 2002 年颁布禁令，禁止在联邦选举竞选中捐赠“软钱”，“软钱”漏洞一定程度上被封堵^①。但与此同时，对个人捐款的上限却翻了一番，进一步使以富豪阶层为主的个体捐献者成为选举献金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证明，美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在堵上一些漏洞的同时，往往都会产生新的更大的漏洞。这些新漏洞只会更加有利于权贵和富豪操控政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献金政治这种严重的政治腐败却在所谓改革中变得越来越公开化、制度化、合法化。2002 年选举献金制度改革后，美国金钱政治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遏制，反而使每次选举的花费几乎以翻番的速度不断刷新纪录。

在这种天文数字般的选举花费面前，美国底层民众事实上丧失了参与竞选的资格，被排除在权力圈子之外，直至沦为富豪阶层的“提线木偶”。这种政治运作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普通民众的利益表达越来越难以有效进入政治和公共政策，政治活动进一步成为有钱人维护其地位和利益的工具。就像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在 2020 年 3 月出版的《系统：谁操纵它，我们如何修复它》一书中指出的，过去 40 多年，美国的政治系统被极少一部分人操控。金钱政治和游说团体正在扭曲美国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绝大多数人表达真实意愿的声音都被极少数利益集团盖过了^[13]。美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正是这种政治体制运作的结果。究其根本，美式民主被金钱政治所主宰，是由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逻辑所决定。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逻辑在于：这是一个为金钱所统治的社会，金钱总是在寻找机会进入政治运行，使国家政权成为维护金钱利益的机器。对此，美国一些学者有着深切的体会和观察，就如托马斯·帕特森所言：“水总是往低处流，金钱看起来总要找到进入选举政治的途径。”^[14]

三、阶级政治：美式民主的统治结构

美国人常常自诩其文化的个人主义特征。对部分美国人来说，阶级问题是一个他们不愿意谈论的话题，美国社会舆论总是喜欢把美国描述成一个没有阶级区分和阶级冲突、人与人之间身份和地位平等的社会。恩格斯曾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对美国社会舆论的这种倾向做过深入揭示：“1886 年 2 月，美国的舆论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因此，那种使欧洲社会分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和国不可能发生。”^[15]但事实恰恰是，美国存在阶级区分和阶级统治，并且其阶级政治体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高度发达的特征。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① 美国选举中，所谓“硬钱”是用于联邦职位竞选（如总统、国会议员等）的资金，对此，《联邦选举竞选法》有各种限制。所谓“软钱”，就是用于州和地方选举的“非联邦资金”，对此，《联邦选举竞选法》没有相关的限制。直到 2002 年，为封堵“软钱”漏洞，美国国会制定了《两党竞选资金改革法》。

“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17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15] 318}，美国“广大工人群众在国内辽阔地区的几次自发的本能的运动，他们对于到处同样的、由同样原因造成的悲惨的社会状况普遍不满的同时爆发，使他们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独特的阶级，一个实际上多少是世代相传的雇佣工人即无产者的阶级”^{[15] 317}。

从历史上看，美国政治秩序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烙上了阶级的烙印。分析作为美国政治秩序设计基石的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构成，就可见一斑。虽然1787年制宪会议被西方特别是美国人视为西方自由民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制定的美国宪法被一些人看作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一面“旗帜”。但事实上，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不是普通民众的代表。恰恰相反，这些人大部分是大商人和资本家。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等人指出：“参加制宪会议的都是国家知识和经济领域的精英，其中有大地主、商人、进口商、金融家、放贷者、不动产投资家和政府债券所有者。”他们进一步分析指出：“美国建国先贤们并不是这个新国家400万公民的代表，因为400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小农、负债者、小商贩、边远地区农民、服务业者和奴隶。”^[16]因此，美国政治秩序从其建立的第一天起，就绝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而是大资产阶级、大商人阶级利益的表现。其政治秩序的建构，不但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表达人民群众意志，相反，其考虑的首要问题恰恰是如何防止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政治权力，即所谓“多数的暴政”问题。担任过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就曾直言：“美国政府的真正主人是资本家和工厂主。”^[17]20世纪著名的美国社会哲学家约翰·杜威也认为：“政治是大资本力量覆盖在全社会之上的影子。”^[17]

随着其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发展演化，美国政治的阶级统治本性不但不会减弱，反而日益加重。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美国国内的阶级统治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阶级政治的色彩更加浓重。一些经济学者通过研究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美国国内分配结构的变化，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杜梅内尔和列维在仔细分析美国收入分配数据后总结说：“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开始迅速上升，在20世纪末达到了15%。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其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2%上升到1999年的6%以上，而工人与行政总裁的平均收入比率则从1970年的30:1上升到了2000年的将近500:1。”^[18]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背后，是美国社会深陷社会文化冲突。对此，有政治和文化学者分析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震动美国的文化斗争，更准确地说其实是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19]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财富分配逻辑和社会结构演化持续加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据统计，美国亿万富翁拥有的总资产增加了1.763万亿美元，涨幅高达59.8%；排名前10%的美国富人持有89%的美国股票，创下历史新高；2021年美国基尼系数升至0.48，已经成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13]。与此相伴随的是，从“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开始，到新冠肺炎疫情失控酿成惨剧，再到2021年国会骚乱事件，美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不但没有消除阶级斗争，反而使阶级斗争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程度。资本主义“使

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 32}。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就建立在这两大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这一政治支配结构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会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 33}。事实上，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到现在已经历数百年的发展，美国则是发展得最为充分、最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政治秩序的建构和演化，自然最集中地体现了阶级政治的统治结构和统治逻辑，即阶级对立、压迫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冲突和灾难。

四、种族政治：美式民主的文化心理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种族主义是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塔基耶夫就明确提出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20]。进一步梳理现代西方文明演进历史，可以发现其内在地存在着严重的“白人种族主义”色彩。这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今天向全世界大肆传播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和“人人生而平等”信条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现代西方文明范围内的国家中，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像美国那样，受种族政治逻辑影响程度如此之深。亨廷顿坦承：“人种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上的重大差别，在美国一向存在而且继续存在。”^[21]美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种族主义问题是美国民主无法磨灭的耻辱烙印”^[13]。

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到对非裔美国人实行奴隶制，再到 20 世纪以来对拉美裔、亚裔等移民群众的种族排斥和歧视政策，种族政治充斥于美国建国以来的整个历史中，在美国政治史上从未间断过。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种族政治中最黑暗的开始。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最初到达美洲大陆的欧洲移民，来到的并不是一个无主蛮荒之地。相反，这个大陆上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这里的人们曾创造了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从人口数量看，当西方人到达时，整个南北美洲至少有数千万土著印第安人，即使在今天美国的领土上，当时也有近千万印第安人。所以，欧洲人的到达和美国的建立，自一开始就面临着白人移民与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冲突。在冲突中，白人移民利用其技术优势，对土著人采取了残酷的驱逐和杀戮的种族灭绝政策。在现代美国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西进运动”，其实也是一段白人移民对土著印第安人进行种族屠杀和野蛮驱逐的历史。对印第安人的残酷灭绝，后果是惊人的种族替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用“生物取代”这样一个看似中性的学术概念描述了这一结果。他说：“欧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统治或文化渗透，还包括现实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有形取代。”^[22]这种一个大陆上人为的种族替代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对黑人实行野蛮的奴隶制，是美国种族政治的另一典型表现。有西方学者就曾直接将种植园奴隶制看作种族主义的源头：“奴隶制是种族主义的起源，种族主义来自种植园的经济要求。”^{[20] 23}在美洲大陆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黑人，自一开始就是作为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并沦为白人种植园主的私人财产。被视为美式民主奠基文献的 1787 年美国宪法，却把这种奴隶制合法化了。美洲白人移民建立的这种现代奴隶制，远比古代奴隶社会更加残忍、黑暗，更加不人道。正是

这种奴隶制经济，为美国巨额物质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直到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对黑人的奴隶制才从法律上被正式废除。但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并未随南北战争的结束而一同消失。托克维尔早在 19 世纪初就曾有过天才般的洞见：“在美国，排斥黑人的偏见仿佛随着黑人不再是奴隶而加深，而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则随着法律废除不平等反而加强。”^[23]他甚至预言：“我不认为白人和黑人将来会有一天在某个地方以平等资格一道生活。”^{[23] 415}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种族隔离代替了曾经的奴隶制，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黑人被隔离于白人之外，甚至是乘坐公交车也不例外。美国社会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致使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不得不动调联邦军队去处理 1962 年密西西比大学因依照政府关于消除种族隔离的法律，录取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斯而引发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发起的动乱。在 21 世纪的今天，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不但没有得到杜绝，反而在经济危机深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冲击下有新的加剧。

对拉美裔、亚裔以及南欧、东欧移民的排斥，也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对拉美人种的歧视，曾在 19 世纪美国的领土扩张中引起过争论。争论一方曾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来支持领土扩张和种族征服；争论另一方用同样的理由来反对扩张，认为领土扩张和种族征服会影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纯洁性”。对亚裔美国人，美国历史上曾诞生过臭名昭著的 1882 年“排华法案”和 20 世纪初禁止亚洲人移居美国的法律。对南欧、东欧移民，美国同样曾以“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为名限制移民，出台否定基本民主权利的法令。在今天的美国，对拉美裔、亚裔等族群的歧视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在经济危机、疫情冲击等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加剧的态势。

究其根源，美国政治的种族政治底色来自早期美洲大陆白人移民内心深处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法官杰伊就曾直白地说：“我经常注意到，上帝乐于把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赐予一个团结的人民——这个人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的同样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24]亨廷顿则从政治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美国的开国先辈认为，共和国政体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保持种族上和宗教上相对高度的单一性。”^{[21] 47}美国统治者的这种种族主义思维和“白人种族优越论”偏见，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深处，给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深深打上了种族政治的烙印。

五、营销政治：美式民主的控制机制

营销政治指美国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统治阶级利用强大的文化工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和媒体力量影响舆论。其利用一系列意识操纵工具和技术，蛊惑民众心理，诱导社会舆论，制造所谓“民意”，实现对民众的精神统治，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目的。在美国，营销政治的色彩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浓烈。

美国营销政治的控制逻辑已为部分美国学者深刻揭示和批判。美国学者杰拉尔德·瑟斯曼将美国政体描述为“宣传型政体”。他认为，在这种政体中，宣传营销或者说有组织的操纵群众意识成为政治经济的核心；整个政治秩序的构建、政治选举的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与广告营销密不可分，宣传营销在社会上无处不在。杰拉尔德·瑟斯曼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信息密集型经济时代的来临，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促销型文化。现代营销技巧运用不仅在私人企业活动的商

业领域中十分发达，而且在公共领域中，依靠数字化的信息技术和媒体进行政治包装和政治促销，也已经成为公共政治运作的基本模式。“宣传成为推销和贩卖政治人物和党派的思想力量及其‘商标形象’的一种手段。”^[25]当然，运作公共关系、进行民意测验、开展广告宣传，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来保证。这就决定了信息的垄断权、舆论的控制权掌握在那些富豪和上层阶级手里，普通民众在政治运作中只能沦为被动的听众。这一点从美国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归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美国，“大众媒体——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高度集中的，且这一趋势一直在不断强化。所有的大型媒体公司都由上层阶级的人所有，且它们与其他大公司之间还存在紧密的连锁现象”^[26]。美国大众传媒专家席勒指出：“可以完全准确地把美国界定为一个分散的社会，在这里，操纵成为控制的主要工具之一，而这种控制又握在一小撮起统治作用的大公司老板和政府头子手中。”^[27]

美国营销政治的形成，本质上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决定的。俄罗斯学者穆尔扎曾分析指出，作为权力手段的意识操纵正是随着以代表制民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的建立而产生的^{[27] 39}。这种代表制民主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它在政治运作中通过庞大严密的营销机器，系统操纵社会舆论和民众意识，维持自由主义那一套所谓“公众授权”的政治神话，掩盖现实的不平等的统治关系，转移民众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注意力，保证被统治阶级自觉遵从资产阶级特权。可以说，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有力控制社会意识操纵工具，进而控制着社会的真正统治权。

另外，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分工、技术进步等复杂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美式民主的营销政治逻辑。在资本力量和社会分工的推动下，政治职业化成为二战后美国政治生活中不断加剧的趋势，政治活动越来越变成由公司顾问、民意测验者、公关专家、撰稿人、游说者这样一些专业专职的人进行的品牌营销和意识操纵活动。而从技术层面看，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策源地，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以及资本力量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使资本统治集团对信息传播的控制进而对政治生活的控制达到了传统技术条件下难以想象的程度。美国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利用强大的信息技术工具，肆无忌惮地进行信息操弄，营销政治逻辑在这种信息操弄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2]。这些重要论述是运用唯物史观系统思考民主政治形成的创造性理论成果，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核心要义，为我们从根本上把握民主的本质、价值和不同国家及其人民的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根本指导。

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对美式民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能够揭示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和运作逻辑。美式民主作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的典型形态，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在其兴起

阶段中反抗封建统治而形成的进步观念和代议制、多党制、司法独立等制度设计在形式上演绎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体现和暴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内在局限和反动本质。美国不是所谓“民主灯塔”，美式民主已背离民主真意。从深层结构看，金钱政治构成美式民主的根本动力，阶级政治构成美式民主的内在统治结构，种族政治构成美式民主的文化心理，营销政治构成美式民主的控制机制。

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和运作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政治上的狭隘性、功能上的局限性和本质上的虚伪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问题的日益积累爆发，美式民主的异化和衰败自然体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已经被美式民主的现实表现所证明。面对美国民主制度痼疾积重难返、民主实践乱象丛生，以及民主输出给世界带来严重危害，即使如弗朗西斯·福山这样曾经提出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人士，也不得不发出“美国的许多政治制度都在日益衰败”“政治衰败问题对当今美国的折磨程度超出了对其他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折磨程度”“美国政府再次彻底世袭化了”^[28]等种种叹息，提出“大断裂”“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身份政治”等概念^[29-31]，对西方自由民主特别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败和国家治理的危机进行理论反思。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交织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挑战，从国家层面讲，各国只有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有效的民主政治，用真正的民主把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团结起来，才可能战胜各种内部困难。从国际层面讲，各国只有努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人民才能团结合作，携手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36.
- [2] 徐隽．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N]．人民日报，2021-10-15（1）．
- [3] 程恩富，段学慧．美式民主究竟是什么[J]．唯实，2018（7）：29-33.
- [4] 中国人权研究会．金钱政治暴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J]．人权，2020（2）：188-194.
- [5] 朱继东．“金钱选举”：美国式民主不是世界的标杆[J]．党建，2012（11）：56-58.
- [6] 何家弘．“美国式民主”之我见[J]．理论视野，2019（2）：79-85.
- [7] 李云龙．“美式民主”神话的终结[J]．理论导报，2021（1）：63-64.
- [8] 金英君．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解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4）：139-148.
- [9] 王宇．种族主义正在扼住“美国式民主”的喉咙[J]．红旗文稿，2021（15）：36-37.
- [10]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6.
- [11]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
- [12] 龚云．“美式民主”的困窘[J]．理论导报，2016（8）：34-35.
- [13] 美国民主情况[EB/OL]．（2021-12-05）[2021-12-24]．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112/t20211205_10462534.shtml.
- [14] 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M]．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83.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6.

- [16] 托马斯·戴伊. 民主的反讽 [M]. 林朝晖,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28.
- [17] 乔姆斯基. 失败的国家 [M]. 白璐,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59.
- [18] 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简史 [M]. 王钦,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17.
- [19] 拉希. 精英的反叛 [M]. 李丹莉,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12-13.
- [20] 皮埃尔-安德烈·塔基耶夫. 种族主义源流 [M]. 高凌瀚,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7.
- [21]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252.
- [22]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M]. 董书慧,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05.
- [23]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 [M]. 董果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401.
- [24]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 [M]. 程逢如,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8.
- [25] 杰拉尔德·瑟斯曼. 西方如何“营销”民主 [M]. 郭忠华,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14.
- [26] 威廉·多姆霍夫. 谁统治美国: 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 [M]. 吕鹏, 闻翔,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275-276.
- [27] 穆尔扎. 论意识操纵 [M]. 徐昌翰,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2.
- [28] 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J]. 宋阳旨,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4 (9): 6-15.
- [29] 弗朗西斯·福山. 大断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M]. 唐磊,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30]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M]. 毛俊杰,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31] 弗朗西斯·福山. 身份政治: 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 [M]. 刘芳, 译.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2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刘伊菡



制造断裂：美国自由民主制的三重迷思

于镭¹ 于飞洋²

(1. 聊城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山东 聊城 252000;

2. 北京建筑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美国建国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自由派政治精英和政治学家竭力美化美国的民主模式——自由民主制，建构美国在国际民主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自由民主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迷思，美国民主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而暴露出重大缺陷。美国自由民主制的建构、运转、输出三重迷思集中体现为“制造断裂”：广大民众边缘化导致政治基础割裂，政治寡头化、经济两极化导致国内社会撕裂，以价值观划界制造国际社会分裂。美国政治精英囿于对既得利益的护持，根本无意对美国自由民主制的重大缺陷予以根本性修正，美国民主的痼疾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美式民主；自由民主制；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主输出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2) 01-0129-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古希腊的民主理念和原始实践的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国家运行和治理的政治体制，即所谓自由民主制。这一体制无论是在理论上抑或建构上均存在重大缺陷，其危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而日益凸显。但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囿于既得利益既无意也无力从根基上修正这些缺陷，反而随着美国经济、政治特别是军事的崛起，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1.012

作者简介：于镭，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于飞洋，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于镭，于飞洋. 制造断裂：美国自由民主制的三重迷思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129-136.

对自由民主制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美化，以建构美国政治体制的国际话语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有关政客和学者目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臆断“这是美式自由民主制对苏联威权制度的胜利”。福山甚至断言所谓“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1]。福山的臆断既没有理论依据，更缺乏实证支持。相反，冷战、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治理和民主输出，不仅证实了美国自由民主制“边际效用”的衰减和对美国社会的撕裂，而且证实了美国自由民主制向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普遍性失败和对国际社会的分裂。

面对美国民主和道义在后冷战时期的快速沦陷，福山不得不在冷战结束 20 年后即反思美国自由民主制的迷思，坦承美国政治已被精英阶层操控，民主的根基也被严重腐蚀，自由民主制根本无法应对美国面临的长期性挑战。福山承认，美国自由民主制根本没有资格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说教^[2]。一些中国学者在深入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后也指出，美国日趋恶化的社会撕裂、政党对立、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等问题均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失灵失效引发的痼疾，少数政治人士和一两届政府根本无力根治这些问题^[3]。李世默在《经济学人》撰文指出，二战后西方给自由主义穿上了“民主”的外衣，但自由主义民主并没有带来民主的结果，反而成为民主的祸根。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崭新的角度^[4]。中国学者还较为一致地认为，美国民主输出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不顾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宗教关系与民族关系的异质性，一味地以价值观划界，将民主“霸权化”“意识形态化”，刻意制造国际社会的分裂^[5]。崔小涛认为，美国借民主之名推进地缘政治战略，在国际社会中人为制造民主价值观方面的“身份政治”，用民主标签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民主国家”和其他所谓“非民主国家”，挑动分裂与对抗，企图威逼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入美国阵营，服从美国利益^[6]。

美国为什么会在后冷战初期短短的 30 年内迅速从西方建构的民主话语体系的所谓“山巅”和“灯塔”跌落？这是本文着力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对美国国家治理、民主输出等方面的实证考察，认为美国自由民主制的建构和推行存在着重大迷思，制造了严重的断裂。在国内，政治“寡头化”、普通民众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边缘化”、社会经济结构的“两极化”，导致美国社会的自我断裂。在国际社会，美国以价值观划界，推行民主输出的“霸权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为制造国际社会的分裂。基于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建构、运转和输出的实证研究，本文强调美国政治精英囿于对既得利益的护持，根本无意对美国自由民主制的重大缺陷予以根本性修正，美国的民主痼疾将长期存在。

二、建构的迷思：广大民众边缘化导致政治基础割裂

包括美国自由民主制在内的西式民主均起源于 2 500 多年前的古希腊，民主本意为“人民的统治”^[7]。古希腊的民主制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狭隘地定义民主的主体“人民”，将其局限为极少数享有“公民权”的成年男性，而将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数量众多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排斥于“民主”之外^[8]。二是实行“主权在民（公民）”的直接式民主，而不是代议制民主。因此，古希腊民主强调的权为“民（即希腊公民）所有”，权为“民（即希腊公民）所用”，实际上仅代表少数人和某些重大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学者一方面强调现代

民主的要义不仅在于继承和发展古希腊原始的民主理念——“人民的统治”，更在于领悟和坚持民主的本质——“执政为民”^[7]；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可见，美国自由民主制不论是在民主的理念、民主的本质抑或民主的实践方面都存在着难以矫正的迷思。这直接导致美国自由民主制在国内治理上的效用衰退和在全球治理中的失败。

美国自由民主制建构的初衷不是为了实现“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而是旨在剥夺广大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让政权只为少数精英和重大利益集团服务。美国有关政治学者认为，美国的建立仅是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北美殖民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根本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无涉。这些学者认为，这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对广大普通民众的民意缺乏回应热情和动力的根源^[9]。美国的开国元勋和政治体制设计者们，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等，均毫不讳言地表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要将“人民及其力量”排斥于政府之外，普通民众的民意只能由其选举的代表即政治精英代为转达至政府^[10]。美国政治学者因此得出结论：美国自由民主制肇造时即剥夺了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而仅服务于少数精英的利益。权不为民所有、权不为民所用，表明美国本质上并非真正的“民主”国家^[9]。

美国的统治阶层长期有意识地系统性压制民主政体的核心方面，即美国广大普通民众的投票权。美国在全世界宣扬自由民主制的“优越性”，并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并在国内长期系统性压制美国普通民众的投票权。19世纪末，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空前壮大，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统治阶层对此忧心忡忡，遂于1896年对美国的选举体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少数族裔的身份证明和选民注册规定^[11]。这些改革的目的是系统性地阻挠和压制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普通民众参与选举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强化美国精英阶层和重大利益集团对政权的掌控和对既得利益的护持。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洛尔德在《美国人为何不投票》一书中认为，美国1896年的选举改革就是为了强化精英阶层和利益集团对政权及其利益的掌控，阻挠普通民众对美国选举乃至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影响^[12]。两位政治学者指出美国选举制度自此更加疏离普通民众，无法体现美国社会特别是广大普通民众的民意。受其影响，美国迟至1913年才通过《宪法第十七修正案》，规定联邦参议院改由选民直接选举；迟至1920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给予妇女选举权。而美国黑人则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的斗争才最终迫使国会于1965年通过《投票权法》，获得选举权^[13]。虽然美国妇女和黑人民众历经磨难和抗争最终获得了选举权，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对妇女、黑人及广大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制度性压制和其他各种人为壁垒仍根深蒂固。

美国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投票权的系统性压制，导致美国普通民众对选举的热情度和参与度长期在低位徘徊，大选的投票率远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2014年，约有1.5亿选民拒绝参加中期选举投票^[14]；2016年，近1亿美国选民拒绝参与大选投票^[15]。美国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大卫·贝克尔研究发现，美国的大选投票率长期处于持续下滑的态势：从冷战时期的60%左右直线降至2016年的45%左右^[16]。美国的低投票率与法国、澳大利亚长期高达80%的投票率，以及德国、英国60%的投票率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8个成员中，美国适龄人口的投票率位列第31位。美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远离美国政治和选举。美国

政治学者丹尼尔·茹特和利兹·肯尼迪对美国的低投票率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他们的采访和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发自内心地重视选举：7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参与选举比纳税和守法更重要。他们认为，美国选民投票率低不是由于他们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而是美国不合理的选举制度阻碍了美国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治理，迫使美国普通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美国大选结果越来越背离普通民众的意志，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社会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意愿^[17]。

三、运转的迷思：政治寡头化、经济两极化导致国内社会撕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开国元勋和政治体制设计者们千方百计地将广大民众排除于政权之外，但他们也深知国家政权决不能由极少数金融寡头和大富豪操控。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和《独立宣言》的主要撰写人。他预见到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对操纵国家政权的欲望及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危害性。鉴于此，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和政治体制设计者们：“金融寡头势力把持国家政权的危害性远甚于军队。”^[18]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与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的利益渐趋契合，进而紧密捆绑。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的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着力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中寻找和培养权力代理人；同样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也自甘为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服务。金融寡头、顶级富裕阶层与经济、政治精英的利益勾连，导致美国自由民主制完全背离民主的初衷。美国政治已经寡头化，美国普通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

尽管选举式民主在冷战期间被西方政治学者和政客描绘为现代民主的所谓“圭臬”和“人类政府的终极模式”，但亚里士多德早在 2000 多年前即一针见血地揭露其本质是“寡头制民主”“贵族制民主”，只代表了极少数人的利益，并不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和意愿^[19]。美国政治学者通过大量研究数据证实了美国的顶级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越来越有力地左右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学者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经过长期追踪研究发现，只要美国的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反对，美国的公共政策就难以被采纳和施行；只要他们支持，公共政策就会轻而易举地被采用^[20]。两位学者强调，正是由于美国社会的顶级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把控了美国政权，建构了“寡头政治”，美国政府才越来越无意回应占人口数量绝大多数的普通选民的利益诉求。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民众总是抱怨他们的政府只代表占人口总数 1%的顶级富裕阶层的利益，而占人口总数 99%的普通民众被边缘化^[19]。

在政治寡头化的同时，美国社会在后冷战时期加速呈现两极化的发展态势。美联储和其他研究机构提供的经济数据表明，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在后冷战时期拥有的财富快速增长，美国的财富也史无前例地高度集中于顶级富裕阶层。美联储最新发布的美国财富分布报告透露，占美国人口总数 0.1%的最富裕人口拥有全美国 20%的财富；1%的顶级富裕阶层总资产快速增长至 36.2 万亿美元，占美国财富总额的 27%；而占美国人口总数 60%的所有中产阶层的财富则大幅度降至 35.7 万亿美元，占美国财富总额的 26%^[21]。这是自美联储有统计数据以来，美国顶级富裕阶层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越美国中产阶级。曾担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的杰森·富尔曼通过研究发现，自 2019 年以来，占全美人口总数 1%的顶级富裕阶层的财富大幅度增加，其资产总额暴增了 4 万亿美元，超过了同一时期近一半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22]。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 10% 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其余 90% 人口的 9 倍多，最富有的 1% 人口的平均收入是这 90% 人口的 39 倍，而最富有的 0.1% 人口的平均收入则为这 90% 人口的 196 倍。

面对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桥水对冲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忧心忡忡地承认，美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升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23]。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多次在公共集会和媒体上批评美国体制导致财富极度向顶级富裕阶层集中。他警告“1% 的顶级富裕阶层拥有的财富比整个中产阶级还多，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与华尔街金融大亨和顶级富裕阶层快速聚积财富相反，美国普通家庭积蓄财富的难度却越来越大。富尔曼的研究发现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在 1943 年至 1973 年间每 23 年就会翻番，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翻番则需耗时一个世纪^[22]。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贫困率也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 2019 年的 10.5% 升至 2020 年的 11.4%，这意味着美国贫困人口增加了 330 万，达到创纪录的 3 720 万人^[24]。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残酷现实说明美国社会财富业已两极化，社会阶层也随之极化，美国自由民主制的根基正经受史无前例的腐蚀。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发出警告“美国正处于绝对不平等的危机中”^[25]。美国在后冷战时期财富迅速向顶级富裕阶层集中，中产阶级快速萎缩，贫富差距史无前例地扩大，深刻地反映了美国自由民主制业已根本性背离民主的初衷。

四、输出的迷思：以价值观划界制造国际社会分裂

尽管美国自由民主制在其国内的建构和实践困境凸显，但美国自建国后却一直热衷于向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出美式民主，以谋取和巩固霸权，攫取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与苏联争霸，美国变本加厉地将民主“霸权化”“意识形态化”，借民主之名对实行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动辄发动侵略战争或大搞“颜色革命”，以推翻或颠覆不符合美国霸权利益的他国政权。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特伍德在《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写到：“美国的历史充斥着战争和扩张……战争是美国的生活方式。”^[26]美国自 1776 年建国后就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不仅将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张了 10 多倍，而且迅速跃升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严厉地批评美国频繁发动战争，将美国的民主形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卡特强调，中国从未在“战争上浪费过一分钱”，而美国在短暂的 200 多年历史中仅有 16 年没有发动或卷入过战争，美国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27]。

美国借民主之名对外发动霸权侵略战争不仅严重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制造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二战后，为了争夺和护持世界霸权，美国经常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于不顾，冒用“民主”“自由”之名，或公然发动侵略战争，或煽动“颜色革命”，不择手段地颠覆不符合美国霸权利益的他国政权。美国的霸权行为也给被侵略的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以“反恐”和输出民主为名于 2003 年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统计，这场战争导致 20 多万伊拉克平民死亡。美军不仅在伊拉克境内狂轰滥炸，还大量使用贫铀弹、白磷弹等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和禁用的武器，给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坏。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数据还显示，美国于“9·11”事件后在全世

界发动的战争造成了 90 多万军民的死伤，3 800 万民众流离失所。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这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实际数值可能介于 4 900 万至 6 000 万之间^[28]。面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制造的惨烈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撰文，批评美国的战争行为根本与民主和道德背道而驰^[29]。一度为美国自由民主制所陶醉的弗朗西斯·福山也表示，“美国侵略战争与民主输出之间的紧密关系严重玷污了民主”^[2]。

除了直接采用战争手段，美国在二战后还假借“民主”之名对不符合美国霸权利益的他国政权及其政治领导人实施颠覆、“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制裁、渗透和刺杀。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军方、情报部门和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联手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长期大规模的渗透、破坏、颠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学者林赛·欧洛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披露，美国在 1947 年至 1989 年间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实施了 64 次秘密政权颠覆行动和 6 次公开行动^[30]。在后冷战期间，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输出民主，频繁地策动“颜色革命”。2003 年，美国以选举“舞弊”为由，煽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将亲美势力扶持上台。2004 年，美国又以“舞弊”为由，煽动乌克兰“橙色革命”，再次将亲美势力扶持上台。2005 年，美国煽动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推翻阿卡耶夫政权。

除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美国同样以“民主”之名将制造动乱的黑手伸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煽动他国民众发动“街头革命”，颠覆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权，扶持亲美代理人上台。美国自古巴革命后一直对该国实施包括军事入侵在内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颠覆活动，即便是在后冷战时期也一刻没有放松。古巴《格拉玛报》披露，美国政府及其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过去的 20 年中假借“民主”“自由”“人权”之名拨款数亿美元，对古巴政权进行颠覆和“颜色革命”。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政府加紧对古巴政权的颠覆活动，大肆散播“古巴医疗体系崩溃”谎言，煽动对古巴发动军事干涉，意图推翻古巴现政权，扶植亲美势力上台。在“古巴医疗体系崩溃”谎言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后，美国政府又妄称古巴政府“镇压”示威民众，宣布对古巴政府和高级官员进行所谓“制裁”。

面对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凌，古巴、委内瑞拉、伊拉克等国纷纷在联合国痛斥美国盗用“民主”之名推行霸权主义，指控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31]。美国一些正义人士也纷纷批评美国政府沦为“寡头”资本的工具，借民主输出之名侵略他国、煽动动乱，制造国际社会的分裂。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批评美国是干涉别国内政的“瘾君子”、煽动别国内乱的“黑手”。据他统计，美国在二战后企图颠覆 50 多个外国民选政府，粗暴干涉 30 多个国家的民主选举，策划暗杀 50 余位外国领导人^[32]。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卡根等美国知名学者谴责美国早已沦为“流氓超级大国”^[29]。

五、结语

在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美国的政治精英借鉴古希腊的民主理念和欧洲国家的民主实践建构了美国自由民主制。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最终跃升为新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但是，美国自由民主制理论的先天性缺陷和建构运行的后天性

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不断累积和恶化，最终成为美国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中难以修正的痼疾。在国内治理层面，其直接后果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效用在后冷战时期快速衰减，导致美国政治加速寡头化，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广大普通选民在国家政治体制中被边缘化。在国际治理层面，其直接后果便是美国以价值观划界，在国际社会制造动乱和分裂，致使美国自由民主制输出的普遍失败。美国的民主输出已被其军事侵略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严重玷污，成为美国霸权的代名词和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工具。这些困境导致美国这一所谓“民主灯塔”黯然无光，美国从所谓“民主道义”高位崩塌。

美式民主不论是在国内治理抑或全球治理层面均已严重背离了民主的初衷。面对自由民主制在后冷战时期面临的困境，美国的政治精英囿于既得利益，无意也无力对自由民主制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缺陷进行根本性修正。美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在国内政治“寡头化”、普通民众“边缘化”、社会经济“两极化”、国际政治“霸权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轨道上继续滑落。美国政治精英和经济寡头勾连制造的美国社会撕裂和国际社会分裂仍将继续。美国自由民主制迷思的产生根源在于，没有真正领悟民主的真谛。首先，人民是民主的主体，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才是民主的本质与核心。其次，民主既要强调制度化、规范化，也要强调民主的治理效能。只有真正实现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后，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这个国家采用了什么样的民主形式，而要看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地实现了民主的价值。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一个国家才能走上符合自身国情的民主道路。

参考文献：

- [1] 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M]. London: Hamilton, 1992.
- [2] Fukuyama, F. 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 [EB/OL]. (2021-12-30) [2021-12-30]. <http://www.ft.com/cms/s/0/cb6af6e8-2272-11e0-b6a2-00144feab49a.html#axzz1DXPgVQ22>.
- [3] 龚婷. “民主峰会”凸显“美式民主”的内外困境 [EB/OL]. (2021-12-22) [2021-12-30]. 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112/t20211222_8331.html.
- [4] Li Shimo. Eric Li on the failure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China's way [J]. *The Economist*, 2021-12-08.
- [5] 曾毅, 杨光斌. 西方如何建构民主话语权：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解析 [J]. *国际政治研究*, 2016 (2): 64-81.
- [6] 崔小涛. 国际观察：“民主峰会”不改霸权主义本色 [EB/OL]. (2021-12-15) [2021-12-3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203031189027096&wfr=spider&for=pc>.
- [7] Parchen Markell. *The Rule of the People: Arendt, Arche, and Democracy*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6 (1): 1-14.
- [8] Abby Leach.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Light of Greek Literature*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999 (4): 361-377.
- [9] Yascha Mounk. *America is not a democracy* [J]. *The Atlantic*, 2018 (5).
- [10] Alexandros Schismenos and Yavor Tarinski. *Common Futur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olitical Ecolog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21: 188.
- [11] Joel Budgor, Elizabeth A. Capell, David A. Flanders, Nelson W. Polsby, Mark C. Westlye and John Zaller. *The 1896 Election and Congressional Modernization: An Appraisal of the Evidence* [J]. *Social Science*

- History, 1981 (1) : 53-90.
- [12]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Why Americans don't vote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 [13] Gabriel J. Chin. Justifying a revised voting rights act: the guarantee clause and the problem of minority rule [J].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4 (155) : 1551-1588.
- [14] Michael McDonald. 2016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Rates [R]. United States Elections Project, 2018.
- [15] Tina Rosenberg. Increasing Voter Turnout for 2018 and Beyond [N]. The New York Times, 2017-06-13.
- [16] 吴雨伦. 美国人为什么不爱投票 [EB/OL]. (2016-11-07) [2021-12-30].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07/c_129353510.htm.
- [17] Danielle Root and Liz Kennedy. Increasing Voter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cies to Drive Participation and Make Voting More Convenient [R].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8.
- [18] J. T. W. Hubbard. For Each, the Strength of All: A History of Banking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2.
- [19] Andrew Lintott. Aristotle and Democracy [J].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1992 (1) : 114-128.
- [20]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4 (3) : 564-581.
- [21] Alex Tanzi and Mike Dorning. Top 1% of U.S. Earners Now Hold More Wealth Than All of the Middle Class [EB/OL]. Bloomberg Wealth, 2021-10-09.
- [22] Juliana Kaplan and Andy Kiersz. The top 1% officially have more money than the whole middle class [EB/OL]. Business Inside, 2021-10-12.
- [23] 张梦旭. 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EB/OL]. (2021-10-19) [2021-12-30]. <http://sh.people.com.cn/n2/2021/1019/c134768-34962903.html>.
- [24] Emily A. Shrider, Melissa Kollar, Frances Chen, and Jessica Semega.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0 [R]. 2021: 60-273.
- [25] Carmin Chappell.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 system that allows billionaires to exist alongside extreme poverty is immoral [N]. CNBC, 2019-06-22.
- [26] Paul L. Atwood. War and Empire: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M]. New York: Pluto Press, 2010.
- [27] David Brennan. Jimmy Carter Took Call About China From Concerned Donald Trump: China Has Not Wasted a Single Penny on War [J]. Newsweek, 2019-04-15.
- [28] 美国 20 年来这笔“战争账”，谁埋单？ [EB/OL]. (2021-09-12) [2021-12-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s/213652>.
- [29] 柳丝. 斑斑劣迹!美国是二战后国际和平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N]. 人民日报, 2021-09-17 (17).
- [30] Lindsey A. O'Rourke. Covert Regime Change: America's Secret Cold War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 [31] Tom O'Connor. Venezuela Calls U.S. "Greatest Threat to World Peace" Amid New Iran, Cuba Sanctions [J]. Newsweek, 2020-09-23.
- [32] William Blum. America's Deadliest Export: Democracy, the Truth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and Everything Else [M]. Zed Books: New York, 2013.

责任编辑：林华山 刘涪菡



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特征、原因与应对

黄忠¹ 张芯瑜²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别与区域高等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2. 中山大学 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9082)

摘要：近年来，西方对华人权攻势的猛烈性为冷战结束以来所罕见，其实质是企图发动意识形态战。西方对华人权攻势表现出新特征：美欧勾连制华力度加大，“制裁”成为重要手段，强力蛊惑分裂势力，博取国际社会支持。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有政治、外交、经济与地缘等方面的特殊考量，其目的包括：转移内部矛盾，掩盖治理低效；强化同盟体系，巩固反华阵线；迟滞中国发展，谋取地缘利益。中国应充分认识西方对华人权攻势的长期性和危险性，优化应对思路：将争取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作为优先工作，利用民间友好往来展示中国人权事业进步，防控西方人权干预的风险输入，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争取对华人权议题友好力量的支持，加强中国人权话语和传播能力建设。

关键词：人权外交；人权话语；中国人权事业；意识形态；软遏制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2) 01-0137-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在发展，人权在进步。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将人民幸福生活视为最大的人权，带领中国人民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1.013

作者简介：黄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与区域高等研究院加拿大研究中心讲师，阐释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张芯瑜，中山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博士后、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年来美国全球软遏制战略变化与中国对策研究”（20BGJ058）

引用格式：黄忠，张芯瑜. 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特征、原因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137-148.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走出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和夙愿，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力量^[2]。然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无视中国人权事业进步，在自身人权劣迹斑斑的情况下，长期批评中国的人权工作，并借此肆意干涉中国内政。2017 年以来，它们就人权议题对中国发难的力度明显加大。它们与多个反华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极端分子相互勾连，利用各种传播平台和重大国际场合对中国极尽污蔑之能事，强化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在涉港和涉疆事务方面尤为明显。它们还以此为借口对中国相关个体与企业进行所谓“制裁”，公开支持“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这些行径不但严重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威胁了中国的国家统一与安全发展。

面对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中国政府和学界积极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3]在国际上，中国针对西方的人权攻势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发布《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就新疆人权发展进步召开多次新闻发布会，在重大国际会议上陈述中国的人权观，等等。在国内，有关中国人权合作与交流事业的进步^[4]、西方人权双重标准的虚伪性^[5]、西方民主输出的失败^[6]与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7]等诸多问题也得到了研究。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此轮西方人权攻势的特征、动因和应对，仍未得到整体性认知。因此，有必要结合新形势对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西方对华人权攻势的新特征

近年来，西方对华人权攻势的猛烈性为冷战结束以来所罕见。以往，它们主要就新闻、选举与宗教自由等议题，通过国内立法、发布所谓人权报告、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平台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和支持所谓“民运”人士、有关非政府组织等常规操作对中国施压。但目前，它们更多以“五眼联盟”为旗帜，纠集七国集团、欧盟、北约与四方机制等西方国家多边组织，以中国周边地区和中东欧地区为前沿战线，并妄图以涉疆和涉港人权议题为突破口形成对中国人权领域的高压态势。从手段来看，它们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常规操作，而是将人权与经济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挂钩，试图通过所谓“联合制裁”的方式逼迫中国就范。更为严重的是，它们还以人权为借口，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公然支持“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西方对华人权攻势表现出以下新特征。

（一）美欧勾连制华力度加大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西方国家对华人权攻势的力度越来越大，这首先体现在组织协调力度不断提升上。以往，它们一般都是以各自为战的方式单独就中国人权议题采取行动，勾连则多体现在联合国场合就中国人权议题串通提出议案。但在此轮对华人权攻势中，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更多以其主要多边组织为核心平台来协调行动。它们还超越既有范围，直接在中国周边和中东欧地区开辟新战场。

“五眼联盟”在西方对华人权攻势中扮演着急先锋角色。“五眼联盟”萌芽于二战期间的英美情报合作，正式成立于 1946 年。在冷战期间，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情报战。自2017年以来，它发生了明显转型，朝着政治安全小圈子的方向发展且针对中国的色彩日渐浓厚^[8]。可以说，“五眼联盟”在协调相关成员国的行动上起着串联作用。在对华人权攻势上，“五眼联盟”中的英美两国在整个西方国家中扮演着最不光彩的角色。2020年5月28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就中国计划制定香港国安法发表所谓联合声明，妄称“它会削弱香港人民的自由，极大侵蚀使香港赖以繁荣的自治权和制度”^[9]。2020年7月8日，在“五眼联盟”外长电话会议讨论香港局势之后，新西兰声称要“重新审视与香港的关系”，正式加入对涉港事务的干涉^[10]。此后，“五眼联盟”在涉港和涉疆议题上频频发声，已经成为西方对华人权攻势的“打手”。

在“五眼联盟”的鼓动下，七国集团、欧盟和四方机制等多边组织紧随其后开展对华人权攻势。由此，部分西方国家及其盟友与伙伴都被动员起来，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的欧美亚联动格局完整形成。2019年7月，以法国、德国、芬兰、丹麦、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和卢森堡等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为主力，22国联名公开致信联合国高级人权事务专员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对涉疆人权议题妄加干涉。2020年6月17日，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首次就中国决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表达所谓“高度关注”，声称其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和所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11]。2021年2月19日，在七国集团首脑网络峰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妄称应以多边方式处理所谓涉疆问题^[12]。2021年3月15日，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联合发表声明，就所谓“中国做出决定从根本上侵蚀香港选举体制中的民主元素”表达严重关切^[13]。2021年5月，七国集团外交与发展部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重点关注涉疆、涉藏和涉港人权议题^[14]。在2021年6月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与会成员国表示要对中国所谓“侵犯人权与自由的行为”采取一致行动^[15]。202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加拿大纠集44个国家重点攻击中国新疆的所谓人权状况，并对香港和西藏的所谓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16]。

在此轮对华人权攻势中，西方一些国家已经不满足于既有各种平台，它们正在将中国周边和中东欧地区开辟为前沿战线，企图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对中国形成挤压态势。日本多次在联合国参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人权议题的指责。2021年3月16日，在美日防长外长2+2会议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它们表达了所谓“对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状况的严正关切”^[17]。3月1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韩国时妄议中国人权议题^[18]。4月16日，访美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和拜登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所谓“严重关切”涉港和涉疆人权议题^[19]。此外，社交媒体Twitter支持企图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缅甸策动“颜色革命”的“奶茶联盟”等组织。在中东欧地区，捷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参与西方在联合国场合攻击中国人权议题的行动。在欧盟体系内，部分中东欧国家以集体名义参与了对中国人权事务的干涉。4月22日，在个别反华分子的主导下，立陶宛议会不顾中方立场和事实真相，执意举行所谓涉疆人权议题听证会^[20]。

（二）“制裁”成为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制裁”是西方国家对外干涉的重要手段。但冷战结束后至2017年之前，鲜有西方国家将“制裁”与中国人权议题大规模挂钩。2017年之后，西方国家越来越将“制裁”作为对华人权攻势的一项重要武器，不惜协同升级对中国相关个人与实体的各种“制裁”。

美国是在涉港人权议题上“制裁”中国力度最大、频率最高的西方国家。2020年6月2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就所谓“香港问题”对中国相关官员实施签证限制。6月29日，蓬佩奥宣布美

国决定结束对香港出口美产有关技术装备，并采取措施对出口中国香港地区的有关技术实施和中国内地一样的限制；商务部部长罗斯决定取消香港相对于内地的所谓“最惠待遇”^[21]。8月7日，特朗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中国官员进行所谓“制裁”^[22]。11月9日，蓬佩奥宣布以执行所谓“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为由，对4名中国官员实施所谓“制裁”^[23]。12月7日，美国财政部假借所谓“涉及取消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理由，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行所谓“制裁”^[24]。2021年3月16日，拜登政府依据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对24名中国官员实施所谓“金融制裁”^[25]。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后，“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国和欧盟也对香港施加了所谓“制裁”，包括暂停引渡条约、限制出口有关技术设备、不再和香港签订新的协议等。

如果说在对香港的“制裁”上美国扮演主角、其他国家只是有限配合的话，那么在涉疆事务上，它们勾连的力度就大得多。2021年3月22日，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相关实体与个人实施了所谓“制裁”。此次“制裁”不但是欧盟近20年来首次对华实施重大“制裁”，也是拜登上台后西方国家首次就人权议题对华进行联合“制裁”。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妄称：“我们通过与总共30个合作伙伴采取行动……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26]布林肯妄称：“跨大西洋的联合反应向那些违反或侵犯国际人权的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27]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规模经济层面的限制正成为西方对华人权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以美国为例，借口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特朗普政府全面禁止了新疆番茄、棉花的进口。拜登政府上台后，于2021年7月13日向美企发出“不退出与新疆有关的供应链、合资企业或投资项目，有可能面临违反美国法律高风险”的所谓商业警示。美国国会参议院甚至于2021年7月14日通过所谓法案，拟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或在新疆生产的商品^[28]。在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打压上，人权议题同样是美国的重要借口。其所谓理由是，中国试图借助这些企业加强社会控制、侵犯个人隐私与盗窃数据等。2021年12月10日既是国际人权日，也是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的第二天。就在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一批个人与实体实施所谓“制裁”^[29]。12月23日，美国将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三）强力蛊惑分裂势力

2017年以来，西方更加强调要维护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民主标杆”地位，以人权为借口支持“台独”分子，多次触碰中国反分裂国家的红线。2019年10月24日，彭斯在演讲中妄称中国台湾地区是所谓“文化与民主的灯塔”，美国会“支持台湾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30]。对于蔡英文的连任，西方一些国家妄称这是“台湾民主制度成熟的体现”。在中美两国高层阿拉斯加会面前，美国妄称大陆“削弱台湾的民主”^[31]。2021年9月1日，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出台首份所谓“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及其修正案，声称中国台湾地区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所谓重要合作伙伴和“民主盟友”；叫嚣欧盟与国际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建议欧盟全面提升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伙伴关系”^[32]。12月9日至10日，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民主峰会”，实为向“台独”势力提供讲台，为“台独”势力张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台独”与“港独”日渐合流，人权议题在其中扮演着黏合剂角色。2019年6月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分子更是紧随西方反华势力，以人

权、民主与自由为幌子，公开支持在香港发生的各种分裂活动与恐怖暴行，污名化“一国两制”。他们为香港暴徒筹措物资、庇护逃台暴徒、会晤“港独”头目，博取国际同情，推动港台议题国际化^[33]。蔡英文本人不仅支持“港独”，比如在社交媒体妄称所谓“台湾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在窜访过境纽约时发表演讲妄称“要跟站在香港街头的年轻人保持同一阵营”，而且借机炒作赢得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34]。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蔡英文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妄称“台湾有责任与国际民主阵营的伙伴们携手合作，持续撑香港、撑港人，台湾也不会坐视民主、自由、人权在香港倒退”^[35]。台湾“陆委会”印制了“港版国安法生效”红色宣传册，在台湾地区民众中制造恐慌情绪^[36]。在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后，蔡英文叫嚣“国际社会共同关注香港民主、自由倒退的问题”^[37]。未来，“台独”“港独”与“藏独”等分裂势力以及“法轮功”等邪教势力在人权幌子下进一步勾结，以台湾地区为基地，对大陆进行舆论污蔑、渗透的风险与危害可能增大。

（四）博取国际社会支持

反华势力在此轮西方对华人权攻势中借助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依靠庞大的国际媒体网络和人权话语设置能力，不断博取国际社会支持。它们不仅骗取一些国家的支持，而且试图影响这些国家内部民众对华人权的态度。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民调发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普通党员尽管在对华整体态度、经济政策、安全政策与留学生访学等问题上看法有较大差异，但他们在所谓“美国就是牺牲经济关系也要推动中国人权”话题上的支持率相差不大。安格斯·里德学会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有关加拿大对华政策的三次民调发现，主张将人权和“法制”而非贸易与投资放在优先地位的人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为62%、70%和76%^[38]。民调机构纳诺斯研究2021年3月份的民调报告声称，超过62%的加拿大民众认为“最好和美国一起对中国施加制裁”^[39]。中欧亚研究所2020年对瑞典、波兰、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法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民调发现，有9个国家超50%的民众认为该国应当将人权和所谓民主改革放在对华政策的优先位置^[40]。这些民调数据本身存在较大局限性，但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民众看待中国人权的态度，以及反华势力凭借话语包装和议程设置影响国际社会民众视线的能力，这不能不引起中国警惕。

二、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的动因

在西方国际话语叙事体系中，人权从来都与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人权观是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们自身的人权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戴着有色眼镜，用双重标准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从历史来看，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内政甚至发动战争的案例屡见不鲜。具体到中国，西方国家此轮强化对华人权攻势的实质也是发动意识形态战。它旨在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此轮强化对华人权攻势有政治、外交、经济与地缘等方面的特殊考量。

（一）转移内部矛盾，掩盖治理低效

以往西方国家在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人权问题”时，其背后潜在的逻辑是

西方模式具有所谓优越性，臆想发展中国家只有在人权等各个方面以它们为榜样、按照它们的标准和要求去做，才能有进步的希望。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更是凭借超强的软硬实力推行自由主义霸权战略，妄图实现整个世界的西方化。然而，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中心东移的趋势更加突出，西方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与信仰危机。特别是，中国的发展非但没有如西方诸多理论臆想的那样走向崩溃，反而行稳致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西方国家需要意识形态上的“假想敌”来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增强内部凝聚力。比如 2021 年 4 月 19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谴责侵犯香港“民主与自由”的法案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妄称，美国国会对香港的支持是跨越两党党派和参众两院的，这与美国两党在国内治理和全球气候政策等方面的极端对立形成了鲜明对比^[41]。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高度焦虑，极力想要找出其中的所谓“问题”以寻求自我安慰。由此，中西方意识形态尤其是人权观的差异被放大，成为西方谋求对华压制和国际话语权优势的重要抓手。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揭露了西方人权观的内在缺陷，凸显了西方发展的困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021 年 12 月 20 日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愈 535 万人死亡，其中美国超过 80 万，英国接近 15 万，意大利超过 13 万，法国超过 12 万，德国接近 11 万，西班牙接近 9 万^[42]。这说明，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保健体系没有保证西方发达国家战胜疫情，重要原因在于其政治体制和价值取向的弊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世界经济下降 3.3%，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 4.7%，美国下降 3.5%，而中国却在逆势中上升 2.3%^[43]。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更加倾向于用异样眼光看待中国的人权事务，既转移国内矛盾，又为国家政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美国因此将所谓“保卫”人权和“基本自由”放在对华战略竞争的优先地位^[44]。

（二）强化同盟体系，巩固反华阵线

对于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国的认识和反应并不一致。在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希望盟友少搭便车，多承担责任，从战略上配合自己抑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然而在其一些盟友看来，做出这种选择没有益处，因此倾向于抵制或者消极配合美国的要求^[45]。在经济层面，当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摩擦时，其他国家就采取了旁观态度。欧盟与中国完成了投资协定谈判，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东盟与中国一起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安全层面，诸多国家缺乏过度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意愿，不愿意支持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军事对抗，它们甚至担心美国的过激行为会导致亚太地区出现危机进而使自己利益受损的前景^[46]。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认为，各国“必须适应一个更具影响力的中国”^[47]，新加坡“承担不起选边站的后果”^[48]。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幌子下，退出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鼓动英国脱欧以及制裁北溪-2 油气管道等行径，推动欧盟追求战略自主。默克尔表示，欧洲人应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鼓励法国打造“欧洲军”。马克龙则表示“西方霸权终结”和“北约脑死亡”，呼吁欧盟具备更多行动能力^[49]。长远来看，人文血缘纽带的减弱、经济对立性的增强与各自内部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也会让欧美关系的冲突性提升^[50]。与此同时，中欧关系在升温。在欧盟看来，在全球多边合作方面中国明显是一个比美国更为值得信赖的伙伴。默克尔明确支持中国的多边主义主张，反对美中对峙中的结盟行动^[51]，德国外长海科·马斯反对与中国脱钩^[52]，马克龙强调欧盟不应该与美国合伙对抗中国^[53]。

在这种情况下，反华势力要想强化西方同盟、巩固全球反华阵线，必然会选择人权议题这类价值色彩浓重的领域来攻击中国。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美国都频频在西方同盟内部炒作中国人权议题，以借此维护和彰显美国的全球霸权角色。反华势力还企图通过炒作涉疆人权议题来离间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54]。

（三）迟滞中国发展，谋取地缘利益

长期以来，反华势力从没有放弃过对华进行和平演变的企图。早些年，他们曾经妄想中国政局发生“颜色革命”而崩溃。它们还曾经幻想过中国会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发生剧变。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不忘在中国内部培植代理人，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培博就曾经发表演讲，妄称通过互联网发动中国的年轻人进行所谓“街头革命”^[55]。然而，中国非但没有如其所愿，反而蒸蒸日上。这时，反华势力企图借助人权、民主与自由等“价值观外交”，配合其他手段，在内部迟滞中国发展，在外部从围堵中国的过程中谋求地缘利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存在有关纠纷，中南半岛地区更是与中国西南接壤，一些东南亚国家内部历来存在不稳定因素。美国在这些国家炒作人权议题，极易令这些国家内部生乱，进而波及中国社会稳定，并破坏中国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西方反华势力为破坏“一带一路”建设、离间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对中东欧地区保持高度战略关注。鉴于该地区一直是西方与俄罗斯斗争的前线，西方攻击中国人权议题还可能达到顺带攻击俄罗斯的目标。

西方有关国家攻击中国人权议题直接指向地缘利益。中国新疆地区地处欧亚大陆经济发展的心脏地带，是中国从陆路通往欧洲、中亚和西亚的门户，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物流中心。出于“以疆制华”的企图，反华势力针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各种破坏活动花样迭出。它们在舆论上攻击中国在新疆地区的各种政策，制造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谎言，诋毁新疆的发展。澳大利亚公民党刊物《澳人警示服务》发表的《新疆：欧亚中心地带的中国西部边境》特别报告就指出，自2004年以来，仅美国民主基金会就资助了涉疆的各种激进组织876万美元^[56]。在2017年美国确立对华竞争的错误路线之后，涉疆人权议题在西方反华势力眼中的重要性更是急剧提升。它们为此不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就这个议题对中国进行各种攻击。此外，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美欧以人权为借口对新疆棉花的无理制裁，还包含降低对中国产品依赖性、构建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所谓“民主供应链联盟”企图^[57]。

三、中国应对西方人权攻势的思路

中国应充分认识此轮西方对华人权攻势的长期性和危险性。需要看到的是，中国人权建设的大环境非常复杂，外部干扰因素层出不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西方会对我国持续进行意识形态打压，力度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此，中国应充分总结经验、优化思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国际人权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秩序。

（一）将争取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作为优先工作

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将谋求生存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其中很多国家深受西方

打压，相对而言更能够理解和接受中国对于人权事务的处理方式，也能够各种国际舞台为中国发声。因此，深化与它们在人权议题上的对话、理解与合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其中，东南亚、南亚与中亚等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欧国家是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以上地区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还因为西方在这些地区的外交往口惠而实不至，对中国的人权污蔑难有说服力。这为中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相应工作、深入其社会基层提供了空间。此外，一些中东欧国家也是欧盟成员国，它们可以牵制欧盟在对华人权议题上的立场。在 2021 年 3 月欧盟就涉疆人权议题的“制裁”中，匈牙利投了反对票，其外交部部长西雅尔多称这些举措“有害”且“毫无意义”^[26]。4 月，匈牙利反对欧盟就香港国安法发表批评中国的声明^[58]。12 月，匈牙利不仅试图阻止欧盟高级官员参加美国举办的所谓“民主峰会”，还反对欧盟其他国家就该峰会发表支持声明^[59]。这是对中国的有力声援。

（二）利用民间友好往来展示中国人权事业进步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来华经商、旅游、学习与生活的外国公民，应当成为中国人权外交的新对象。要巧妙引导更多来华外国公民于舒心工作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处理人权事务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可组织在华生活的外国人参与讲中国故事、唱响中华名曲、描绘中国的锦绣河山等诸多寓教于乐的活动，拍摄一批外国人在华生活的影视题材，以他们的视角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将其在海外广泛传播。越来越多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可以在宣传中国人权事业进步方面发力。他们通过与东道国的社会友好相处，并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有关中国人权的污蔑将逐步不攻自破。

（三）防控西方人权干预的风险输入

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地区 and 民族、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依旧会是中西方涉人权议题较量的关键领域，对有关势力在西方支持下炒作中国人权议题、破坏社会稳定乃至制造国家分裂风险的警惕不能放松。一方面，中国要强化内功建设，打造好应对西方人权干涉的防火墙。另一方面，中国应坚决回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将自己的政治诉求与人权挂钩的做法。当前，尤其需要对“台独”势力以民主人权为幌子谋求“独立”的主张进行揭露。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揭露它们为了私利不惜支持暴恐活动的事实，让海外同胞看到“台独”势力为奉迎西方反华势力而无视当地人权、危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真面目，也要充分借助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的力量，打破“台独”势力对大陆人权事业进步的污名化。

（四）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争取对华人权议题友好力量的支持

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比如，2021 年初，新西兰拒签了“五眼联盟”涉及香港和新疆议题的所谓联合声明，也没有参与西方就新疆人权议题对中国的联合“制裁”。4 月，新西兰外交部部长马胡塔重申对华友好政策，并表示对“五眼联盟”扩权到分享情报范围以外的军事外交事务感到不安^[60]。不同于英国议会，加拿大国会参议院、澳大利亚国会和新西兰议会没有通过中国在新疆进行所谓“种族灭绝”的提案。中国对此类情况可充分调研，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省州与城市友好关系、企业对话、社会交流等机制，开拓渠道争取理解和支持，拓展人权对话的空间。而对于人权议题上的顽固反华分子，应选择更为精准和深入的打击方式。目前的关键是不仅要对他们进行制裁，更要在海外广泛公布他们为某一特定私利，

比如金钱或权力, 而不惜对我国人权议题进行造谣污蔑的事实, 令其在国际舆论场彻底失去信誉。

(五) 加强中国人权话语和传播能力建设

一方面, 要更为自信地提出中国人权话语, 引领国际舆论。对于西方的人权攻势, 中国不仅要勇于斗争, 反击对方, 也要善于立在时代潮头, 提出更多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人权话语, 并将其发扬光大。在话语设置上, 中国应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既要强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鼓励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 也要站在世界共同价值的视角, 打造融通中西的人权话语。比如, 在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 中国完全可以将享有一个清洁美丽的环境作为一项重要人权提出。环境权不是敏感政治议题, 其衡量指标也相对客观易懂, 容易被对方接受, 令各方有沟通和交流的空间。另一方面, 要更为有力地强化国际人权话语传播能力建设, 让世界更好聆听中国声音。需要特别重视的是, 尽管面临各种客观困难, 中国仍然需要积极利用各种海外传播媒体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阵地。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应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 通过他们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出去, 让外国人士在日常生活比较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权事业进步, 也令反华势力对中国的人权污蔑越来越难得到国际社会支持, 最终陷于孤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 周年座谈会 [EB/OL]. (2018-12-10) [2021-11-22]. http://www.gov.cn/xinwen/2018-12/10/content_5347429.htm.
- [2] 中国的全面小康 [EB/OL]. (2021-09-28) [2021-11-22].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8/content_5639778.htm.
- [3] 习近平: 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 反对搞“双重标准” [EB/OL]. (2020-09-15) [2021-11-2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15/c_1126493062.htm.
- [4] 罗艳华. 2010—2020 年中国开展国际人权合作与交流的主要特点 [J]. 人权, 2020 (6): 95-114.
- [5] 于镭. 美国对华人权双重标准的范式建构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2): 86-94.
- [6] 曲伟杰, 胡家琳. 人权旗号下西方民主输出的挫败: 内在困境与原因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5): 103-108.
- [7] 郑亮. 涉疆人权议题国际传播: 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93-101.
- [8] 刘江韵, 黄紫斐. 演变中的五眼情报联盟: 历史与现状 [J]. 情报杂志, 2019 (8): 28-35.
- [9] China's Proposed New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Joint Statement [EB/OL]. (2020-05-28) [2021-04-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from-the-uk-australia-canada-and-united-states-on-hong-kong>.
- [10] 鞠峰. “五眼联盟”开完会, 新西兰也跳出来了 [EB/OL]. (2020-07-09) [2021-04-12].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0_07_09_557009.shtml.
- [11]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Hong Kong [EB/OL]. (2020-06-17) [2021-04-14]. <https://hk.usconsulate.gov/n-2020061701/>.
- [12] Mike Blanchfield. Trudeau Pledges More Cash as G7 Leaders Aim for Wider Covid-19 Vaccine Distribution [EB/OL]. (2021-02-19) [2021-04-13]. <https://www.ctvnews.ca/politics/trudeau-pledges-more->

- cash-as-g7-leaders-aim-for-wider-covid-19-vaccine-distribution-1.5315485.
- [13] 七国集团就香港选举“改变”的声明 [EB/OL]. (2021-03-15) [2021-04-13].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g7-statement-on-hong-kong-electoral-changes-cn/>.
- [14] G7 Foreign and Development Ministers' Meeting: Communiqué [EB/OL]. (2021-05-05) [2021-05-0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7-foreign-and-development-ministers-meeting-may-2021-communicue/g7-foreign-and-development-ministers-meeting-communicue-london-5-may-2021>.
- [15] G7 Reaches Consensus on China Dumping, Human Rights Abuses-U.S. Official [EB/OL]. (2021-06-13) [2021-11-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g7-reaches-consensus-china-dumping-human-rights-abuses-us-official-2021-06-12/>.
- [16]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7 届会议上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联合声明 [EB/OL]. (2021-06-22) [2021-11-23].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nternational_relations-relations_internationales/un-onu/statements-declarations/2021-06-22-statement-declaration.aspx?lang=zh-cn.
- [17] 美日联合新闻声明 [EB/OL]. (2021-03-16) [2021-04-13].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u-s-japan-joint-press-statement-cn/>.
- [18] 布林肯国务卿与大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在会谈前的发言 [EB/OL]. (2021-03-17) [2021-04-14].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secretary-antony-j-blinken-and-republic-of-korea-foreign-minister-chung-eui-yong-before-their-meeting/>.
- [19] U.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 -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EB/OL]. (2021-04-16) [2021-04-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 [20] 驻立陶宛大使馆发言人就立议会讨论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发表谈话 [EB/OL]. (2021-04-22) [2021-04-27]. <http://lt.china-embassy.org/chn/sgxw/t1870877.htm>.
- [21]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aw for Hong Kong: Issues for Congress [EB/OL]. (2020-08-03) [2021-04-14]. <https://fas.org/sgp/crs/row/R46473.pdf>.
- [22] Treasury Sanctions Individuals for Undermining Hong Kong's Autonomy [EB/OL]. (2020-08-07) [2021-04-14].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1088>.
- [23] Michael R. Pompeo. Designations of Four PRC and Hong Kong Officials Threatening the Peace, Security, and Autonomy of Hong Kong [EB/OL]. (2020-11-09) [2021-04-14]. <https://hk.usconsulate.gov/n-2020110901/>.
- [24] Michael R. Pompeo. Designations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ficials Undermining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EB/OL]. (2020-12-07) [2021-04-14]. <https://2017-2021.state.gov/designations-of-national-peoples-congress-officials-undermining-the-autonomy-of-hong-kong/index.html>.
- [25] 李司坤. 美方制裁 24 名中国官员, 赵立坚: 坚决反对, 已经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EB/OL]. (2021-03-16) [2021-04-14].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2LM8PWhYsk>.
- [26] 新疆维吾尔人权: 美欧英加等多国联合制裁中国 [EB/OL]. (2021-03-23) [2021-04-15].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6493143>.
- [27] 国务卿布林肯要求加强对“践踏”人权的实行问责 [EB/OL]. (2021-03-22) [2021-04-02]. <https://>

- 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promoting-accountability-for-human-rights-abuse-with-our-partners-cn/.
- [28] 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涉疆议案, 欲禁止进口所有新疆产品 [EB/OL]. (2021-07-15) [2021-11-23].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1_07_15_598600.shtml.
- [29] Treasury Sanctions Perpetrators of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EB/OL]. (2020-12-10) [2021-12-20].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526>.
- [30] 副总统彭斯在弗雷德里克·马勒克纪念讲座发表讲话 [EB/OL]. (2019-10-24) [2021-04-16].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vice-president-pence-at-the-frederic-v-malek-memorial-lecture-zh/>.
- [31] 中美极端竞争 台海危机白热化 [EB/OL]. (2021-03-21) [2021-04-16]. <https://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210321-1132949>.
- [32] 欧洲议会外委会通过涉台报告, 中方强烈回击 [EB/OL]. (2021-09-02) [2021-11-24].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1_09_02_605560.shtml.
- [33] 陈文杰. “港独”“台独”合流形势分析 [J]. 统一论坛, 2019 (5): 43-46.
- [34] 宇文雷格. 究竟哪些“外部势力”在搅乱香港? [EB/OL]. (2019-08-09) [2021-04-16].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9_08_09_512841.shtml.
- [35] 蔡英文: 台湾不会坐视民主自由人权在香港“倒退” [EB/OL]. (2020-05-28) [2021-04-19].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00528-1056916>.
- [36] 陆委会印“港版国安法生效”小册提醒台湾人勿踩地雷 [EB/OL]. (2021-02-02) [2021-04-16].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10202-1121215>.
- [37] 国台办批台当局勾连“港独”势力 也希望国民党人士“明辨是非” [EB/OL]. (2021-03-18) [2021-04-16]. <https://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taiwan/story20210318-1132130>.
- [38] Canadian Opinions of China Reach New Low [EB/OL]. (2020-05-13) [2021-04-27]. <https://angusreid.org/covid19-china/>.
- [39] National Survey. A Strong Majority Support or Somewhat Support the House of Commons Declaring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the Uyghur Muslim Minority in China an Act of Genocide [EB/OL]. (2021-03-08) [2021-04-27]. <https://nanos.co/wp-content/uploads/2021/03/2021-1836-Globe-Feb-Populated-Report-with-Tabs.pdf>.
- [40] Richard Q. Turcsányi, Matej Šimalčík, Kristína Kironská, Renáta Sedláková, et al. European Public Opinion on China in the Age of COVID-19 [EB/OL]. (2021-11-01) [2021-04-27]. https://ceias.eu/wp-content/uploads/2020/11/COMP-poll-report_3.pdf.
- [41] Floor Speech in Support of H. Res. 130 Condemning Violation of Freedoms of Hong Kong [EB/OL]. (2021-04-19) [2021-04-20]. <https://www.speaker.gov/newsroom/41921-1>.
- [42] Covid-19 Dashboard [EB/OL]. (2021-12-20) [2021-12-20].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 [43] Global Economy on Firmer Ground, but with Divergent Recoveries Amid High Uncertainty [EB/OL]. (2021-03-23) [2021-04-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1>.
- [44] A Bill To Address Issue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1-04-15)

- [2021-04-25] . <https://www.congress.gov/117/bills/s1169/BILLS-117s1169is.pdf>.
- [45] 周方银. 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与新特征 [J]. 当代世界, 2021 (4): 4-10.
- [46] 陈新明, 李源正. 美欧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协调之现实困难与未来前景 [J]. 世界政治研究, 2020 (3): 60-89.
- [47] PM Lee Hsien Loong at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2019 [EB/OL]. (2019-05-31) [2021-05-03].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M-Lee-Hsien-Loong-at-the-IISS-Shangri-La-Dialogue-2019#Chinese>.
- [48] Karishma Vaswani. Singapore PM: “Considerable Risk” of Severe US-China Tensions [EB/OL]. (2021-03-11) [2021-05-03].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6318576>.
- [49] 房乐宪, 殷佳章. 欧盟的战略自主追求及其国际含义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 (11): 57-63.
- [50] 张健. 欧美关系不太可能回到从前了 [N]. 环球时报, 2020-06-11 (15).
- [51] 默克尔支持习近平反对结盟冷战 [EB/OL]. (2021-01-27) [2021-04-23].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10127-1119644>.
- [52] 外媒: 中德外长齐声抵制“脱钩”逆流 [EB/OL]. (2021-04-23) [2021-04-23].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210423/2441295.shtml>.
- [53] Rym Momtaz. Macron:EU Shouldn't Gang up on China with US [EB/OL]. (2021-02-04) [2021-04-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macron-eu-shouldnt-gang-up-on-china-with-u-s/>.
- [54]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言人就有关媒体不实报道答记者问 [EB/OL]. (2019-12-18) [2021-04-28]. <http://id.china-embassy.org/chn/sgsd/t1725622.htm>.
- [55] 海评面: 煽动网民搞垮中国? “洪博培们”打错了算盘 [EB/OL]. (2021-04-18) [2021-04-26]. <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21/0418/c3544802-32060081.html>.
- [56] Special Report on Xinjiang:Anglo-Americans Sponsor “East Turkistan” Campaigns [EB/OL]. (2021-04-11) [2021-11-26]. <https://citizensparty.org.au/special-report-xinjiang-anglo-americans-sponsor-east-turkistan-campaigns>.
- [57] 刘露馨. 制裁“新疆棉”或是美欧构建“供应链联盟”的开端 [J]. 世界知识, 2021 (8): 58-59.
- [58] John Chalmers, Robin Emmott. Hungary Blocks EU Statement Criticising China over Hong Kong, Diplomats Say [EB/OL]. (2021-04-16) [2021-05-07].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hungary-blocks-eu-statement-criticising-china-over-hong-kong-diplomats-say-2021-04-16/>.
- [59] 外媒: 匈牙利阻止欧盟就“民主峰会”发声明 [EB/OL]. (2021-12-05) [2021-12-05]. <http://m.cankaoxiaoxi.com/world/20211205/2461964.shtml>.
- [60] 新西兰重申对华友好政策: 中国表示欢迎, “五眼联盟”下一步动向引发关注 [EB/OL]. (2021-04-26) [2021-04-28].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6860521?at_medium=custom7&at_custom4=FBBD5492-A653-11EB-8316-D55F4D484DA%E2%80%A6.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刘泮菡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年第1期 总第31期 第6卷

双月刊 2022年1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15.00 元